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与毛泽东



序：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民族求解放、图富强的斗争史上，从林则徐到孙中山，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斗争都没有达到目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和流血牺牲，1949年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探索，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奋勇前进。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产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一批伟大人物。他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率领中国各族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曾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第一次革命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二次革命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这场新的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两场革命形成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涌现出了两代核心伟大人物，他们就是毛泽东与比毛泽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联系，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富有传奇性。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这样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造就了他们。

20年代初期，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人虽不相识，但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集体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开始把他们联结到了一起；

大革命后期，他们一个在南方从事革命运动，一个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革命危急关头，两人都参加了“八七”会议，才得第一次相见；

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他们一个在祖国的东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个在广西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

30年代初期，他们同在中央根据地，都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一个被夺了权，一个被“打倒”，有过一段“共受冤”的难忘历史；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也随之得到解放，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一个在延安统率全局，一个在太行山创建根据地，大河上下共抗外敌；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邓小平亦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太行指挥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他们配合默契，文谈武打呈风流；

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开始时，毛泽东转战陕北，并部署西北和山东解放军共同按住敌人的头脚，刘邓大军则拦腰砍去，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

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坐镇西柏坡，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决战千里之外，发起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最后主力，敲定了全国胜利大局；

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进驻北平，邓小平等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国民党首都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接着又挺进华东大地和部署进军大西南，在开国大典上邓小平随同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建国后的前七年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大西南取得卓越成就后奉调中央工作，在党的八大后担任总书记要职，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遇到过严重挫折，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以“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但是，毛、邓离分终有缘，七年后邓小平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1975年岁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促使形势迅速好转。但“朝内有好梦难圆”，岁尾邓小平又靠边站，进而被再次“打倒”；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万分悲痛，但他不能同意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也决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他倡导全党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把邓小平推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位置，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继承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开创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继毛泽东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历史的画卷是如此异彩纷呈。毛泽东重用了邓小平，可是后来又否定了他；而否定了邓小平七年之后，毛泽东又把他再扶上马；1976年毛泽东临终之前再一次“换马”，把班交给了另外的人。邓小平全力支持毛泽东，并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第一次被“打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两次为他所支持的毛泽东所“打倒”。但是，正是这位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并在新时期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位是时沉时浮终不沉，一位是三落三起总不落。一位是否定不了的“湖南辣椒”，一位是打不倒的“四川小个子”。在他们半个世纪的联系中，既有磕磕碰碰又难舍难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相互既有矛盾又相得益彰，乍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而以唯物史观剖析，部有其历史的因由，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必须正视的，即他们都是忠诚的中国

共产党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他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都是让祖国得解放、得繁荣、得富强。

“两代核心，同一伟业”，这是我们认识、叙述和研究邓小平与毛泽东传奇般交往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线索。

邓小平所以能够继承、发展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绝非偶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与毛泽东在事业上、思想上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在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同一个集体即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注重实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祖国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公道”、“有才干”、“能办事”、“周到”、“厚道”，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同志。毛泽东曾明确表示邓小平是他的“接班人”之一，是他的“副帅”。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对邓也有许多褒奖之词。邓小平则一直把毛泽东当作导师和领袖，他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认识得很早，理解得很深。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和共识。且不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同时也解放了被“左”倾路线“打倒”的邓小平，只就党的七大到八大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毛、邓之间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在党的七大上，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统率刘邓大军奋战太行、挺进平汉、南渡黄河、逐鹿中原、决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追敌华东、转战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进行了一千三百余次大小战役，解放了中原、华东大片国土。当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邓小平以参与缔造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当之无愧的。参加开国大典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又率部进军齐西南和西藏，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大西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不久，邓小平调到中央协助毛泽东工作，1956年八大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第一次走向辉煌的时期，而这与毛泽东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多次讲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149页）

在八大以后的岁月里，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取得的成就仍然是肯定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一时期的失误不能让毛泽东一个人负责任，“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他没有推脱自己的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毛泽东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后来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

实有效的改革步骤。”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事业和思想上有着很久很深的联系，在感情上也有很久很深的战友情谊，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能够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如果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会搞什么“非毛化”，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无知。

但是，邓小平不仅仅是继承了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而且还纠正了毛泽东和党的失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这也是由邓小平所处的历史条件、历史地位、历史的经历以及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所决走的。邓小平是从基层逐步走到中央领导岗位的革命家，他做过工人，当过秘书，组织过武装起义，编过报纸，任过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和一般的机关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根据地和一方面军里担任政治领导工作，解放后他又在西南从事过多年地方领导工作。这样的经历，在诸多中央领导人中是罕见的。几十年的基层、地方工作经历，养成了他很强的务实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深深懂得决策的重要，更懂得决策要符合实际、能够贯彻执行的重要。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又去苏联学习，对西方、外国和世界有较多的了解；60年代多次赴苏，70年代参加联合国会议到过美国，使他有较多机会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历史潮流和时代新特征，敏锐地觉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新挑战。在政治上，邓小平历经三次大起大落，这一点也是其他中央领导人很少有过的。“三起三落”使他对极左深恶痛绝，并锻炼了他实事求是的勇气和信心。几十年顺境和逆境的磨练，使邓小平深深地体察到，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行，不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新特征发展毛泽东思想更不行。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之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很少有人具有小平这样非凡的经历，像他这样处于承前启后、联结着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具有他那样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就促成了邓小平能够第二次走向辉煌，能够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集中全党的智慧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此外，我们在论及邓小平对毛泽东事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时，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另一位伟人周恩来的作用。早在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就结识了。邓小平那时才十几岁，是在比他年长六岁的周恩来影响和引导下走向革命的。邓小平一直把周恩来作为兄长尊敬，周恩来也一直把邓小平作为后起之秀爱护，在毛、邓之间，周恩来发挥着有效的“粘合”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邓小平遭贬时，周恩来力所能及地减轻邓的困境；在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时，周恩来以最大的努力促其尽快成为现实；当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妄图由她组阁时，周恩来抱病力荐邓小平，挫败了野心家的阴谋；当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周给予了全力支持，重病中高声赞扬邓小平“你比我干得好”。正是在毛泽东的授意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邓小平才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机会，大大显示了邓小平的才华、水平和胆量。而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正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更加认识了邓小平，因此，后来江青一伙虽然利用毛泽东的失误“打倒”邓小平，但是他在人民心里终难被“打倒”。人民和历史最后还

是选择了邓小平。人民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推荐、介绍和支持分不开的。周恩来十分了解邓小平，也十分负责地向党和人民推荐、介绍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位“举重若轻”的政治家，他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19—120页）周恩来以自己和平小平相比较，对邓的特点和气质作出了非常准确的概括。邓小平确实是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善于抓大事、抓要害，既放得开又拿得起，临危不惧、遇喜不亢，豁达而又干练的大战略家、大政治家。

所以，历史纠正了毛泽东的失误，历史接受了周恩来的推荐，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而邓小平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和历史的期望，他不仅继承而且大大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先逝者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把已经站立起的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

文学家们往往把毛泽东比作“湖南辣椒”，以喻这位伟人倔强、执着、自信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把周恩来比作“绍兴的酒”，以喻这位伟人温醇、柔和、谦让和顾全大局的品德。那么，对邓小平又作何比喻呢？一些中外人士有说他像“四川辣子”的，也有说他像“辛辣芥末”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就称邓小平像“芥末一样辛辣和灵敏”）。笔者不大愿对这二位伟人作什么比喻，因为比喻早然形象而生动，但往往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笔者认为，这三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个人的性格、风度和气质方面各有特点。毛泽东的“刚”，周恩来的“柔”，毛、周结合为“刚柔相济”。而邓小平则是既有毛泽东的“刚”，又有周恩来的“柔”，他执着而不固执，自信而不自负，温和而不附和，忍让而不迁就。

“三位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构织出了从毛泽东经过周恩来到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诞生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如此绚丽如此辉煌的历史画卷。

邓小平与毛泽东

1. 二十年代初期，当毛泽东在国内创建中国共产党时，邓小平在法国和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周恩来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党的事业从此结下毛、邓五十年难解之缘。

毛泽东有段著名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话也应在了湖南的毛泽东和四川的邓小平身上。

当 1893 年出生的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于本世纪 20 年代初在国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毛泽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则从四川广安县的牌坊村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再赴法国，和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比他年长六岁的周恩来一起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本来也是有机会去法国留学的，但是他认为“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他协助组织了湖南知识青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自己并没有出国。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国度里，接受了一个共同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组织湖南同学赴法勤工俭学时，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期任职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潮书刊。1920 年他第二次旅京时，又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从此逐步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其后，毛泽东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和毛泽东相似，邓小平也是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 1992 年春的南巡谈话时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

邓小平 1904 年 8 月 22 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童年时期的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他五岁入私塾发蒙，七岁转入新式小学，后又继续读中学，1919 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十五岁的邓希贤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立下了救国大志。1920 年夏天，他和八十三位四川同乡同学一起登船赴法勤工俭学，那时他才十六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在法国，年轻的邓希贤在钢铁厂做过杂工，在工厂里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当过帮工，收入刚够糊口。但是，邓希贤在这里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法国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国家。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批判地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才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巴黎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三千名起义者流血牺牲，马克思称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无产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5 页）由此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71 年的巴黎公社，更是举世闻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系统总结了这一伟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2 页）从而完整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映巴黎公社悲壮斗争的《国际歌》唱遍了全世界，公社社员进行最后斗争和英勇牺牲的地方拉雪兹墓地的围墙，作为“公社社员墙”受到世世代代革命者的凭吊。

邓希贤所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接触的就是这个国家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特别是当时正处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法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广泛流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部不可避免地都对邓希贤等一批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热血青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蔡和森当时也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利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较为蓬勃的有利条件，“猛看猛译”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思想豁然开朗，他把自己在法国取得的新认识，多次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促进了毛泽东在思想上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致函毛泽东，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的问题。9月16日又给毛泽东发出长信，再次详细讨论了建党的问题，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函蔡和森，称他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和留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分子，在思想上联系紧密，相互促进。

在留法青年学生中推动建党工作取得实效的人当属周恩来。1898年出生的周恩来，在一批年轻的留法学生中，显得更为老成一些。他在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已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并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有过交往。当他二十二岁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在法国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此时国内由“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推动，已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到法国讲学，1921年2月由他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参加党的组织，并报告了国内党的发起人陈独秀。后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赵世炎、陈公培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由陈独秀介绍和张申府等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于是，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组成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与国内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率领下，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1年2月28日，四百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逼使公使改变关于中断发放勤工俭学救济金、将“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的指令，答应延发救济金，并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这就是著名的旅法学生“二·二八”运动。6月，北京政府派专使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商谈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条件，向法政府借款事项。周恩来获悉后，当即和诸同志议决发起声势浩大的“拒款斗争”，其间两次召开拒款大会，群情激愤，痛打了中国驻法公使的秘书，迫使他代表公使在反对借款的决议书上签了字。9月，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又发起了“进军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是中法两国政府以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一所大学，名义上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的学生就学问题，而实际上却把勤工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而从国内招收了一百多名豪绅子弟。此事激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一百多名学生9月20日向里昂进发。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传单，使反动势力极为震惊。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法国当局串通，诬蔑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将百余名学生拘禁起来。周恩来等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但未获得成功。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百零四人被押送回国。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使许多留学生丢掉了工读主义救国的幻想，提高了觉悟。邓希贤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不断锻炼成长，逐步成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 年冬，赵世炎、周恩来发起建立“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 年 6 月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告该组织的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同年夏季，十八岁的邓希贤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的起点。他后来曾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4 页）邓小平才思敏捷、责任心强，加之他文字严谨、书写工整和高效、充沛的作风与精力，少共组织分配他负责机关报刊《少年》的刻版和油印工作。1923 年 2 月，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与国内团组织取得联系，由周恩来任书记。1924 年邓小平转为中共党员，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继续负责团的机关刊物的刻印和出版工作，刊物改名为《赤光》。在编辑组里，邓小平年纪最轻，才二十岁，但是他工作最繁杂，不仅亲自刻印，还撰写稿件。在十五期中，他一个人就撰写了三十七篇文章。他刻印的字迹，工整秀丽，印刷清晰，简直和铅印的不相上下。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邓小平就有了“油印博士”的雅号，有的同志还叫他“邓腾刻”。《赤光》在留法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党团组织在这块阵地上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赢得了很多读者。

1924 年 1 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周恩来奉党的指示于 7 月动身回国，随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后来他担任了党组织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邓小平在 1980 年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时，曾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8 页）

当然，此时三十一岁的毛泽东虽然通过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友了解一些法国的情况，但很可能还不知道邓希贤这位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毛泽东在 1923 年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成员，1924 年 1 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已有一定名望。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党员的邓小平或许对毛泽东有所闻知，但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可能还不相识。然而，他们终究加入了同一个伟大战斗集体——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他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具体的经历有所不同。毛泽东比邓小平年长十一岁，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已是二十六岁的教师，主办《湘江评论》，发表了许多独立的政治见解，而邓小平当时只有十五岁，只是受到了爱国思想和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受过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

主’、乌托邦主义和；日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毛泽东自述》第31、3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而邓小平则较为单纯，除了在赴法前有过“工业救国”的朦胧幻想，赴法后又很快被打破之外，没有受过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入。他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这样回忆和总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到法国后，“俭学”不成，只好“勤工”，“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总之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11、1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此外，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深知中国劳苦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疾苦有着密切联系。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六岁就参加农谚劳动，后来虽然读了私塾，但仍然帮助家里干活，一直到十七岁才离开故乡韶山到外地求学、找出路。他对农民是有深刻了解的。而邓小平虽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也有了解和体会，但他真正深刻了解劳动人民是在他留法当工人的时期。邓小平在莫斯科时这样总结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牢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充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11页）毛泽东在成为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虽然接受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但多是间接的，毛泽东基本上是在湖南率领一批先进分子进行探索，他是湖南中共党组织的组建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一成为共产党人就是党的一位领导人。邓小平则是在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周恩来和留法的其他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下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他不是“创党”的，而是“党创”的，相对毛泽东来说，邓小平是晚辈，他在入党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从事党的基层工作。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又具有基本的相同点，这就是：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都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都坚持与实际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起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早期的情况时，谈到了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湖北的董必武，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以及广东、湖南、留日的许多早期党员，其中特别还讲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中建党的情况。他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毛泽东提到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等人外，还有陈毅、聂

荣臻、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蔡畅、傅钟、何氏工、李大章、欧阳钦、李卓然、萧三，以及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罗学瓚、张昆弟、颜昌颐，鲁其昌、袁庆云、熊雄，等等。这其中，更有一位当时毛泽东还不曾相识，而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并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

党的命运和党的事业如同一条红线把这些人牵到一起来了，而且这条线越牵越紧，越牵越近。

2. 大革命热潮中，毛泽东 在南方从事农运，从苏 联回国的邓小平在北方 从事军运，在革命危急 关头他们第一次相会在 武汉。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始走向高潮。从1924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大革命”。

大浪淘沙。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毛泽东的业绩和毛泽东的思想初次显示了金子般的光辉。周恩来的雄才大略及其对革命的耿耿丹心，也越来越为全党所认识。年仅二十岁冒头的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可谓初出茅庐，但也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才华。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人民的领袖，那些不坚定者终被历史所抛弃。

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先是在上海以主要精力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宣传工作。1925年起，他越来越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著名的“五卅”惨案之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毛泽东在他的故乡湖南发起农民运动，显示了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此后，毛泽东就开始以其主要精力从事、思考和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1926年5月，时任中央农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主办了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亲自授课，开设“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讲习所还开设了军训课程，请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主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广西的农运领袖韦拔群就是广州农讲所的毕业学员，后来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助手和战友。

当北伐部队胜利进军武汉之后，毛泽东曾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在大革命热潮中农村的革命运动，热情赞扬农民革命的丰功伟绩。他在3月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的经典名著。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川政策。接着，毛泽东又主持举办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也都从事过革命运动骨干人才的培养工作。众所周知，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该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和人才。而此时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在北方曾参与主办过号称“第二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这恐怕还鲜为人知。

此事得从冯玉祥将军说起。

在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冯玉祥将军于1924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有系军阀政权，随后与孙岳、胡景翼组成国民军，冯玉祥亲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控制北京局

势的冯将军，这时通电主和，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建国大计。孙先生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应邀，抱病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不幸的是，孙中山到达北京后因肝癌恶化，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孙先生的逝世使国共两党革命同志十分悲痛，更加激励他们为完成总理遗志而斗争。同年10月，苏共中央决定为纪念孙中山先牛，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在国共两党从国内选派学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时，中共还决定从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中送去一批学员。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这时的邓小平，由于作为中共旅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进行革命活动，已引起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正在追捕他。对邓小平这段时期的行迹作过深入调查并查阅了法国当时警察档案的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记述道：

1925年11月15日，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在巴黎布瓦耶大街23号主持有四牛七名人员参加的会议，号召展开“持久的国际反帝斗争”。可是警察搞不清楚邓的住址。直到1926年1月3日，警察才侦得邓的住址。警察于1月8日闯进邓小平的住处时，在桌上和书架上发现了用法文和中文写的广告品、宣传材料，如《中国工人》、《孙逸仙遗嘱》、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莫斯科出版的报纸，却没有见到邓小平本人。这些官员们还发现了油墨、印刷滚筒和印刷纸张，证明“油印博士”一定居住于此，然而，法国警方万没有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即1926年的1月7日夜，邓小平和他的十九名同志已乘上巴黎到莫斯科的夜班快车，安然离开了生活与战斗过五年的法兰西。

另一位匈牙利学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其所著《邓小平》一书中也依据法国警方档案描述了邓小平离开法国的过程，其中还透漏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情节：

当时警方还不知道邓已离国境，竟然还作出驱逐邓等出境的决定。这张1926年1月20日签发的驱逐令，特地注明要“面交”被驱逐者，而邓等离开法国已十三天了，早已到达红都莫斯科。这张无用的文件至今还保存在法国警察的档案箱里。

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后，先进东方大学，不久又转入中山大学学习。此时他的俄文名字为多佐罗夫。他被编入第七班即“理论班”，担任该班党小组长。除学习俄语外，还要学习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军事学和马列原著选读等课程。由于他已有在法国五年的实践斗争经历，再加之头脑机敏和刻苦好学，很快因学习成绩突出和能言善辩在同学中闻名。大家给这位四川的小个子又起了一个“小钢炮”的雅号。在他的同学中，有两个人年龄最小，一个是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们当时才十五六岁。蒋经国顽皮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虑，像个快活的小鸟。1982年，七十八岁的邓小平回忆说，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得不错”，邓小平在中山大学还结识了毛泽东的老师

徐特立，徐当时已五十岁，在“特别班”学习，青年学员给徐老也起了个雅号“老祖父”。“小钢炮”这时虽然还没见到毛泽东，却和毛泽东的老师“老祖父”做了同学，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小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群众关系“密切”，对学习功课“很有兴趣”，发挥榜样作用，“可以影响他人”，“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反映了二十二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时写的一份自传中，也表示说：“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如今，“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更加充实了邓小平的理论基础，为回国迎接严峻的斗争作了准备。他说：“我来莫的时候，便以打定主意更加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149、150、151 页）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同国内的同志接触更多了，了解的情况也更多了，深深为国内正在兴起的大革命高潮形势所吸引，期盼着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令他高兴的是，机会终于来了。

1926 年 5 月 9 日，冯玉祥将军偕夫人到苏联考察。其时，冯将军在苏各地参观访问的同时，也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冯弗能送到这所革命大学学习，他本人也被授予“名誉学生”，随时可到该校参观、听课或发表见解。同学们对这位爱国将军也非常尊敬，很愿意和这位传奇人物接近和交谈。这次访苏使冯将军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坚定了参加国民革命的决心。他主动向苏共和中共提出请求，希望能派出顾问和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协助工作。苏共决定派出九十多名顾问，中共也决定派出正在莫斯科的刘伯坚、邓小平等二十多名人员，到冯部实行合作。1926 年 7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9 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接着北伐战争便打响了。冯玉祥在苏联得知这些消息后，当即于 8 月 17 日乘东方快车回国。中共党员刘伯坚同行，后被任命为冯玉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这时已是国民党员的冯玉祥，还兼任着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 月，他率西北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陕进军，同南方的北伐军相呼应。11 月 28 日，攻克古老京城西安，控制了甘、陕两省。南方的北伐军也势如破竹，于 10 月 10 日攻克武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在华东战场上，北伐军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和南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被派往冯玉祥部的邓小平等其它二十几名共产党人，1926 年底从莫斯科动身回国。他们先乘火车，继乘汽车，到达蒙古的库伦后，邓小平等三人打前站，乘坐苏联援冯的军火汽车，经蒙古艰难跋涉三个月，于 1927 年 3 月到达西安。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后又兼任教育长。这所军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军驻陕总部，实际上却是由

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阵地。邓小平是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学员总队长许权中，政治教官李子洲、刘志丹等，均为中共党员。邓小平负责政治教育，给学员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 ABC》、《国家与革命》及《劳工神圣》等课程。学校教育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学校生活生龙活虎，紧张活泼，被誉为“西北之黄埔”。自 1927 年 3 月至 6 月，学校共招收两期学员一千余人，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政骨干力量。党掌握的这支武装力量，在后来的渭华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北红军的一些著名将领如刘志丹等，大都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

在大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革命阵营内部却酝酿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反共，反国共合作的面目越来越暴露出来。1927 年 4 月，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戮，各地国民党右派也纷纷实行“清党”，新军阀和老军阀一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党的最早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英勇地牺牲了。这批共产党人中，有的是毛泽东的老师、战友和同事，有的是邓小平的留法同学和领导人。他们的牺牲使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及全党都十分悲愤。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在南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向陈独秀总书记提出了许多挽救危机的建议，要求党克服右倾错误，加强对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领导，坚决顶住蒋介石的反共逆流，然而均未被陈独秀接受。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冯玉祥虽没有立即公开跟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但对与共产党的合作也一度产生了动摇。冯玉祥完成东征，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之后，于 6 月 10 日与汪精卫召开郑州会议，6 月 20 日与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促成“宁汉合流”，终于也开始了“反共清党”。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邓小平在党组织安排下，遂转赴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汉口。

冯玉祥将军在其晚年所写《我的生活》一书中，对这一曲折曾作了记述并感到内疚。但是，邓小平不记个人恩怨。1982 年 9 月 14 日，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冯将军的亲属时，曾回忆起他从莫斯科归来在西安参与主办中山军校的情景，并对冯玉祥将军作出公正评价。他说：

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怀念她……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 年蒋介石在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邓小平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点缘的。（《邓小平的历程》上第 46、47 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当然，对于邓小平来说，和他更有缘分的是另外一位与自己同属一党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正在武汉，邓小平也到了这里，两人在这里终得第一次相会。

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革命转折关头的时期。徐州会议之后，汪精卫于 7 月 15 日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

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更加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严酷的白色恐怖立刻笼罩了武汉三镇，也笼罩了全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屈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周恩来秘密从武汉进发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以及上海、湖南、湖北的代表和军事代表共二十一人。邓小平他由西安转赴武汉后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已由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担任党中央政治秘书。

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他当时与瞿秋白夫妇、李维汉同任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12号）。会议地址选在离德林公寓不远的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疏散。瞿秋白在会议前夕曾问邓小平：“会议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邓说：“都已安排好了，代表们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洛卓莫娃（国民政府的苏联农业顾问的夫人，其住宅即是会址）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邓小平为筹备会议早在8月3日就来到会址，会议结束后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在这里一共呆了六天。

对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邓小平记忆犹新。解放后，在筹建八七会议纪念馆时，他在1972年9月22日写下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1980年5月20日，他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匾牌。是年夏天，邓小平在视察长江三峡时，于7月15日来到纪念馆进行参观，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

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到任。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的，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邓小平的历程》上第49、50页）

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主持下，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再由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常委作报告，然后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

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给会议参加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成为后来全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它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的转折点，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大会议，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有单独的交往，但毛泽东的慷慨发言，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对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无疑发生了重大影响。

邓小平在参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时，端详着毛泽东等会议参加者的照片，感慨地说：“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八七”会议，毛、邓开始相识，自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开始不断增多，不断密切。

3. 二三十年代之交，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邓小平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也参与了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
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汇合”。

见也匆匆，别也匆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短暂相会之后，便又各奔东西，继续从事党的革命活动。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按照会议的决定，当即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把夫人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安排回老家板仓居住，全力投向起义的领导工作。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是很重儿女情的，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更重救国志。此次与妻儿的分别，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与开慧的永别。对开慧的英勇牺牲，他非常悲痛，更引为骄傲。他把开慧称为“骄杨”，说：“开慧之死，百身难赎”，开慧“为革命失其元，焉能不骄？”

毛泽东于1927年8月18日出席了在长沙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问题。他再次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指出党要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会议通过决定不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起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且臭气闻干天下”。8月30日，省委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9月初，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自己军队的旗号。9月9日，起义按预定计划打响，五千工农革命军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发。当多路起义军连连受挫之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于9月14日在上坪召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各部到文家市集结。会师后，9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发。部队在向南进发中，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毛泽东再次召开前委会。决定进行整编，由师改为团建制，下设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确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军队纪律。“三湾改编”后，10月3日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随之在这里开辟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在实践中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农村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在赣南、闽西建立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朱毛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及以后，党还在全国各地开

辟了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许继慎、徐向前、郭述申等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冯白驹、王文明、杨善集等领导的海南岛革命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任弼时等领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

邓小平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七、八军的实践，是他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并且与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创造相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邓小平继留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被提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在1984年3月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他个人的经历时说：“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后来他在讲到选更年轻同志作接班人时又说过：“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中央军事部长。他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于11月上旬回到上海。这时，中央又决定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等科。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代主任、主任，李维汉为组织局领导成员。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主要就是协助周恩来和李维汉工作。他很快就熟悉了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几个月就能流利地说上海方言，以掩敌人的耳目。秘密的中央机关开始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中央负责人常在这里开会，邓小平就在一张小桌子上作记录。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时候，邓小平与一位杰出的女性、共产党员张锡瑗相爱并结婚。张锡瑗祖籍河北良乡，1907年生于保定。其父张镜海是铁路工人，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并担任保定铁路工人代表。锡瑗是长女，下边还有两个妹妹锡瑞、锡珍。锡瑗思想进步，在她的影响下姊妹三人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颇有名气。锡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同年党选送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是同学。大革命失败后，张锡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不久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两位老同学又相会了，并且又一同到了上海。1928年小妹张锡珍（改名张晓梅）也到了上海，由邓小平夫妇介绍加入党组织。张晓梅后与共产党人刘冰结婚，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成为中共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1928年4月到9月，由于中央负责同志大多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因此决定成立留守中央，由李维汉和任弼时负责，邓小平仍任秘书长，协助李、任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经常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并把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的联系，或来往信件，或来往密电，或来往人员，许多都要经邓小平之手作出安排与处理。

是年6月4日，中央给朱毛发出指示信，指明“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批判了那种认为是“社会革命”的错误理论，还批评了“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同意朱毛领导的湘赣边界“实行土地革命，

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的计划，指示信明确指定“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成”前委，“毛泽东为书记。”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说，中央“这书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并依照指示信重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这个报告就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山的斗争》。

1929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为保存实力”，红军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决定调朱毛离开井冈山去学习。周恩来于2月7日为中央起草了给朱毛的《二月来信》，传达了上述意见。朱毛红四军前委接信后，于4月5日向中央报告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此信的主要内容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这时，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周恩来的认识也在改变。4月8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中，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此后，朱毛红四军和各地红军利用蒋桂和各路军阀战争之机，得到很大的发展。作为分管军事和苏区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并兼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更是与各地红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各苏区向中央送来的文件都是用药水书写的，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接到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抄好后立即交他看阅。尤其是对朱毛领导的红四军报送的文件，他更加重视。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朱毛4月5日的报告，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中央《二月来信》所讲的问题“有些毛病”，并再次提出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干部和中央一起讨论问题。其间，在红四军领导中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8月下旬，红四军领导人之一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并一起研究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以及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文件于9月28日定稿，并由陈毅带回，这便是中央的《九月来信》。此信支持毛泽东恢复领导职务。周恩来在陈毅临行时又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九月来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论断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一致的。陈毅回到红四军后，按中央来信的要求，恢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并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对上述朱毛与周恩来、中央的联系和交往，对井冈山和红四军的发展，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见解是知情和了解的。事过几十年后，邓小平曾回忆说：“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他还对陈毅的女儿说过：“我从你爸爸那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毛泽东和红四军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随后领导百色起义和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9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瑞、俞作柏酝酿反蒋，并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希望中共能派干部去广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派一批干部进广西，到俞、李政府

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派谁去领导呢？军事部长周恩来推荐二十五岁的邓小平担此重任，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重儿女情，更重救国志的共产党人。那时，他刚结婚才一年多，而且妻子锡瑗已怀孕在身，但为了革命事业，邓小平毅然与妻子相别而赴广西。

邓小平于1929年9月到达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开展统战工作。此时，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央还选派了陈豪人、张云逸、龚饮冰、龚鹤村等到广西协助小平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又陆续派了四十多名干部到达南宁，在小平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10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把中共已经掌握的三支武装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月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作出决定，12月11日发起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一生中多次担任人民武装部队政委，而这是第一次。邓小平后来曾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

一切部署妥善之后，邓小平接中央指示，命他回上海报告工作。12月初，邓小平在赴上海途中，和李明瑞相遇，他们又回百色研究和部署了龙州起义和建立红八军事宜。百色起义按既定计划如期胜利举行。

1930年1月，邓小平到达上海后，向中央报告了工作。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肯定了邓小平的工作，并对红七军、红八军以及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作了指示。

此时，邓小平的妻子张锡瑗却不幸死于难产，女儿也未能保住。十分悲痛的邓小平，却没有时间安葬亲人，因为百色起义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未巩固，龙州起义正在加紧准备中，事事都等待着党代表邓小平的指导。二十六岁的邓小平把失去妻女的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拜托同志们料理后事，便匆匆赶回广西。

2月7日，邓小平回到广西龙州。这里，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刚刚于几天前建立，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俞作豫任军长。李明瑞在邓小平的帮助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此时已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后来，红八军在敌人优势力量的进攻下遭受较大损失，退入右江与红七军合并。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右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党发动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七千余人，红色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党领导的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均有所了解的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借鉴了其他根据地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中央根据地的成功经验。百色起义刚刚打响之后，即1929年12月中旬，邓小平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上所作的“补充报告”中，提出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红七军公布的《目前实施政纲》中也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汇合”的口号。邓小平在1930年1月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又

讲到了“造成与朱毛汇合的前途”。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肯定了邓小平的“与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意见。中共中央3月2日正式下达《给中共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指出红七军在编制上“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并再次肯定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发展方向。（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24、225、226页）

红七军的老战士莫文华将军曾回忆说：

1929年12月，我党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

远离井冈山的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人民，正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年代，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并把自己的斗争以与朱毛相会合作为方向。

当时在湘赣苏区的王震将军曾回忆说：

在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同志坚决走“朱毛”井冈山的道路，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到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农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创建了全国瞩目的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在湘赣苏区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都很振奋。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后，小平同志担任了两军总政委和前委的领导工作，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我认为这两次起义有其独有的特点，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经验。（《我眼中的邓小平》第1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可以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

同时，如王震所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自己的特点，并非完全照搬其他根据地的经验。例如，起义是在党与主政的国民党人俞、李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发动的；起义既不是单纯的军事哗变，也不是匆忙之举，而是党所掌握的一部分正规军成功地与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工农兵联合起义；根据地处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点，红七军中壮族同胞占了一半；根据地地处边境线，与法殖民地越南毗邻，面临直接的反法帝国主义的斗争等。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浑代英、李富春等组成苏区军委。（《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19页）自“八七”会议之后，毛、邓虽然没有再见面，但他们同是苏区军委委员，党的农村武装斗争事业使他们成为同一领导机构的成员。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对当时统治党的“城市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城市中心论”者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应照搬苏俄的做法，首先在中心大城市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再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他们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尤其是要放在大城市。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与“城市中心论”不同的见解，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论证了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毛泽东在后来的斗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逐步完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战争。而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无产阶级要革命要胜利，就必须首先占领农村，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巩固的根据地，在这里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而“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毛泽东还论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仅必须走而且也完全可以走得通。

但是，毛泽东当时还不是中央主要成员，他的意见自然也谈不到在中央占什么地位，甚至还受到排挤和打击。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中央，制定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命令朱毛进攻南昌，命令彭德怀进攻长沙，贺龙配合夺取武汉，方志敏进攻九江，邓小平攻打柳州、桂林后再夺取广州。对这一冒险计划，毛泽东、邓小平等虽进行了抵制，但还是不得不在组织上服从。上述计划除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之机攻占了长沙十天后又被迫退山外，均遭失败。9月2日，中央命朱毛再攻长沙失利，被迫撤回江西根据地。11月10日，在中央的命令下，邓小平率红七军七千多人离开根据地北上，准备攻打柳州等大城市。但红七军一离开根据地，就立即陷入被动。部队连连受挫，至1930年底，人员已损伤近半。1931年1月初，邓小平于行军途中在桂北全州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部队开往湘粤边界，到江西与朱毛汇合。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整个红军减员达三万余人，部分农村根据地因此而丧失。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路线，从反面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毛泽东在其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这一理论进步作了系统的总结。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探索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同时它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

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邓小平，在他一开始独立地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时候，便与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联在了一起。

4. 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
受到王明“左”倾路线
的排挤和打击，邓小平
也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
路线被打成“毛派头
子”，从而第一次被“打倒”。

邓小平率领红七军整编后的四千余人，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行程七千余里，于1931年2月占领江西省崇义县城。这时，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汇报。7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将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央递交了《红七军工作报告》。而此时被王明“左”倾路线控制的党中央，认为邓小平和红七军执行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很显然，王明路线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于是，邓小平在上海被“打入冷宫”，几个月中央竟没有派人同他交谈。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回红七军工作，未被批准。他又提出到苏区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他赴中央苏区之前，临时又接受了中央委派他巡视安徽党务的任务。当时安徽白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等一批党员被捕牺牲，党组织联系中断。中央得知情况后紧急委派邓小平为巡视员，于5月上旬由上海乘船到达芜湖，处理安徽白区党内问题。完成这一任务后，邓小平即打点行装，从上海启程秘密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8月到达中央根据地，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饱尝“左”倾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苦头的邓小平，一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便加入到这块根据地的开辟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毛泽东的行列。他到任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迅速而坚决地纠正了前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冤屈的大批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实现了安定团结，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当时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正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邓小平作为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也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为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作最后的准备，并把领导机关迁驻在这里。作为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江西省的领导人一起迎接毛泽东、朱德等的到来，并向朱毛汇报了瑞金县的情况。这天夜里，邓小平等在叶坪村东大樟树底下的一幢二层楼里，向毛泽东和朱德等汇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很满意邓小平的高效率，很满意瑞金的工作。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选举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大会还决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更名“瑞京”，划为中央直属县。二十七岁的邓小平，继续担任该直属县县委书记。1932年5月，邓小平又调往刚解放的会昌城，去开辟

新区工作，随之担任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中心县委书记。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瑞金的会见，是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在其间四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但各自一方，并没有机会面谈过。这次会见不久他们都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直到长征他们没有再见过面。这次会见给毛泽东的印象极深，直到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即1975年5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老人家还谈起这次会见。他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里的“一面”就是指1931年9月他们在瑞金的相见，“毛派的代表”则是指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路线而受到王明路线残酷斗争并被“打倒”的往事……

王明“左”倾路线是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统治中央的。这条路线很快使白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左”倾的；临时中央被迫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当然与坚持农村中心论的毛泽东不相容，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山沟沟里的东西，而山沟沟是不出马列主义的。”他们诬称毛泽东是“农民意识”，是“富农路线”，是“狭隘的经验论”，推行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左”倾的临时中央指示下，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连连批判毛泽东，并撤销了他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毛泽东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力主正义，为毛泽东辩护。他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章，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和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向“左”倾教条主义发出质疑。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办法。邓、毛、谢、古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勇敢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左”倾的临时中央所不容。邓小平等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辛辣嘲讽，使那些被讥讽者极为恼火，并认为其“后台”必是毛泽东。

“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打击的主要对象当然是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他们还不敢在党外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公开的批判，于是就先拿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开刀，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继而又对邓、毛、谢、古冠以“江西的罗明路线”进行打击。很显然，这些都是对着毛泽东的。

1933年从春到夏，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3月31日，中央局指示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批判邓小平。会议决议称“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说邓小平这种“防御路线”是“完全表示悲观失望”，是把红色根据地“交给广东军阀”。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随后批

判更为升级。4月15日，政治局常委洛甫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称赞“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洛甫以此来证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号召“与之做最坚决的斗争”。第二天始，即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在中央局的指示下，召开工作会议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揭发批判”。会议把他们打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5月4日，中央局指示工农红军学校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再次批斗邓、毛、谢、古，并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提出：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决议》警告说：“这些同志如果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队伍。”5月6日，中央局授意中央组织部长罗迈发表《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邓小平等人，指出：邓小平在上海“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大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机会主义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文章号召“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文章要求邓小平“必须承认错误”，“完全解除武装”，交待“小组织活动”，“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六大以来》上第362—36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些批判者子虚乌有地硬说邓小平等有个“小组织”，用最大的气力追查这个“小组织”，施加最大的压力让邓小平承认这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要最终查到毛泽东的头上。1984年，曾经参与这场批判的李维汉在去世前留下的回忆如是说：“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邓小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毛泽东对此心里十分清楚邓是为他受冤。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说过，那时批判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

但是，邓小平等人始终没有让这些批判者满意。心底无私天地宽，面对那些“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对没完没了的追查，邓小平总是坦然地回答：“第一是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此时，他的第二次婚姻也由此遭到了破裂，在最困难的时刻，当妻子拿着高婚报告到拘留室让他签字时，他没有提出异议，挥手签了字。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来中国为其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收集资料时，中国著名传记电影作家王愿坚向哈氏提供了他收集的一则有趣的故事：邓小平在被关押时，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遇到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邓对唐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唐就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让邓来往所吃了一只，把另一只带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这故事说明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同情邓小平的，也说明邓小平的坦然和豁达。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我“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1页）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贺昌是邓小平的老战友，曾和邓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两人相知甚深。贺昌对邓小平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邓要到总政担任秘书长，后又派到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20页）

1934年10月，邓、毛、谢、古这四人中的邓小平和谢唯俊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另两位即毛泽覃、古柏被留下来，参加游击战争。毛泽覃于1935年4月25日在江西瑞金附近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二十九岁。古柏在同年的初夏也在战斗中捐躯。谢唯俊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底在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邓毛谢古”只剩下了一个“邓”。

党的“四老”之一林伯渠老人，当年得知邓毛谢古中的三人牺牲的消息，曾悲痛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林老的诗，谴责了只会“读八股”和对同志“割截无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之情，也寄托着对邓小平的热诚希望。

毛泽东对其胞弟毛泽覃的牺牲，其悲痛程度自不必说，对谢、古的捐躯也尤为痛心。他为战友古柏写下了如下悼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
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对幸存的邓小平，对四个“罪人”中幸存下来的唯一生者，毛泽东更是终生难忘。在“邓毛谢古”事件发生三十九年之后，即1972年的8月，毛泽东亲自提议“解放”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邓小平，他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邓小平在四十七年后的1980年，和外国记者也讲过这段历史。他说，当时王明指责我站在毛泽东一边，于是把我一脚踢开。等了三年才给我平反。这是指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由“沉”到“浮”，邓小平也随之由“落”到“起”。

5.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
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得到确立，邓小平也得到解
放，其后和刘伯承一起领导太行
山抗日根据地，显出政治家、军事家的丰采。

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揭露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邓小平出席了这次在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他是在不久前红军路过黎平时，接替了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以《红星》报主编和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毫无疑问，他完全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使受排挤的毛泽东翻了身，为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受到打击的邓小平也得以解放。历史为邓小平施展才华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在遵义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一直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和毛泽东一起住，一起行军。邓小平负责管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首长的生活、办公以及警卫工作。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渡沪定，翻越雪山，历尽了千辛万苦。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毛泽东、王稼祥把精干的邓小平从秘书长的岗位上调往前方，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接替邓小平继任中央秘书长的刘英，曾向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讲述过这一过程。她说：

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少，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

刚过而立之年的邓小平，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在前线和红军战士一起拼杀前进，于8月下旬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9月9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即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邓小平和所在部队跟随毛泽东和党中央，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千里雪，占领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红一方面军至此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50页）1936年2月，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邓小平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军事行动。红军在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拦截后，于5月5日回师河西，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不再使用反蒋口号，呼吁国共议和抗日。东征结束，邓

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和华北事变之后，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此形势下，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国共两党二度握手，实现再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侵略。按照协议，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朱德联名发出命令，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为主编成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后把“指挥”改称“司令”，中央军委又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把“政训处主任”改任为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组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建制的命令后，邓小平在陕西云阳镇大操场主持了抗日誓师大会。与会全体八路军健儿，跟随朱老总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群情激昂，威武雄壮，场面十分感人。

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诸负责人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及机关人员，从云阳镇出发，至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21日到达太原。已先期到达太原的周恩来，又命邓小平兼任第二战区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欣然受命，当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进发，开展战地动员和组织抗日游击战工作。在此前后，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也迅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出师后，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取得巨大胜利。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在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敌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继而在正大路南侧连续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后，毛泽东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388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是，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逐步得到实现。

1938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调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接替回延安养病和另有任用的张治（后在延安病逝）。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相差十二岁的四川老乡，一位是军事家兼政治家，一位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互支持，相濡以沫，历尽千难万险，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刘邓和刘邓大军自此愈来愈名扬天下。

在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率领下，一二九师深入敌后，以毛泽东所总结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法，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控制太行，不

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在解放战争中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时在太行山八路军中流行着《我们在太行山上》的革命歌曲，歌词是：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大行山上，
气焰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在哪里进攻，
我们就叫它在那里灭亡！

这歌，既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豪情壮志，也反映了太行山斗争的实际情况。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向平原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1938年4月，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收复武乡、沁源等十八座县城，把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奠定了晋豫根据地基础。1939年1月，粉碎日军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的“扫荡”，歼敌两千余人。之后又粉碎了日军对山区的“扫荡”，再歼敌两千余人，保卫了根据地。

1939年，在日本诱降及英、美劝降下，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开始改变其抗日政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年冬天，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地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从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毛泽东

向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发去谈话。明确阐述了对待反共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和邓小平依照毛泽东制定的原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3月，指挥一二九师奋起反击，一举全歼入侵的朱怀冰部及其他游杂武装一万余人。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总结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经验时，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同年8月起，刘邓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1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把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加上连年天灾，使大行山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于1943年10月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邓小平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调动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战胜困难。他从实际出发，发表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二九师在抗日战争中共歼敌四十二万余人，解放县城一百零九座，创建了十八万平方公里、两千四百余万人口的地跨四省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由出师时的九千一百余人发展到近三十万人，成为党的强大主力武装力量之一。

同党和毛泽东的历史命运相联结，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遵义会议以前被贬和不幸的邓小平。他不仅赢得了党的信任，毛泽东的器重，人民的热爱，而且也赢得了新的幸福家庭。1939年9月，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与卓琳结婚。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火腿世家”。父亲以生产和经营宣威火腿而驰名中外。卓琳先后在昆明、北京读完中学，193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物理。1937年和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和工作时与邓小平相识相爱。1939年9月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卓琳在毛泽东的住处举行了婚礼，毛泽东亲自向他们表示祝贺。新婚不久，他们就双双返回抗日前线。1941年，他们的长女出生，母亲给女儿取名邓林。1943年，他们又喜得一子，父亲建议起名“太行”，以纪念太行山的斗争，母亲不大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被父亲取用此名。这样，孩子已两岁，还唤作“胖胖”，没有正名。一天，卓琳笑求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道：“那好！”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着“朴实方正”四个大字的素笺取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个朴方好不好？”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长子邓朴方的名字由此而来。邓小平和卓琳，他们在战争烽火中相结合，在政治风浪中受考验，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走过了一程又一程。他们共有二男三女，有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幸福家庭。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同邓小平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1942年12月15日，在刘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邓小平撰文热烈称颂这位长者的卓著功勋，并说：“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周恩来后来同薄一波曾谈论过刘、邓之间的默契配合，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刘邓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毛泽东也认为刘邓的合作是好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期间仍称赞“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至于邓小平自己则更认为他与刘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说：“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确实如此。在许多作家、记者的有关文稿中，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

“、”号的；在许多老百姓的心目中，刘邓就是“姓刘名邓”的一个人。

刘邓连结在一起，就是一座巍巍太行山！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太行山根据地共同奋战了十个年头。他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1949年10月1日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随后又一同统率大军挺进大西南。1950年10月，刘伯承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飞往北京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分配他创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此后，刘邓才不得不分开。一位成为“中国军校之父”，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一位成为我们党的总书记。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四岁。10月14日，在向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向前的，是四十多年前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太行山双雄“刘邓”中的邓小平。他向刘帅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这位昔日的老搭档。在邓小平的身后，他的夫人卓琳及全家成员，缓缓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起向他们敬仰爱戴的刘帅最后告别。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在灵前，满眼噙着泪水，向这位为他取名的刘伯伯致哀。

10月16日，邓小平亲自主持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伯承元帅追悼会。

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邓小平写的《悼伯承》一文。

6. 在太行山邓小平善于把
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
政策与实际相结合，实
事求是地回答了毛泽东
指示调查的问题，毛说
邓的回答“内容极好，转
各地参考”。

1941年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了克服解放区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这些政策概括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包括：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毛泽东后来指出，在这些政策中，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107—1108页）

在此期间，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太行山根据地不仅开展了整风运动，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大生产运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政策。

太行山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有特色的，也是出色的，邓小平务实、求实、经济思想在这里得到初步的施展和发挥。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根据地的工作，制定根据地今后工作方针。温村会议的一个特征是把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列为三大议程之一，邓小平对此作了专门的讲话，强调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延安《解放日报》7月2日发表了邓小平的专文《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文章高度评价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的成就及其意义，指出“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指出，“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还有“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7页）邓小平不仅把经济工作的胜利与军事斗争的胜利联结起来，而且与政治战线和政权建设紧密联结起来，充分肯定了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我们“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7、78页）因此，他强调根据地政权工作的重点应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向经济建设倾斜。1944年4月1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以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名义发布了鼓励发展生产的《滕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滕代远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杨立三手订的，得到了邓小平等北方局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当时，有

一种“左”的倾向，严重地影响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那些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经常受到责备，说他们“搞资本主义”，是“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等。有一些人把“共产主义”挂在口头上，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邓小平支持《滕杨方案》，严厉批判了这些错误观点。《方案》依据毛泽东和李富春当时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多，你所得的也越多”。

《方案》还“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二十八年间·三编》第1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在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还特别提倡重视科学技术，非常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人行群英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农林局在张克威同志领导下，已经收到显著成绩，即以改良种籽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一百万石以上粮食。这种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太行山土地不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这里，我们不要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应把科学离开了实际，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我们英雄们的创造，把它整理起来，好的发扬，坏的去掉，就是很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35页）邓小平主张对在生产劳动中作出贡献的给予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1943年9月21日，他在根据地 and 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制定“奖勤罚懒”的制度，对先进个人可以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的奖金。当时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一二百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有些同志说是否太高了？邓小平答：“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这、肖息时，邓小平又将有关奖金数额提高到“二百元到三百元”。

太行山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保证并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军事、政权、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根据地不仅渡过了难关，恢复了失地，还大大向前发展了，使其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堪称第一。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为使中央在今后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正确的指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十项问题。这十项问题主要包括：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抚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后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安排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等等。（《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2页）毛泽东要求用当地材料进行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田茜如，《刘伯承与邓小平》第21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立刻着手收集材料，认真准备答复报告。8

月 24 日，他以大行区的具体材料，写就了对毛泽东所提十项问题的答复报告，电复延安。这份仅有五千字的报告，内容充实，生动具体，言简意赅，既包容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又有深刻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报告既报喜又报仇，毫不回避矛盾，也不掩饰错误和问题，为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报告十分满意，立即批示转发各根据地参考，毛主席于 12 月 25 日复电邓小平说：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569 页）

是年 12 月 3 日，邓小平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和战争影响，普遍灾荒，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注意粮食物资的积蓄。华北各地当然应从生产、精兵简政中求得自给，不能依靠他区帮助。毛泽东非常赞同和重视邓小平的意见，于 12 月 14 日复电说：“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的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刘伯承与邓小平》第 221 页）

毛泽东从邓小平以及各根据地反映上来的情况为依据，在这一时期对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1945 年 1 月 10 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 月 31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游占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强调“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023 页）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宁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024 页）4 月 12 日，毛泽东审阅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结报告后批示说：“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产计划之报告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钟灏：《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纵览》第 207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4 月 20 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讲到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时，指出：“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解放区“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040、1041 页）4 月 27 日，他又为《解放日报》写了《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社论，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说，“一九四二和一

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106、1107 页）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正是从各解放区的斗争实践中吸取经验，才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原则。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领导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实践，证明他善于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区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在此期间发表的许多著作、报告，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7. 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是较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同志之一。毛泽东“希望邓要为党争气”。在党的七大上邓小平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以很大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1938年发表《论持久战》，1939年发表《共产党人 发刊词》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经受过错误路线的磨难和迫害，又经历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多年实践，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理论和路线的认识愈加深刻了。他经常把这种感受讲给同志们，帮助大家认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高执行这条路线的自觉性。1940年在纪念建党十九周年之际，他在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会上作报告说，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扩大了，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胜仗。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他又感叹地说，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这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他的这些经过多年沉淀而取得的认识，深深教育了大家。

但是，并不是全党所有的同志都有了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虽然批判和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高度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那种由错误路线遗留下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如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在党内还广泛存在着，它们还经常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1940年，王明在一篇谈《策略》的文章中，把自己打扮成土地革命时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同年3月，王明又重新出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序言中竟要求将此书列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教材。这表明，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重新表现出来。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进而又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党八股”形式主义以整顿文风，此后，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逐步开展起来。

作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领导了该根据地党的整风运动。1943年10月，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邓小平担任合并后的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动员开展整风学习。他指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他接着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指出“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算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86—88页）

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认识是相一致的。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党人，在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共识。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这一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同时，延安整风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了邓小平。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其中包括邓小平曾担任主要

领导人的红七军历史问题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941 年 12 月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文件汇编中，选用了“邓毛谢古”事件的有关文章、报告和决议，供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分清路线是非时参阅。人们在肯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肯定了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正确立场。1943 年 9 月上旬至 12 月初，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在 11 月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 1933 年的“邓毛谢古”事件，很动情地说了如下的话：“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短短二十七个字，把毛泽东对那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他对逝者的怀念和对邓小平的器重、期望之情，都淋漓地表达出来了。

当然，正如全党包括邓小平在内对毛泽东的认识那样，全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对邓小平的认识，绝不仅仅是看他的历史如何，更重要的是依据他在现实斗争实践中所展现的才华和业绩。

邓小平正是以自己的才华和业绩，越来越得到毛泽东和全党的信任和器重的。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邓小平因在太行山前方主持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刘伯承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即 6 月 10 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604 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三次短期回延安。第一次是 1938 年 9 月，他回延安参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错误主张，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邓小平等在会上围绕总结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作了发言，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第二次是 1939 年 7 月，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两周年的抗战，制定和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就是在这次回延安的时候，在 9 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与卓琳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刘英、博古、李富春、蔡畅、邓发等老战友向新郎新娘亲切祝贺。党的七大后，邓小平此次接毛主席的通知，是第三次回延安。6 月 19 日，他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8. 抗日战争胜利后，
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
判，邓小平和刘伯承一
起领导了著名的上党战
役，有力地配合了
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伟大的战略部署，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而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邓小平，在这些历史活剧中扮演了非常光彩照人的重要角色，并由此走向他的“第一次辉煌”。1984年3月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问及邓小平：“你最高兴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

时势造英雄。伟大的解放战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施展他们的雄才大略提供了很好的舞台。邓小平后来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8、336页）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的合作和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时局是严峻的。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内战的准备，同时又施展和平策略，以战争与和平这两手对付中共。毛泽东据此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方针。

1945年8月，蒋介石在加紧部署军事行动的同时，连续三次电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8月14日电称：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迪切恳盼之至。

8月20日再电，口气似乎更为“恳切”，电文中说：

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

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8月23日三电，口气简直是大有“急切”之感了，称：

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过，特再驰电速驾！

连飞机都预备好了，看你毛泽东还有何推辞？！

实际上蒋介石施展的是一种缓兵之计。从根本上消灭中共，这才是他的既定方针。但是，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又位在抗日前沿，蒋介石要把他的部队从内地部署到解放区前线，还需要时间。他要做出与中共和解的姿态，以稳住解放区军民，争得时间准备内战。从舆论上讲，这样可以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转向中共：如果毛泽东来重庆和谈，这是响应他的“倡议”；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则可由此攻击中共“不愿和平”。蒋介石的真实想法，是希望毛泽东和中共不要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洞察了美蒋反动派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但是，对反动派的这种阴谋，必须经过揭露和斗争，才能使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了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忖再三，决定由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针锋相对要看情况，以打对打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也是针锋相对。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谈判斗争与战场上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以实力作为谈判的后盾。

毛泽东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在延安和各解放区传开后，党内外群众大都认为这一决策十分英明。但也有许多同志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恐怕重演历史上发生过的“鸿门宴”。在重庆的友好人士也一方面期望毛泽东能来谈判，另一方面也担心毛泽东的安危。毛泽东和中央则认为有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有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要的是，头脑要清醒，斗争要坚决，要做好两手准备，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了谈判的方针，并告诫同志们绝对不要因为谈判放松对敌人的警惕和斗争。通知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毛泽东在起程前，专门与邓小平和刘伯承进行了交谈、共商如何打好上党反击战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把上党地区的军事斗争与即将进行的重庆谈判联在了一起。

上党地区，是指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城为中心的地区，古称“上党郡”。这一带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刘邓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在日军投降前后，刘邓大军迅速解放长治周围一些县城，并包围了长治及其他诸城。而国民党军史泽波部一万七千余人，也迅速侵入上党地区，从八路军手中占领了长治以及附近诸城。这样，国民党军就象一把刀子插入了一二九师的根据地。毛泽东临行前对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一定要组织好上党反击战，拔掉刀子。毛泽东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你们在上党取得胜利，我在重庆谈判就有本

钱；你们打得愈好，我们的本钱就愈多。”“要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准备的仗，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刘邓圆满地实现了。从下列时间表就可看出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邓小平、刘伯承在上党，文谈武打配合得何等默契：

8月25日，刘、邓从延安飞回太行山根据地，立即与在襄垣前线的李达取得电话联系。邓小平指示说：“一定要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的屯兵之地，然后会同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刘伯承向师部机关的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嘱咐，指出：“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我们必须迅速歼灭侵犯上党地区的敌人！”当日，刘、邓等负责人向延安发报，提出“预期十天内”发起上党战役。中央军委于28日电复同意。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飞往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蒋介石虽然三次电邀毛泽东，但对毛泽东的来临还是感到突然，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毫无准备。他的精力还集中在武力消灭中共上，在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天就密令重印所谓《剿匪手本》，用法西斯信条在其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的动员，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而重庆的人民则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柳亚子先生即兴赋诗称毛泽东来渝是“弥天大勇诚堪格。”毛泽东的勇气是来自人民，来自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也来自对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上党反击战的必胜信心。

9月2日，经过一天激战，刘邓大军在上党地区首战夺回襄垣城，歼敌八百余人，拉开上党战役序幕。此时的重庆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提出“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为谈判蒙上了阴影。同日，蒋介石向困守在长治的史泽波发了一纸嘉奖电，以鼓士气。

9月上旬，当重庆谈判中蒋介石提出“中共军队之组编，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国共双方在军队和解放区这两个实质性问题激烈争论的时候，刘邓在上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上党战役。刘邓集中大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及部分地方部队共三万余人，于9月10日开始上党反击战。

9月12日至19日，刘邓大军相继攻克屯留、潞城、长子和壶关，使长治守敌陷于孤立。接着，胜利之师包围了长治守敌。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战场上用枪炮批驳了蒋介石“政令、军令之统一”和否定解放区、人民军队存在的谬论。

9月下旬，正当刘邓大军发起对长治守敌强攻的时候，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两万余人，沿白晋线急行南卜，企图援救长治史泽波部。此时的重庆谈判已进行二十余日，双方能妥协的已作了妥协，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不能妥协的仍没有妥协。9月21日，国民党代表提出准备发表《公告》，中共代表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此后一连数日国民党方不再提起《公告》之事，也不进行谈判。蒋介石后来竟离开了重庆。很显然，他们是在等。等什么呢？等待阎锡山的“好消息”，等待彭毓斌发自上党的“胜利消息”，企图以此再向中共讨价。但是，刘邓使蒋介石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10月2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暂缓攻打长治，提出“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此方案当即密电重庆毛泽东主席，得到了批准。在此前后，刘邓一直与重庆的毛泽东保持着电讯联系。

10月3日至8日，刘邓指挥大军北上，在老爷山和磨盘脑一带与援敌激战数日，歼敌近两万人，敌酋彭毓斌畏罪自毙。蒋介石等到的就是这样的噩耗。他赶紧返渝拜会毛泽东，答应在中共起草的《会谈纪要》上签字，说：“家里搞乱了，少壮派打起来了，请先生回去维持维持吧！”

10月10日，《会谈纪要》在重庆签字。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刘邓于12日又全歼了弃长治城而逃跑的史泽波部一万七千余人。整个上党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等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二十七名，解放和收复城市六座。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并对毛泽东胜利归来献上了一份厚礼。

毛泽东对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十分高兴、十分兴奋。在谈判和战役都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10月7日毛泽东在重庆致函好友柳亚子先生，把他1936年2月“初到陕北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即《沁园春·雪》抄录送上。这是一首满怀豪情、气势磅礴的伟大同篇。词中写道：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里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后来解释过，是指当今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他在此时此刻把此同抄录友人，想必把在上党战役中骁勇善战的刘邓大军，也蕴含在诗人所颂“今朝”的“风流人物”之中了。

毛泽东回延安后，10月17日在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时，又兴奋地谈到了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他说：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在毛泽东作报告的同日，他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即“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邓小平和刘伯承及其统率的大军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9. 毛泽东回延安后立即部署平汉战役，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乘胜连续作战，争得高树勋部邯郸起义，在军事、政治两方面均获重大战果。

国共两党虽然在重庆和平谈判的“双十协定”上都签了字，但是，无论是蒋介石或者毛泽东，都没有认为国内和平能够真正实现，上党战役使蒋介石吃了苦头，被迫不得不在“双十协定”上签字，但他绝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毛泽东把他看得很透，在回延安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

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 1157 页）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重庆谈判所签协定的墨迹还未干，国民党军就开始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邯郸地区，企图打通平汉线，进而抢占东北。上党的枪声刚刚停息，平汉战役的枪声又打响了。

邯郸曾是古代赵国的都城，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抗日战争期间，该地区除邯郸等城市外，是刘邓大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占有重要战略地位。邯郸西部的大行山巅、清漳河畔，是刘邓开辟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地区。解放区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共太行区党委所属的领导机关，都设在邯郸西南一百八十多华里的涉县境内。这里是根据地的首脑和心脏。

蒋介石调兵遣将，要发起进攻的就是刘邓大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这一心腹地区。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氏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第三十、第四十军及新八军共七个师，从新乡、安阳沿平汉线向北进犯。其后又有第三十二军跟进，作为第二梯队。石家庄国民党第十六军也作出南犯态势，企图对邯郸实现南北夹击。

对付这股来犯之敌的任务，自然又落到了刘邓首长及其所统率的刘邓大军肩上。10月1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指出：“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兵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10月16日，刘邓发出《平汉战役作战基本命令》，指挥上党战役胜利之师向邯郸方向集结。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邯郸东南磁县、马头、滏阳河套一片沙氏地带，布设了一个口袋阵，准备放进敌人，各个歼灭。刘伯承风趣地说：要像猫吃老鼠那样，先把它盘软了再吃。邓小平也幽默地说：

这下子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黄粱美梦，恐怕就做不下去喽！邓小平语出双关，那历史上著名的“黄粱美梦”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这里，在城北建有“黄粱美梦”词。当年，那可怜的卢生曾在这里做过一个美梦；而今，蒋介石又想来做这美梦了。

10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汉战役的指示》，再次强调了“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意义极为重大。”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10月21日，马法五和高树勋率国民党三个军开始北渡漳河，侵入解放区。刘邓以一部实行阻击，主力则向预定战场集中。阻击部队以诱敌深入法，逐步把敌引入刘邓设置的口袋阵滏阳河套多沙地区。

24日，刘邓大军主力在邯郸东南形成对敌军的二面包围。26日，国民党军石家庄之第十六军和安阳夕第三十二军南北对进，以图增援被围之敌，然均被刘邓大军之一部所阻。同时，刘邓大军主力开始进攻国民党军马法五部，对高树勋所率的新八军实行佯攻。28日，刘邓大军发起总攻，战至30日歼灭了马法五部的第四十军第一零六师。此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高树勋的起义和敌一零六师主力被歼，对国民党军震动极大，再加之援军被阻，刘邓分析敌人必然向南突围，于是又在漳河以北于我有利地区布下阵势，待歼敌于退却之中。果如所料，31日敌军第三十、第四十两军向南突围，刘邓大军以正面阻击、两翼截击和背后追击之法，于11月2日将逃敌大部歼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被生俘。石家庄、安阳援敌见大势已去，亦随即撤退。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合计三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线的“黄粱美梦”。11月4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的电讯稿，把这一胜利消息传向世界。

争取高树勋起义，是这一战役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一个杰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战役的本身。邓小平自己也说过，“那次我们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

高树勋，字建候，河北盐山人，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任职，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保持距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河北抗日游击队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师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长兼暂一军军长，后改编为新八军任军长。1944年8月起，通过中共秘密党员王定南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对他排斥、不信任，一方面又任命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督令其北上进犯邯郸。其间，他派王定南多次与八路军高级将领联系。1945年9月初，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黎城接见王定南，刘伯承让王带回他给高树勋的信件，邓小平嘱王向高将军转告：请他认清形势，希望以后不断联系。高树勋读了刘伯承的信和听了王定南转告的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和问候，十分激动，并看望了八路军派往与之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9月底，高又派王与刘邓联系，希望“借道”北上。刘邓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了情况并得到指示：“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表现时，我当可予以适当援助”。10月2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赤岸接见王定南。刘伯承司令员说：“原来，我们曾同意高树勋率新八军单独北上，可是，现在沿平汉路北进的已不是高树勋的一个军，而是三个军。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也一起来进犯解放区。蒋介石的意图是：让十一战区这三个军进占北平一带，

以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邓小平政委接着说：“所以，党中央、毛主席明确指示，决不能让国民党这三个军继续北进。你回去告诉高树勋将军，希望他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立即举行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配合我军完成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的战略任务，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刘司令员又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摆脱蒋介石集团，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我们希望他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如果当断不断，会反受其难的。”王定南听了刘邓首长的谈话，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刘邓派汽车送王至邯郸以南、马头镇西北的车骑关村，因为高部已进驻马头镇并落入我军的包围之中。刘邓还应允原定26日凌晨发起的进攻，对高部改为佯攻，以留出争取该部起义的准备时间。

王定南26日清晨赶回马头镇，当即向高作了报告。高树勋思前瞻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终于作出“就地起义”的明智决定，并再派王定南赴八路军处，请刘邓两位将军派代表来商谈。王又立即赶往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所在地峰峰，向刘伯承和邓小平作了汇报。27日，刘邓首长派李达参谋长等秘密进入高部防地，与高进行了面谈。李达传达了刘邓对高将军的问候，高树勋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经过商谈，高明确表示：10月30日率部起义。高还提出，起义后，新八军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他担任总司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刘伯承、邓小平同等。李达代表刘邓答应了高的要求。

30日，高树勋发出通电，宣布所属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脱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再次专电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汇报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情况，并提出请军委转告陈毅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的家属。刘邓后又提出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妥善解决高在西安的子女及亲属的安全问题。

31日，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刘伯承、薄一波、李达等乘车来到马头镇，与高树勋亲切会见，高树勋率起义将士在三里多长的道路上夹道欢迎刘伯承的到来。刘司令员对高说：“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对高将军的义举，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给予高度评价。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邓小平政委，向你和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慰问和祝贺！”高感动地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如此关注，我高树勋是愧不敢当。刘司令员军务繁重，还要远道来此，真是不胜感激！”在交谈中，刘司令员还告诉高，其家属和子女的安全问题，中央已设法解决。起义后部队名暂定“和平建国军”，由高任总司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伯承同辈”。高树勋表示非常满意和感激。双方议定，起义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到邯郸西北方向的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东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来贺电称：“建候吾兄勋鉴：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闻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刘伯承、邓小平和其他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人也发来了贺电。

高树勋这位农民出身的爱国将领，为追求正义奔波奋斗了近半生。他在率部起义过程中直接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教育，经过大起大落的思想斗争，终于大彻大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1945年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率领的部队在解放战争和以后的剿匪斗争中，屡建功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劲旅。他本人在解放后曾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在北京病逝。邓小平一直很怀念这位爱国将军和革命同志。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和老同志座谈二野战史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7页）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刘邓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工作十分满意。11月2日、3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致电周恩来，通报平汉战役进展情况和争取高树勋起义的情况。毛泽东在电文中兴奋地说：“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刘邓随后致电中央军委，在初步总结平汉战役的经验时，也强调了“必须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故拉了新八军，接着消灭了三十、四十军，打退了三十二军并十六军，在政治与军事上给了双重打击。”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12月15日他为中共中央拟定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74—1175页）解放战争的发展史表明，“高树勋运动”确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以高树勋为榜样，弃暗投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毛泽东部署、刘邓指挥的平汉战役，在军事、政治两方面取得的重大战果，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为解放区的备战赢得了时间。

10 . 1947 年夏，转战陕北的
毛泽东部署解放战争由
防御直接转入进攻，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南
渡黄河，拉开了大进攻的序幕。

1946 年 1 月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协定》，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至 6 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新的全国内战终于又爆发了。

国民党政府出动一百六十万人的兵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参谋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也号称：“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

但是，他们显然过低估计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统率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的力量。各解放区军民以毛泽东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等军事原则，很快就制止住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势头。此间，刘伯承和邓小平统率的刘邓大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三出陇海，切断陇海路，吸引了中原和华东的敌军，减轻了中原和山东解放区的压力。至 1947 年 2 月，各路解放军共作战一百六十多次，歼敌六十一万人；解放区虽失一百零五座城市，但敌之机动兵力大减，士气下降。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了。随之，从 1947 年 3 月起，蒋介石又实行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他们的打算是：黄河归故，正面防御，两翼包围。即：中间以黄河归故，甚至不惜破坏黄河大堤以堵截解放军南进，说什么黄河天险可抵得上“四十万大军”；左翼集中三十一个旅共二十多万人包围陕北；右翼集中五十六个旅共四十多万人包围山东。企图以这种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布阵继续进攻解放区。

而毛泽东向来的战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绝不会按照敌人的设计应战。

1947 年 3 月 13 日，胡宗南以二十三万人的兵力开始进攻陕北解放区，标志着敌人重点进攻的发起。18 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出延安。敌人以为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蒋介石自己走上了绝路”。毛泽东发明了一种“蘑菇”战术，即以我两万多人兵力，在陕北利用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并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之心理，和二十多万强大敌人盘磨，“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 1222—1223 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转战陕北、与几十万敌军“蘑菇”的同时，又开始思考如何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并转入战略进攻，从而彻底打败蒋介石。

1947 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虽然还在气势汹汹地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行着重点进攻，但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多万下降到三百多万，其正规军由二百万下降到一百多万，而且兵力枯竭，后方空虚，士气低落，战斗力日益削弱。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近二百万人，正规军已达百万人，装备亦有显著改善，机动兵力已处相对优势，而且士气高涨，后方巩固，人民拥护，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敏锐地观察到战局的变化趋势，认为举行战略进攻的时机正在到来，必须抓住这一正在到

来的战机。只有如此，只有抓住战机把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才能彻底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解放区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不能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不经过战略相持阶段，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是从哪里、由谁来拉开这一战略进攻的序幕，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何方呢？

毛泽东又想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

4月27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命令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南渡黄河，打到外线去。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邓等人电：“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以前完毕，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汴，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6页）

5月8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希望刘邓6月10日前南渡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同时还命陈毅、粟裕率部“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6页）

5月1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邓等人，对蒋介石的战略图谋进行了分析，指出：蒋介石的“两步方针”是，“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可是，“待我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6页）

5月15日，邓小平在冶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会议，讨论和研究了贯彻毛泽东、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问题。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向中央建议，为适应进击中原的需要，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16日，毛主席、党中央复电批准。

6月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

6月10日，刘邓在安阳附近的石林召开纵队首长会议，传达晋冀鲁豫局冶陶会议精神，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上述活动日程表明：毛泽东在此刻已酝酿成熟，把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在了中原，把拉开战略进攻序幕的任务交给了刘伯承和邓小平，而刘邓也深刻理解了毛泽东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

按照中央的部署，6月30日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二万人，在寿张县东的张集镇至濮县南的临濮集间一百五十余公里的黄河河面上，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胜利插入鲁西南地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十二万大军顺利渡过黄河以后，于7月4日夜，在河南省台前县孙口渡口登上木船，箭也似地从黄河北岸向南岸驶去。

刘邓两位首长，并肩站在船头，凝视着黄河南岸，显得格外意气风发。

敌人的侦察机在上空撒下串串照明弹，把夜空照得通亮。邓政委敞开外衣，谈笑风生地对刘司令员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给点亮了‘天灯’。敌人的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它叫来轰炸机群时，我们全军已渡河完毕了！”刘伯承用手推推眼镜说，“是啊！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渡陈仓呢！这又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说着两位首长和船上随员哈哈大笑起来，不多时，刘邓首长就踏上了黄河的南岸。国民党吹嘘的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被刘邓及其大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

刘伯承所说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指汉高祖刘邦撤入汉中时烧去栈道，以示不再东返，减少楚军对其戒备，及养精蓄锐，发军讨伐项羽时，则派人重修栈道，吸引楚兵把守道口。实则高祖率大军自陈仓出击，获得胜利。“临晋设疑，夏阳渡河”是指刘邦以韩信为右丞相举兵攻魏时，魏王豹把主力部署在黄河东岸的蒲坂，企图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遏汉军渡河。而韩信则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故意把船只集中，摆出在临晋渡口过河的架势；实则暗中调兵遣将在夏阳用木罌渡军，获得大胜，通今博古的刘邓首长南渡黄河时，也借用了上述两典。一方面调冀南、豫皖苏两支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攻势，并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在开封以南发起佯攻，造成敌人的错觉；而主力大军则从鲁西南一举突破黄河天险，顺利到达彼岸，这是敌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刘邓大军胜利南渡黄河的消息，使国民党最高当局极为震惊。当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槐拿着空军侦探情报，径直到南京蒋介石官邸报告时，蒋正在举行欢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宴会。蒋介石听说刘邓已渡过黄河，顿时面色苍白，两眼木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司徒雷登不禁叫道：“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被攻破！你们花着平均每月三千万银元的美援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竟然一枪不放，号称抵四十万大军的防线被人突破，国军力量，日见式微！”蒋介石定了定神说：“大使先生放心，我将亲到前线指挥，把刘邓逐回黄河以北！”（《〈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资料选》第19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蒋介石当即飞往郑州，召开作战会议，对他的下属将领讲的第一句话便是“对付刘邓，可并不那样简单哪！”他亲自点将调兵，在鲁西南以十个旅的兵力布下一个长蛇阵，齐头并进，迫我背水而战，回渡黄河以北。

当蒋介石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刘邓在鲁西南农村的土屋里也在连续举行会议，研究和部署渡河后的下一步行动。

在渡河之后纵队首长会议上，邓小平深入浅出地进一步讲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他说：“现在敌人进攻的重点是山东和陕北，正像刘司令员所讲，敌人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这里刚好是‘把’。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刘伯承插话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两条腿，我们拦腰砍下去。”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把刀尖插穿敌人的心脏。”刘邓以生动的比喻，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阐述得十分透彻。

对于蒋介石迫我背水而战的图谋，邓小平说：“我们决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的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刘伯承说：“我们打出去，逼敌人背水而战！”

对于蒋介石的“齐头并进”长蛇阵，刘伯承说：“蒋介石这是摆了条死

蛇阵，简直是首尾难顾。”邓小平说：“敌人是在平均使用兵力，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刘、邓共同决策：“打！”

于是，刘邓大军渡河后的鲁西南战役打响了。7月8日攻克郟城；10日收复曹县、攻克定陶。随之，把敌王敬久部的死蛇阵分割包围，逐段歼灭。7月27日，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总攻，全歼敌六十六师。

至此，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九个旅六万余人。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通电嘉奖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和部分野战军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陆定一、杨尚昆、贺龙、陈赓、王震、习仲勋、马明方、张宗逊、张经武、贾拓夫等。会议是在国民党重点进攻部队深陷解放区腹地，刘邓大军主力实施外线作战，已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揭开战略进攻序幕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性进攻后的有关任务，研究解决各个战场的配合作战问题。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就军事问题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大岳纵队的领导人彭德怀、贺龙、陈展等进行了深入的磋商。会议决定：陈赓统率的太岳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策应刘邓大军在中原的战略行动；同时，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诱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之主力北上寻机歼灭之，以配合陈赓部队渡河作战和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用五年时间打倒国民党统治的设想。会议是在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对我进行围追堵截的间隙中，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中举行的，但讨论决定的却是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大事。

当时，解放军的许多指战员都很关心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全问题，劝毛泽东东渡黄河。但毛泽东表示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的这个决定，不仅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在军事上也产生了吸引敌人的作用，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配合刘邓大军主力出击中原。参加小河会议的贺龙将军一见毛泽东，就拉着毛泽东的下说：“听说主席留在陕北，我一天不知收到多少电报，都要求你到黄河以东去指挥。以后你没有过河，官兵一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问你的情况。”毛泽东笑着对贺老总说：“你回去就可以告诉他们了，不管胡宗南还是刘戡，都没有捉住毛泽东，毛泽东比过去更壮了。”陈赓将军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也说：“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啊！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呢！”的确，当时有不少人都希望太岳纵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作战，以减轻陕北战场的负担；或者出兵潼关，打胡宗南后路。但是，毛泽东想的是如何配合刘邓进攻中原这个更具全局性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对陈赓说：“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的，不过可不是来保护我。”陈将军又说：“我叫他们给警卫部队送些好武器来吧？”陈赓手里确实有一批好武器，那是在晋南战役中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美械装备。毛泽东微笑着回答：“你们在晋南打得很好，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好武器应该给你们用，我这里不用担心。”中央作出太岳纵队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协助刘邓大军主力经略中原的决定后，毛泽东又对陈赓说：

这次确定你们过河的地点，正是当年项羽和秦兵作战时渡河的地

方，“破釜沉舟”这句话，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当时项羽很坚决，过河之前把河北岸的军锅都捣烂了，过河以后又把渡船凿沉，表示不胜不回的决心。你们这次过河，也要有那种坚决精神。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一着棋确实厉害。陈赓兵回从陕州、洛阳之间南渡黄河，既可东胁洛阳，西逼西安，支援刘邓主力南下，又可牵制陕北敌人，减轻陕北压力，并最终导致大进攻，形成各路大军逐鹿中原之势。

远在千里之外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没有参加小河会议。但是他们渡河南征之举，却是毛泽东和与会者的热点议题。刘邓深知自己在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同时，在即将出台的由毛泽东导演的“逐鹿中原”这台威武雄壮的好戏中，还要担任主要角色。

11. 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各路大军逐鹿中原，毛泽东高度评价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得中原者得天下。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刘邓经略中原”的决策。但是，刘邓南渡黄河之后，怎样“经略中原”？战略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有一个过程。1947年5月4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是指示大军过河以后在中原广大区域内机动作战，大别山只是进攻的机动目标之一。小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定了决心：刘邓大军战略矛头的指向是大别山。

小河会议结束的当天，即7月23日，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邓等人的电报，指出：“刘邓军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防，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09页）

此时刘邓已完成对羊山集之敌的包围，“蒋介石送上来的肥肉我们不能放下筷子”（刘伯承语），刘邓决定拿下羊山集后按毛主席电令准备南进。7月27日，刘邓攻下羊山集全歼敌之六十六师后，毛主席在通电嘉奖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军委的南进计划。电报称，在陈粟和陈赓部队发起攻势的配合下，“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23日电任务。”“如陈赓能于8月20日前（南）渡（黄）河，你们能干8月15日左右南进，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同日又电令：“从现在起，陈谢集团归刘、邓直接指挥。”（《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11页）

至此，在毛泽东的胸中已完整地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逐鹿中原的大进攻战略。

“三军配合”是，由刘邓大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逼大别山；由陈毅统率的华东野战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统率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这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东边以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引向渤海；西边彭德怀率部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毛泽东以此战略部署，在敌人正在对我实行进攻的势头上，不经过战略相持阶段，直接进入大进攻，逐鹿中原。这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伟大胆略和伟大气魄！

很显然，在这个伟大的战略计划中，刘邓大军担任着最为困难也最为光荣的任务。陈粟、陈谢乃至全军都要配合刘邓大军的进攻，以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占领大别山这个最关键、最主要的计划。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大别山呢？

南渡黄河之后，刘伯承说，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蒋介石的“哑铃”之把拦腰砍断。邓小平则进一步指出，不仅要把这一刀砍好，而且还要把刀尖插到敌人的心脏。刀尖指向哪里呢？现在终于明确，就是大别山。刘伯承形象地把大别山的地理位置比作小孩子的“肚兜”，因为从地图上看，它刚

好位于长江走向向南突出的部位，恰似鼓起的肚子上的“肚兜”。它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老革命根据地，刘邓大军中有许多曾在大别山战斗过的四方面军将士，容易立足扎根。占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对此，国民党必然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与我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毛泽东意图中既粉碎敌之重点进攻又可转入战略进攻“一箭双雕”的目的。

邓小平后来曾专门谈及大别山的战略地位，他说：

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中原形势决定了两个山，一个是伏牛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9页）

鲁西南战役之后，刘邓大军遵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集结在郟城及其以南地区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开始跃进大别山。而蒋介石对毛泽东和刘邓的战略意图毫无察觉，认为刘邓已“疲惫不堪”，于是抽调十四万人兵力，对刘邓实行分进合击。敌企图逼迫刘邓主力于郟城、颍城之间狭小地区内，然后利用连日大雨，黄河水位陡涨，破坏黄河大堤，以“黄河归故”淹没我军。此时，刘邓又收到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三A”（最急）电报。邓小平后来曾对他的女儿毛毛谈起毛主席这封使他印象极为深刻的“三A”电报，他说：

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封电报，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60页）

邓小平和刘伯承知道，蒋介石此时正亲临延安督战，胡宗南二十万人马正寻机与陕北两万多人的我军决战，气焰十分嚣张。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中央机关仅有几个连护卫，身背七个旅的敌人在山沟里与之周旋，险情时时出现。

敌情的严重，雨情、河情的紧张，毛主席和中央的安危，相互交加使刘邓忧心如焚。刘邓当即决断，于8月6日下达预备命令，提前结束休整，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施实毛泽东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刘邓把此决定于当日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8月9日、10日连发两电复示，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8月11日，刘邓大军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越过陇海线，随即兵分三路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进攻，是无后方依托，以跳跃式的长驱直进，一下子插入敌人战略纵深处的大进军。而敌人根本摸不清这十二万大军的意图是什么，甚至还以为“刘邓北渡不成而向南逃窜”，开始只投入十个师的兵力，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在沙河布防，一部尾随刘邓，一部侧击，企图在黄泛区决战，而刘邓大军根本不与之纠缠，以惊人的毅力越过遍地淤泥、积水没膝的黄泛区，先于敌人而渡过了沙河。接着，刘邓又决定把重武器和车辆等缙重物资，或掩埋或炸毁，部队实行轻装前进。全军在刘邓的号召和指挥下，迅猛地越涡河，过洪河，涉汝河，跨淮河，于8月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敌人这时才似乎觉察到刘邓的意图，以二十三个旅的兵力跟进大别山，企图拔掉这把已插进其心脏的刀子，可惜晚矣！

当日，邓小平起草了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指示，8月30日又以刘伯承、邓小平名义将此文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文指出：“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迫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还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条件，指出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得解放。”（《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4—95页）毛泽东收到此电后，很是欣慰，当即批示转发彭德怀、东北局和华东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经过两个月战斗，歼敌三万余人，解放了二十四座县城，建立了三十三个政权，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时候，陈赓和谢富治率领太岳兵团共八万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于8月23日强渡黄河，后在豫西以伏牛山为依托建立了根据地。9月初，陈毅和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进入鲁西南，后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逐鹿中原之势已经形成。

古代史书多有“逐鹿中原”记载。《汉书》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讲的是秦王朝失去政权之后，天下豪杰争夺政权。争夺的地点便在中原大地。《晋书》又曰：“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竟鞭而争先耳；若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这里也是把“鹿”比作政权，在中原大地争夺。唐朝大臣魏征诗《述怀》有名句云：“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讲的也是在中原大地征战和夺取政权的事。而今，毛泽东再在中原大地布下刘邓、陈粟、陈谢大军，与蒋家王朝展开空前规模的逐鹿之战。有刘邓大军的中间突破，有两军的配合，有两翼的牵制，这样，“鹿死谁手？舍我莫属”已成定局。

经过四个月的作战，我三路大军在中原大地共歼敌十九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吸引和调动了南线国民党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与此同时，其他解放区也趁机展开进攻，这就迫使国民党军进入防御地位，而我军从此转入战略大进攻。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此期间，邓小平、刘伯承和毛泽东、党中央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毛主席的消息，邓小平就非常不安。段君毅和刘子久曾回忆说：

一次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后，他竟破例请我们喝酒。问及原因，邓小平笑答：“我们已经三天没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了，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祝酒。”

于细微处我们可感到毛、邓之间的亲密之情。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陈谢大军南渡黄河的大进攻形势下，西北野战军北上围攻榆林，于8月18日至20日，在沙家店歼敌主力整编第三十六师两个旅共六千人。至此，胡宗南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已被歼和拖垮近半，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亦转入反攻。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的战略进攻，他说：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243—1244页）

邓小平也多次论及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意义，他说：

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6页）

邓小平还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来证明毛泽东大进攻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说：

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仪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

就看清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97 页）

1989 年 11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又说：

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是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
啊.....

.....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万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39、340 页）

当年“左”倾机会主义者没有接受毛泽东富有胆略的建议，而现在由刘伯承和邓小平等成功地进行了实践。刘邓和刘邓大军的斗争实践，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在 12 月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党二十年军事斗争经验的结晶，其中也包括对刘邓大军斗争经验的升华。

12. 1948年从春到夏，毛、邓间电文频频相传，共商新区农村政策的转变问题。毛泽东认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邓小平起草了毛主席十分重视的著名的《六六指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改革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在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进入大进攻以后，1947年10月10日中央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即《双十指示》），土地改革运动又在新解放区开展起来。

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农民翻身解放，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高涨，支援了人民战争。但是，1947年下半年一段时期里，主要是在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一些地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有的提出“贫雇农包办一切”、“分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排斥中农以至损害了中农的利益；有的划分阶段的标准模糊，把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有的破坏了工商业，把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当作封建财产加以没收，甚至对城镇中的私营商业及小摊贩的财产也充公没收，影响了经济发展；有的排斥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仍然以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对待；有的地方发生了对地主、富农乱打乱杀的现象，等等。在分田地、分浮财中造成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和财产。

毛泽东已察觉到了这些问题，在中原新解放区主持领导工作的邓小平也察觉致了这些问题。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从六个方面征询他对新解放区党的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67页）

接毛主席电后，邓小平于1月15日和22日连续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两封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各方面情况。在第二封电报中，对毛主席提

出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依次作了明确回答。邓小平在回答中特别强调了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大别山区的特点是，经过苏维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苏维埃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均在各阶层发生很深影响。因此，地富有所体验，而基本群众经过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敢轻易起来，大别山有一千二百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毛泽东和党中央从邓小平的电报中，对新解放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关于新区土改分两种区域的意见，对中央有很大启发。中央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意见，开始研究制定新区土改的政策。毛主席在收到邓小平第二封电报的当天，即1月22日，就起草了给豫皖苏新解放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粟裕的长篇电文。文中谈及新区土地改革问题时，提出土地改革不能性急，要分阶段进行，应区分两种区域：敌人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敌人还能再来、并能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宣传。2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指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用不同策略：老解放区，土地大体已经分配，只须作些调整；日本投降至1947年8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土地问题已初步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1947年8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法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新区的土改第一阶段大约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6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吸收了邓小平关于“分区域”和“不能急”的意见。

2月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邓小平，将他给粟裕电报的内容转述于邓，并就新区土改先组织贫农团还是先组织农民协会等具体问题，“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同意毛给粟裕电报内容，再次强调新解放区土改要分两种区域，先组织贫农团，后组织农协，并对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部队供给等问题，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28页）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十分赞许。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15日，为中央起草关于新区土改要点的指示；17日，毛泽东加上按语向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转发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即2月8日给毛主席的复电。毛泽东在按语中说：

（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备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表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2页）

在征询各方面意见后，毛泽东将给粟裕的电报修改提炼为《新解放区土改要点》，下发各区，作为新区土改工作的指导文件。这样，各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在新区是否马上进行土改，要不要先进行减租减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豫陕鄂新解放区调查时认识到，在新解放区，不管是何种区域，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适宜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正常秩序，为战争做准备上面。5月9日，他致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认为土改可以解决一切，对于当前的紧迫问题，如生产季节、财粮征收、军队供应等重视不够，结果反而陷入被动。我们已明确工作步骤，即将当前的重点放在财经工作上，而将土改推至今冬明春。5月中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原局豫西陕南负责人会议，明确提出了将土改转为“双减”，提出该区今后工作的方针是：（一）建立反蒋胡（宗南）的统一战线；（二）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三）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四）保护一切工商业。会后，邓小平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29页）

与此同时，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与新区来的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等交谈，他们的想法与邓小平等的意见相一致。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转变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把土改转变为“双减”，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首先告诉了邓小平。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说：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区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子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这一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326、1327页）

毛泽东给邓小平发电的第二天，即5月25日，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向全党阐述了上述方针，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经过多次商讨而最后确定下来的新区土改转变为“双减”的方针，是党在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重要转变，对于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发生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就是在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地改革、关于工商业、关于统一战线、关于整党、关于新区工作等各项政策和策略问题的过程中，讲了那段著名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298页）

邓小平依据毛泽东5月24日的来电和中共中央5月25日的指示，并结合中原地区的实际，于6月6日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

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在这个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文件中，邓小平列举了十二条错误教训，指出错误的根源就是“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不调查，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老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09、110、114 页）《六六指示》在指出过去出现的错误教训的同时，还着重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都不能掩盖了我们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区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15 页）文件第四部分，从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调整各项工作的策略方针和步骤。文件要求“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23 页）

毛泽东对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的这个指示极为重视。他收到电稿后，于 6 月 28 日代中央复电邓小平，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个指示，并亲自增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邓文写到中原解放区取得的成绩时，毛泽东增写道：

不但如此. 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 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 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 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 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 在苏北, 在豫北, 在晋南, 在西北, 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 恢复了广大土地, 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15 页）

另一段是在邓文写到对于过去错误要正确认识时，毛泽东则增写道：

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16 页）

毛泽东增写的这两段文字，使《六六指示》更加严密和完整，对过去中原局工作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公正。毛泽东把这个文件当作与中央的 5 月 25 日指示配套的文件，把中央的原则具体化了。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等人的信中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二十八年间·三编》第 230 页）

新区土改“左”的错误的克服和由土改转变为“双减”方针的确立，说明党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就

首先带头作自我批评，他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土改的错误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对中原地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不上推下倭，也不隐讳，如实地写进了他起草的《六六指示》中。毛泽东十分赞赏小平这种自我批评精神，他曾在转发邓小平的一份电报的批语中说：“小平同志的这种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领导以小平为榜样，各自作自我检讨，上报中央。（《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36页）

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这些交往中，我们可以具体地感受到，毛泽东的著作中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和意见，邓小平的著作中也有毛泽东的思想和意见，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邓小平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具体经验，以及对全局带普遍意义的政策策略性的意见。因此，他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48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邓小平严格执行，大体两个月一次，一直坚持亲自动手给中央写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过，“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主席还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纵览》第10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有评论家评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小诸葛”。

13 . 1948 年秋冬，毛泽东抓住战机发起伟大的战略决战，作为淮海战役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决战思想立下了名震四海的丰功伟绩。

自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战略进攻的序幕以后，各解放区连连得胜，迫使国民党军由全面防御再到重点防御。至 1948 年夏天，国民党军队能用在第一线的兵力只剩下一百七十万人，分散在几个战略要点上。

1948 年 8 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说：“就整个军事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他要求“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加强精神的武装”，以便使“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策划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部署。徐州地区是国民党军选择的重点决战地点，加紧向这里调兵遣将，企图在这里“孤注一掷”。

战局发展表明，国共两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十分英明地抓住了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先后发起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淮海地区的大决战，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由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而胜利完成的。

早在 5 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讨论了粟裕的建议，决定集中兵力把国民党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南下作战。7 月，中央又提出了粟裕兵团就在黄淮地区作战，不消灭敌军主力不定的战略方针。8 月 10 日，粟裕等向中央请示济南战役作战方针问题，中央军委于 12 日复示，既要保证攻克济南，同时又要歼灭一部援敌。此时，中央已有进行淮海战役最初的蓝图和决战的初步计划：在北线，先打锦州，歼灭范汉杰部，再攻唐山或承德，进攻傅作义部；在南线，先克济南，再歼黄海地区守敌之主力。

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这是自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在会前十天的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期间，同各地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了充分交谈。邓小平是 8 月下旬由豫西解放区北上赴西柏坡参加会议的。他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等就淮海地区决战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讨论。正式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歼敌七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是有充分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会议要求在三年的第三年即 1948 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集中力量歼灭位于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敌重兵集团，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未来的淮海战役即

肩负着集中力量歼灭位于长江以北敌重兵集团的任务。毛泽东对邓小平、陈毅反复交待了任务，对未来淮海战役的胜利寄以厚望。

在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和陈毅返回前线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为他们送行。

毛泽东对邓小平政委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比今年更好。”

邓小平政委说：“主席、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周恩来副主席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政委说：“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陈毅司令员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愉快爽朗地说：“我们的本事就是一条，坚决完成主席、中央交给的任务！”

朱总司令对陈毅开玩笑说：“完不成任务，就打你这胖子的屁股。”

陈毅司令员笑着说：“总司令还没有打过我的屁股，我想我们不会挨打。希望下次见面时，能在你家吃到四川腊肉。”

朱德总司令笑着说：“好啊！我给你把四川腊肉准备好，到时候你就来吃吧。”（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第3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交给中原和各野战军的任务是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向刘邓具体部署，要求他们在战争的第三年内歼敌十四个旅，并指示刘邓攻击郑徐段铁路据点，攻打郑州，以策应淮海战役。

此时，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在这一战役进行中，10月11日，毛泽东又拟就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电告华东野战军，并转告邓小平和中原局。10月19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联名下达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邓小平和陈毅亲率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攻打中原重镇郑州，于22日解放全城。毛泽东和党中央随即发来贺电，对这一胜利表示祝贺。贺电说：“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毛泽东还亲拟了《我军解放郑州》的电讯稿，由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又命作战部队现地休整两天后，东进攻打河南省会开封，进而与华东野战军会师。25日，中原解放军解放开封，并乘胜东进，与华东野战军联合展开大规模的淮海战役。

邓小平后来回忆道：“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1—342页）

11月4日，淮海战役发起。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是，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到陇海铁路，南达淮河，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大门口进行一场歼灭该地全部守敌的声势浩大的战略决战。为了加强战役的领导，毛泽东和党中央于11月16日作出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担任总前委书记，刘伯承、陈毅为常委，粟裕、谭震林为委

员。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如是说：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二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区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91页）

毛泽东亲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

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淮海地区，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2年，刘邦、韩信巧设十面埋伏，歼灭项羽主力军的大战，便发生在这里。称雄一时的西楚霸王，在这里演下了“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如今，邓小平等统帅的正义之师，在毛泽东的导演下，也将让蒋介石表演一场新的“霸王别姬”。

在整个战役进行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按照毛泽东拟定的作战计划，当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敌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在碾庄对该敌形成包歼之势后，邓小平和总前委提出建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原野战军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津浦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这样就一举切断了徐州守敌与其后方的交通，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全歼之后，邓小平和总前委又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下步应首先消灭由豫南闯进的援敌黄维兵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随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迅速包围了黄维兵团，经过二十多天激战，全歼了该敌。接着，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华东野战军一鼓作气，又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战役进行中，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在西柏坡这个不起眼的农村中，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当国民党黄维兵团从河南信阳地区长途跋涉，闯进淮海战场参战，解放军利用其兵疲粮缺、孤军突出的弱点，抓住战机将其包围时，毛泽东于11月27日写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由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以瓦解敌人，同日，毛泽东还代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写了《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在前线直接对敌广播。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黄维兵团的第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在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战场起义，严重瓦解了敌人。当解放军严密包围了国民党军杜幸明集团时，毛泽东于12月17日又代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前线反复广播。此时社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其官兵成排、成连甚至成营地向解放军投诚，人数多达一万四千余人。

淮海战役历经六十五天，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它是战略决战三大战

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战役。战役的发展比毛泽东预计的更顺利，获得的胜利也比预想的更快、更大。毛泽东在当时就多次说：“这是一个伟大胜利”，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和战役的其他领导人又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至此，蒋介石军队的主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出长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汉口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据当时香港《文汇报》报导，蒋介石气急败坏，“不时以拳击桌，用脚踢人”。1949年元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南京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状态，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了。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徐州建塔以纪念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牺牲的先烈。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塔名：“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邓小平也题了词：“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

14 .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已增到了三百多万人，而国民党军只剩下一百几十万人，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敌人。毛泽东在 1949 年的元旦献词中指出“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 月 6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要求解放军解放江南各省。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响亮口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早在淮海战役进行中，即 1948 年的 12 月 17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总前委的领导人，就开会研究了战役结束之后渡江作战的建议和整编方案，并开始作准备工作。会后，总前委派刘伯承和陈毅赴中央作了汇报。1949 年 2 月 9 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及后勤准备等问题。会后，邓小平、陈毅又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了渡江准备工作情况，并提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请中央考虑速示。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总前委的设想和总要求，同时明确指示：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3 月 5 日至 13 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从前线回来参加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多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方针和途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同邓、刘、陈作了交谈，谈的最多的就是渡江作战的事。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对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器重、十分信赖。毛泽东送邓、陈回前线时，他们仍然谈论着渡江的问题。

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休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

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在多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淮海前线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多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陈毅接着说：“我们原来还做了准备，准备在淮海战役进行最关键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可能动一动，陆战队和空军会支援蒋介石的败局。但美国人很聪明，怕陷进去拔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敢增援。”

周恩来说：“美国第七舰队开到青岛，也不过是来吓唬一下我们，但我们不怕。如果他们参战，就来个美、蒋反动派一齐打。”

毛泽东又说：“就是这样，美国人参战，最多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现在蒋介石和李宗仁要求和谈，企图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在一百万的基础上扩充为三百万，以长江天险为界线，继续统治中国南部。我们抢在敌人前面，打过长江去，向东南、中南和西南大进军。”（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第374、375页）

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即3月14日，中共中央为迎接过江后华东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此时，邓小平身兼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及二野前委书记，集多职于一身，可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器重。

邓小平由西柏坡回到前线后，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加紧了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渡江战役的一名主帅，邓小平在总前委会多次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于3月31日为总前委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一对渡江战役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纲要》十分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渡江战役的目的是歼灭守敌，“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科学地分析了敌情和长江地理特点，部署我军力量配备，组成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采取宽大正面的渡江战法，分为几十个点渡江，迫使敌军顾此失彼。《纲要》预见了对敌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并一一制定了周密的对策。《纲要》充分体现了战役计划的灵活性及可行性，既严格要求各路大军必须服从大局，又赋予各级指挥员有临机果断处置的权力。不足两千五百余字的《纲要》，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伟大战役部署，精辟而完整地阐述得清清楚楚。刘伯承称颂《纲要》的部署可谓“稳健”二字。《纲要》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宏观决策能力，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该文件写出后，于4月1日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中央军委很快于4月3日批准了这一《纲要》。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总前委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还抓了部队的政治教育、整编、练兵、支前以及新区政策建设等工作。作为华东局的书记，邓小平在此期间签发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我军南进与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等。支前备战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仅渡江船只就筹集了两万多只，动员船工万余名，山东、河南、苏北解放区参战民兵有十六个团，与江南地下党和游击队也接上了关系，小部队已过江潜伏。

总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千军万马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一声令下，便立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但是，渡江战役非同其他战役，它有着更强、更敏感的政治性。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究竟什么时机发起渡江战役，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中央军委到总前委，都慎之又慎思考的重大问题。

当时，国民党正在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宣称“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在讲了国

民党的宪法不变、宪政不变、国体不变、法统不变、军队不变等等之后，说：“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眼便看穿了这个头号战犯求和的阴谋。蒋介石求和的根本目的在于阻止解放军过长江，稳住残局，争取时间，以卷土重来，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14日，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共和谈八项条件。“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而蒋介石便是头号战争罪犯。“八条”还提出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接收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条”的实质就是要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交枪投降，听候人民发落，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蒋介石的阴谋遭此揭穿后，已无脸出面，遂于1月21日宣告“引退”。但主张“划江而治”的并不是蒋介石一人。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极力鼓吹“划江而治”，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希望中国成为“南北朝”。接替蒋介石就任代理总统的桂系首领李宗仁，虽然与蒋介石及其嫡系有尖锐的矛盾，但在与共产党平分天下，划江而治，造成南北中国局面的设想上，与蒋介石也是一致的。

李宗仁上台后声称，愿意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中共中央于3月26日作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决定，双方遂于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除了战犯问题外，便集中在解放军渡江的问题上了。南京代表力主“就地停战”，“划江而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则明确提出，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其实，中共代表的这些意见是完全符合早先提出的“八条”的，也是自然的。解放军不渡江，怎么捉拿江南的战争罪犯？怎么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怎么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怎么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权力？经过半个月的协商，中共代表团于4月15日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为了争取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才数度推迟了渡江的时间。3月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了配合谈判斗争的需要，把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推迟到4月10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一起研究，提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夜间隐蔽渡江，建议推迟到4月15日黄昏。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是把渡江时间定在了4月15日18时。此建议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等向各作战首长通电，反覆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渡江战斗发起的时间或提前或推迟，都是为了密切配合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44页）4月10日，中央军委鉴于和谈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和平协定，因此致电邓小平和总前委：如果此项协定成功，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增大，那么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4月14日，两党代表和谈明朗化，《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已定，即将提交给南京代表。这时中央军委又致电邓小平和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为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4月25日以后渡江。邓小平看到军委电报后，立即听取了侦察报告，查阅了近十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5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7、8月，两岸湖区被水淹没，江面宽

阔，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张，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于是，邓小平与陈毅商量，建议将渡江时间限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定日期即4月20日夜。这样，既可使我在政治上主动，渡江战斗是在国民党拒绝签字后打响的，是南京方面自食其果；同时天气条件也有利，因为20日夜是阴历二十三，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利于我渡江的突然性。于是，邓小平和总前委于4月17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呈报了上述意见和作战具体部署。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即于18日复电：“完全同。总前委的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就签发了总前委给各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

果如党中央所料，南京政府李宗仁慑于蒋介石的压力，于4月20日深夜复电北平，拒绝在协定上签字。21日零点，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号令下，由邓小平和陈毅在安徽肥东县之瑶岗指挥全局，由刘伯承等指挥西突击集团，由粟裕等指挥东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等指挥中突击集团，共百余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公里的江面上，万船齐放，浩浩荡荡，从21日凌晨起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打过了长江以南。

4月22日下午，已进驻北平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刘、邓、陈大军胜利突破长江，非常高兴。他和身边的同志说，只要一过江，蒋介石的军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打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了。在此胜利时刻，毛泽东亲自写了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电讯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把这震惊世界的消息发向环宇。

解放军一过长江，国民党望风而逃，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邓小平后来笑谈当时的情景：“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当解放军攻进南京总统府时，总统办公室桌上的台历翻到“1949年4月22日”。同邓小平一起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此时诗兴大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在北平的毛泽东于解放南京的当天下午，也得到了解放军占领国民党首都的消息。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拿着一份刊登有解放南京消息的《人民日报》号外，到院里凉亭下，坐在藤椅上细看起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读报后去散步，也没有和别人交谈，而是起身回到了书房，又看那号外，并在报上划一些红杠杠和圈圈。随后，便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写了贺电，让秘书转请周恩来和朱德签发，接着他疾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气度不凡的诗篇中，寄托着他对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以及他们统率的渡江大军的革命情怀，也寄托着这位军委主席对全军将士的殷切希望。中央军委在向刘、邓、陈等拍发贺电的时候，也将这首诗发给前线的指挥员，大家受到莫大的鼓舞。24日，毛泽东又亲为新华社拟就电讯稿，庄严宣告：“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邓小平和陈毅指挥三路大军过江以后，于4月28日由合肥抵达南京。在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一起指挥渡江大军，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迅速解放了杭州、九江、南昌、上海等大城市，华东大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此期间，邓小平于5月10日发出《关于渡江后工作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指出：渡江顺利“这是由于敌人的抵抗甚弱，更主要的是由了我军在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诸方面均属充分。而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的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尤属值得赞扬。我军渡江后，战局发展太快，敌人拼命溃逃。”“京沪杭作战即将胜利结束。”上海于5月27日解放以后，邓小平即赴上海主持华东局工作。

渡江战役歼敌十一个军部、四十八个整师，共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及苏南、皖南、浙江大部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部分地区，为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胜利基础。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由二野、三野联合作战取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契合不仅具有军事意义，尤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著名的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的政治斗争；著名的邯郸战役，争取了高树勋起义，有力地促进了瓦解敌人的政治斗争；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在政治上标志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的开端；这次渡江战役的准备和胜利，又是紧密配合了国共和谈的斗争，并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的灭亡。大约正因为此，才能够引起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比他年轻十一岁的邓小平越来越欣赏，越来越器重。邓小平的优势就在于他比有些政治家更懂军事，比有些军事家更懂政治。

15. 建国前夕，毛泽东和
邓小平交谈打破帝国主
义封锁之道，击退外国的
干涉；10月1日，邓小平跟随
毛泽东同登天安门城楼，参加
开国大典。

前已述，渡江战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国内方面，也表现在国际方面。早在1949年2月解放军正积极准备渡江的时候，美国联合其他一些国家就搞了一个所谓“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闹剧。国民党政府很快予以附和，但被中共彻底揭露和坚决反对，使之遭到破产。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所签定的一切外交关系”，“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要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关系。邓小平在总前委和华东局的会议上，也多次强调，帝国主义无论采取什么名义、玩弄什么花招，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都要针锋相对地与其斗争。

1949年4月20日晨，正当邓小平等指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时，在我内河长江行驶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擅自闯入镇江至江阴段，进至扬中以北解放军作战区域内妨碍我军渡江。该舰不顾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致使双方展开猛烈炮战，造成我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紫石英号中弹三十余发后，悬白旗搁浅于江中。下午1时许，英舰伴侣号从上海增援紫石英号，与我军又展开激烈炮战，伴侣号负伤后逃离。21日，我百万大军已开始渡江，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乘旗舰伦敦号，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再次与解放军炮兵展开激战，两舰受创后溃驶上海。这就是在当时轰动世界的“长江紫石英号舰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与英国远东舰从司令所派代表进行多次谈判，但英方态度蛮横，始终不承认其侵略行为。非但如此，英国政府还施展恫吓伎俩，企图迫我就范。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说成是“暴行”，并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上也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他还造谣说，解放军要求英舰“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代。岂不知，他们的对手既不是音英也不是蒋介石了，而是硬骨头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埔江和在中国其他多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声明也宣布，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和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各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蛮横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等指挥的渡江大军，没有被帝国主义的恫吓所阻止，浩浩荡

荡地渡过了大江。

在邓小平即将赴达刚刚解放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4月26日电示刘邓等总前委领导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电示又说，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等在南京和上海都是本着这一方针指导外交工作的。美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一直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在南京解放以后，他还留在南京观望，企图中共能与他接触，“开设新店”，再“捞一把”。可是，“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子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泽东后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如是形容说。毛泽东把这一外交思想，比喻为“另起炉灶”，即一概不承认国民党政政府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独立自主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

邓小平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思想，十分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和国民党的旧外交关系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解放战争的发展。在发起上海战役之前，他和陈毅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特命位于浙赣线上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除了担负割裂国民党汤恩伯与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并扩大战果外，还要充当总前委的战略预备队，随时向上海方向实施机动作战。邓小平的这一部署，就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发起的武装挑衅。由于解放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迫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邓小平，这些中共党人都不是盲目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是在面临新中国即将诞生，但帝国主义仍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的特权的状况下，指出不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就不急于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5页）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又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之后再同它们建交。

6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方针，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做出的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当时国际政治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互对抗；当时的国内形势是美国和帝国主义阵营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以图消灭中共。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拥护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共产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一贯主张主要依靠自立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谁能援助我们呢？美国和帝国主义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援助我们的，只有首先争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后面，就可极大地鼓舞我们的锐气，大刹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在党内外，尤其是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够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大家作了许多说明。邓小平的看法和毛泽东、周恩来是完全一致的。渡江战役刚一结束，他

代表华东局向中央就提出了如何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建议，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项建议，说这个建议好，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并采纳了这一建议。（《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34页）后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又作了深入的交谈，共同讨论了如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问题。邓小平完全支持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7月19日写给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并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邓小平指出：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然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34页）

邓小平在这里论述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之道，对毛泽东“一边倒”思想做了透彻的发挥；并且，正如他指出的这种“一边倒”的实施“愈早表现于行动”，就会产生“对我愈有利”的效果。在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里，明确提出了这一外交方针；随后毛泽东访问苏联，与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在访苏归来之后说：“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样，才能创造对新中国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保证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

毛泽东和邓小平共论的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更频繁更密切了。8月4日，邓小平从上海到北平，向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报告精彩而生动地概述了渡江战役的过程，并指出，渡江战役胜利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还有“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联合”，“敌人的脆弱”等。9月下旬，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在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共商建国大事。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

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委员。下午 3 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三十万军民热烈的欢呼声与雷鸣般的掌声中亲自按动国旗升降开关，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广场高高升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四十五岁的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欢腾的人民群众，看着兴奋的毛泽东，看着城楼上下领袖与群众感情的交融，心情自然也十分激越。庆典之后，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但是，他想得更多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把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想起故乡的穷苦人民还在受难，心情就难以平静下来。大西南的人民正等待着他……

16. 开国大典后，邓小平等
率军迅即解放了大西
南，把蒋介石最后撵出大陆，
并领导大西南卓有成效地开
始了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毛
泽东称赞邓小平“无论是政治，还
是军事，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考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正积极筹划在大西南聚积力量，伺机反攻。因此，必须迅速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粉碎敌人的复辟梦想。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考虑由谁率军挺进大西南、谁进驻上海的问题。陈毅出于对刘邓的敬重，提出让刘邓进驻上海，因为刘邓跃进大别山消耗太大，而应由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刘伯承和邓小平则表示，他们对西南更熟悉，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留驻华东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刘邓。

解放大军渡江以后，5月23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预先号令，指示刘邓统率第二野战军主力作好进军西南的准备，尔后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共同完成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任务。6月17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刘邓：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月较为适宜。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二野便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争取尽快西进。7月中旬，邓小平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就进军西南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决定二野主力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对敌进行迂回包围，依次攻击贵阳、叙府、泸州、乐山、邛崃、大邑等地，拉开进军西南的战局。基于这种分析，刘邓于8月19日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随后，邓小平就进军大西南的准备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作为党的书记和军队的政委，邓小平在报告中如实反映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批判了过江后某些指战员产生的骄傲自满、叫苦、忽视纪律等不良倾向。9月3日至4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的直属部队党代会上，邓小平又针对部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倾向问题作了讲话，进一步为进军大西南作好思想方面的准备。他强调，要勇于开展批评，不能把批评与保护积极性对立起来，不能保护违背人民利益的“积极性”。他说：

我以为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执行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积极性。具有这种积极性就会把工作做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损害这样的积极性要犯错误，官僚主义者就要妨碍这种积极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违反党的政策方针的“积极性”，就不应该表扬。
(《邓小平二十八年间》第192、193页，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版)

在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准备就绪之后，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南京出发，指挥所属各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发；刘邓首长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大典，并与毛泽东、中央军委再次研究了作战部署之后，21日乘火车抵徐州和领导机关会合，一起西进。23日，到达郑州，刘邓下达《川黔作战命令》。（据《邓小平二十八年间》）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也加紧了抵抗的部署。蒋介石于8月飞抵重庆，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扬言“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蒋介石企图依靠残存在西南的四十五万正规军队与地方杂牌军，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凭借川滇黔边的险峻地势，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如固守不成，则保存实力退向康、滇或逃窜国外。蒋介石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迄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脉西部的“西南防线”，以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敌人认为我军从川北方向入川可能性最大，而川东地势险要，大兵团行动困难，解放军难以由此进川。

“可是，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我军的计划是以二野为主力采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位于川北的敌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位于陇海路西段的我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川北地区，待二野主力入川切断敌退路后，再迅速入川，协同聚歼川境之敌。

按此计划，我军于11月1日发起川黔战役，突破敌军防线，于11月15日一举攻克贵阳，15日解放彭水，直通乌江东岸。至28日已形成对重庆的包围之势，并挺进川南切断敌军南逃的后路。与此同时，我军还加强政治攻势。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所提出的“约法八条”，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护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这四项忠告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和感召力，国民党军政机关处于瓦解状态。

11月27日，毛泽东电告刘邓，蒋介石已令胡宗南将其第三军用汽车运送重庆，希望二野注意吸引更多敌人于重庆，再聚而歼之。刘邓研究后回电毛泽东，提出不宜迟缓过久攻打重庆的建议。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30日，刘邓命令发起重庆战役，这个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当日获得解放。蒋介石于进攻前几小时从重庆飞逃至成都。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2月2日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为副主席。此时，邓小平除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是贺龙。

重庆解放以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在此形势下，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解放，蒋介石部署在成都的嫡系胡宗南集团军，

己成为瓮中之鳖。成都周围国民党军纷纷响应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刘邓提出的“四项忠告”，就地宣布起义。12月11日，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军长郭汝瑰率领下在宜宾宣布起义，随后还有董宗瑜率十六兵团在广汉地区、王伯勋率十九兵团在黔西普安地区、罗广文和陈克非率十五兵团和二十六兵团在彭县地区、裴昌会率十七兵团在德阳地区、李振率十八兵团在简阳地区等，争先恐后宣布起义。坐镇成都指挥的蒋介石得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以及宜宾的郭汝瑰起义的消息后，“气得捶胸顿足”，也无可奈何。他见大势已去，遂于12月13日深夜在铁甲车的护卫下，狼狈从新津机场登机飞逃台湾。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其中的一件就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岛上去了，1949年5月当邓小平等指挥渡江大军即将解放上海时，蒋介石逃离上海飞抵马公岛，再转飞到了台湾。8月24日，蒋介石又飞往重庆组织反革命力量对付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当邓小平等指挥的部队向重庆发起攻击时，他一面对其部下训导“不成功则成仁”，一面则于11月29日深夜逃离重庆飞至成都。在成都他总共呆了十四天，在刘邓大部队围上来的时候，他一大连续三次下令让胡宗南死守成都，自己却于当日飞逃到了台湾，蒋介石心里清楚，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天了。当飞机在台湾着陆时，他和他的儿子蒋经国竟唱了几句他们的《国歌》，颇具悲壮之味道。果然，一直到他1975年在台湾病死，再也没有回过大陆。邓小平曾说过，“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而邓小平及其指挥的这支解放军部队，也似乎粘上了老蒋，老蒋跑到哪儿，邓小平的部队就撵到哪儿，一直把他撵出了大陆。

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进军大西南战役的胜利结束，共歼蒋军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九十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的挣扎。

1950年，邓小平为书记的西南局依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制定了“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的规划和任务。邓小平解释说，这就是安置、教育和改造起义、投诚、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官兵，剿灭九十万土匪，发动六千万西南地区的人民搞土改闹翻身，提高六十万干部、战士的素质，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通过努力，这四项任务都得到了较好的完成。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书记和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当初曾考虑“经营西藏问题”由西北局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但成都战役后，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苏联访问中致电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诸同志，称：“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担。”毛泽东还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毛泽东又说，“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毛泽东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邓小平接毛泽东电示后，连续召开西南局常委扩大会议，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加紧了筹备工作。1月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拟抽调第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担任进藏任务，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得此报告，非常欣慰，于10日回电中央及邓小平等人：“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2月15日西

南局和军区颁发《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指战员努力奋斗，“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

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国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并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入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同时要求西南和西北两局草拟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和政策。邓小平立即组织得力人员，研究和草拟了四条方针政策，作为和谈的基础，于5月11日报告中央。与此同时，西北局也向中央转报了中共青海省委提出的六条政策。一周之后，中央复电两局，认为西南局所提的四条较好，但还应补充，使之更完整。按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又亲自起草了如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活动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二十八年间·三编》第31页）

邓小平提出的这十条，报中央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它既是和西藏当局进行和谈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解放军开展争取工作的依据和遵守的准则。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是年10月7日，第十八军经过充分准备，开始向西藏进军。10月24日，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歼敌五千七百余人，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解放军进藏的大门。与此同时，还加紧了争取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协定以邓小平草拟的十条为基础，规定了十七条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至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还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赴京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就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全会以后，邓小平以毛泽东指明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指导西南各省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与毛泽东的配合十分默契。毛泽东经常批转邓小平和西南地区的报告、经验，以推动全国的工作。1950年11月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并中央综合报告西南地区关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武装建设以及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情况和作法，毛泽东于15日电复邓小平，指出“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并批转其他各中央局“采纳之”。1951年1月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情况，提出在土地改革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要加强城市工作的研究，克服“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很重视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在回电中明确肯定“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批转其他中央局参考。5月16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加了五条共一千余言的批示，向全国转发。他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当邓小平报告中写到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打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批示道：“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当邓小平写到有些地方的干部忽视农业生产，“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时，毛泽东又批示道：“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从这一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来往的大批电文、报告等文献可以看出：他们一个在中央指挥全局，一个在基层开拓前进；毛泽东经常以小平点上的经验推动全局，邓小平则按毛泽东的全局指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毛邓的契合达到了“同喜共忧”的境界。

邓小平在西南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中，修建成渝铁路的成功，可谓闻名全国。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美称。但是周围山险水急，道路崎岖，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四川的道路交通曾作如是描绘和感叹：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因此，四川人民世代都盼望着修路，以改变“蜀道难”的状况，清朝末年，四川人民含辛茹苦，勉力集股，不惜“田亩加赋”，集资修建川汉铁路。但是，清政府1911年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修建权收归“国有”，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扼杀了四川人民的修路计划。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人民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热潮。在斗争中，许多志士仁人牺牲，四川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在荣县等地宣布独立，“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同清王朝的武装斗争，成为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的前奏。四川人民为纪念这场斗争的捐躯者，在成都人民公园修建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中共一批四川籍的老革命家，如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都曾受到过“保路斗争”的影响。当时七

岁的邓小平，也记得他在四川广安县协兴场的北山小学读书时，四川父老保路斗争的热烈情景。1921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卖修路权的“拒款斗争”，也与“保路”有联系。可是，正如亲历辛亥革命的刘伯承所说，“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铁路连影子也见不到。”国民党政府1936年就成立了“成渝铁路工程局”，但修了十四年没铺上一根枕木、一条钢轨。

深知民情、善解民意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早在毛泽东、党中央决定由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并开始积极筹划为四川人民办好修建成渝铁路这件实事。上海解放不久，即1949年6月，邓小平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家里，和陈毅的堂兄、技术专家陈修和就修建成渝铁路问题进行过多次交谈，并请他帮助物色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不久，陈修和就推荐了几十位技术人员。当9月间邓小平和陈修和共同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邓小平对陈兴奋他说：“你邀请来的几十位技术人员，全部报到。我们还组织他们学习了政策。这些留法留德的同志，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爱国！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1950年，当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多次研究，决定从实现四川人民自“保路斗争”以来四十年的愿望，即从修建成渝铁路着手，带动经济恢复和百业的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作出决策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推。

5月15日，修建成渝铁路破土开工。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发表了具有号召力的讲话，他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他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领导下，修路大军经过两年的奋战，终于在1952年6月13日把路轨从重庆铺到了成都。是年7月1日，即在建党三十一周年之际，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是四川省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建国后在丘陵地区完成得最快最省的一条铁路。它用事实说明了新社会比旧社会优越。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熊克武说：“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人民群众中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人民坐江山，黄河也有澄清日。
铁路连川陕，从今蜀道不再难。

在通车典礼上，毛泽东从北京送来了祝贺锦旗，上绣着毛主席的亲笔贺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邓小平也写下了质朴的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相对中央来说它是基层，相对西南各省、地、县来说它又具有全局性。这里有上亿多的人口，既是内地又是边陲，工作性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统战乃至外交各个方面，既有工业亦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都需要统筹考虑。从1949年冬到1952年夏这两年多在大西南的工作，对邓小平无疑是一个极可宝贵的锻炼和显示才华的机会。他在这里领导党务、剿匪、土改、镇反、发展生产、处理民族关系以及在农民教育、文化宣传、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取得的政绩，闻名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也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和赞扬。

1951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等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后，9月3日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南海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收获，并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他说：“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深知梁漱溟是一位不随俗、不趋时、不媚上甚至很孤傲的人，难得听到他称赞别人。而年轻的邓小平却得到了这位民主人士的赞扬，毛泽东显得尤为兴奋，他笑出了声，大声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52年7月，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在北京，有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领导担子，等待着四十八岁的邓小平去担当。

17. 邓小平 1952 年奉调中央后，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国大事，及时妥善地解决了“高饶”问题，促进“一化三改”顺利进行。邓小平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1954 年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之进入中央政治局。

1952 年 7 月，邓小平调到北京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总理，总理是周恩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土地改革在大陆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如期胜利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多数地区即将胜利结束；“三反”、“五反”斗争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较量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除了上述四大运动外，党在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整党运动、对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等。通过这些运动，使中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党政军领导廉洁奉公，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民族团结和睦，社会风气良好，全国呈现一派国泰民安、积极向上的大好景象。经过长期战争造成的国民经济满目创痍的状况，已经得到基本的扭转。1952 年比 1949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77.5%，主要工农产品的产量都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一切都说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1952 年 9 月至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党中央经过反覆商讨斟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

根据这条总路线，在周恩来等的主持下，制定了 1953 年至 1957 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五年的时间里，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投资达六百六十亿四千万，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要完成这一空前的伟大历史任务，就需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奋斗精神，扎扎实实地去干。但这时在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处理这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岗（1905—1954）是有着很高政治地位的高级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做过有益工作，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号称“东北王”。1952 年 11 月被任命力人称“经济内阁”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3 年调中央工作。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正在考虑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实现，对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及人选等重新作出安排。久蓄政

治野心的高岗认为，这是他牟取党和国家更高领导权力的难得机会而加紧了阴谋活动。饶漱石（1903—1975）也是党的高级干部。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后调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和高岗一样也是久蓄政治野心，他认为高岗篡党夺权的图谋很快就要成功，就主动投靠高岗，合伙进行反党活动。

1953年6月至8月，高饶在中央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批判薄一波“修正税制”的错误，上纲上线，玩弄“批薄射刘”策略，影射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说薄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后台是刘、周。他们的阴谋是借机搞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由他们取而代之。会议在高饶的煽动下，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闹得会议已开了两个月，周恩来总理还难于对会议作结论性的报告。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发觉了问题，就对周恩来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周接受了毛泽东的“搬兵”意见，请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邓小平指出：大家批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陈云也作了有说服力的发言。毛泽东的“搬兵”之计，为薄一波解了围，也为会议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4页）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决定邓小平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由于在刚刚结束的财经工作会议上，财政部受到了冲击，又加之高饶的阴谋破坏，财政部的许多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不敢大胆工作。邓小平到任后就向大家指出：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他的这种实事求是、责权分明的态度和意见，鼓励了大家既大胆又谨慎地开展工作。在财政部，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财政预算工作的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为指针，率领大家很快编制了1954年国家预算收支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报告。在财政部他还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六条方针是正确的。

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饶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作了报告，邓小平作了题为《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的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邓小平等，分别召开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再次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并任命邓小平担此职务。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担此职务。值得一提的足，邓小平每次担任此职都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这一次又是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党的任务繁重，又出现了严重的党内斗争的时刻，他再次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这并非偶然。它再次说明了邓小平是一

位政治性很强、组织性很强并具有高超组织才能和讲求办事效率的革命家。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大会还决定邓小平等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反高饶的斗争作了总结。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后，在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批准了上述各项决议，并增选邓小平和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清除了隐患，教育了干部。斗争没有扩大化，没留后遗症。斗争增强了团结，保证了“一化三改”路线的贯彻。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化三改”进展迅速，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采取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相类似的方法。至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过程中，尽管出现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但在几亿人口的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一深刻的社会改造，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党在进行三大改造的同时，还加紧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建设工作，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极可宝贵的探索。

刘少奇于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深入各部委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外出调查回京之后，于2月到4月，也听取了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邓小平和毛主席一起听了许多汇报。在这段时间里，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即起床就听汇报，穿插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非常紧张，非常耗神。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和思索的基础上，4月25日在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从十个方面探索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这里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集中体现和代表作。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写信给毛泽东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高饶”事件的正确处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卓有成效的探索。说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

件已臻成熟。此后，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成为党中央的重要议事内容，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更加忙碌了。

18. 筹备八大时，毛泽东亲自为邓小平作宣传，说“这个人比较公道”、“有才干”……当总书记“比较顺”。在八大路线指引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八大的具体筹备工作是邓小平主持的。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1956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对八大五个文件进行讨论和修改，邓小平就八大的有关事项作了说明。8月3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重要讲话，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六个文件草稿作了说明。

9月，在八大开幕前夕，酝酿中央领导班子问题时，毛泽东建议设中央书记处，并推荐邓小平为中央总书记。9月13日，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了关于设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问题。当时邓小平表示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邓）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邓）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道，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278、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宣传”是实事求是的，是公正的。他以几十年的观察为依据，向全党作郑重而负责的推荐。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报告，毛泽东的开幕词和这几个报告，构成了大会的主题，体现了党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

的积极成果。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的总任务。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在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报告中，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集中地论述了在新形势下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官僚主义、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为此就要一方面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并从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保证对党员的监督；另一方面则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他强调说，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235页）邓小平在八大所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把毛泽东党建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在大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李富春在发言中提出的经济管理方面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薄一波在发言中提出的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方面“三条杠杠”的意见；董必武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意见等等，都是很可宝贵的。

总之，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已被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所证明。

在随即举行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此时毛泽东六十三岁，邓小平五十二岁，邓小平和陈云（五十一岁）是这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成员。

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是掌舵人，是最高的决策者；作为总书记，邓小平工作在最前沿，是把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变成实践的总指挥者。邓小平后未曾说过：“在我一生中，最忙的就是（当总书记的）那个时候。”

这时，已过花甲之年的毛泽东主席，对年轻的总书记邓小平非常欣赏，以至于他在同苏共领导人交谈时多次流露出对这位“小个子”的垂爱。那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还比较密切，双方以同志相待，在一次聚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甚至认为邓小平“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2页，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还对赫氏说过，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邓小平的历程》下第107页）赫鲁晓夫就当时邓小平和

苏斯洛夫辩论的事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第3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民主政治生活是较为正常的，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大家解放思想，共同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课题，并取得了宝贵的成果。过些成果有的反映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之中，八大之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例如：

毛泽东在1956年底提出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他在几次谈话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

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这里的“又搞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指已消灭的那种资本主义，而是公有制为主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即允许个体、私人和外资企业有适度的发展，作公有制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讲话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刘少奇在1956年11月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这就又向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僵化观点提出了质疑，他随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又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上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陈云在继八大发言中提出“国营和集体经济为主，个体经济为辅；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著名观点之后，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又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的“唯实”观。

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八大以后至1957年春，同毛、刘、周、陈一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探索。1956年11月17日，他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强调：“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8、259页）1957

年4月：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他说：“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个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他还强调搞建设要善于学习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说：“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作为党的总书记，他还特别讲到了在建设时期党要警惕“犯大错误”的问题。他说：“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1、263、264页）邓小平不无担心地发出警告，“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第一党员要接受党的监督，第二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的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271页）

在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导下，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也显得很活跃。中央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他们自觉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在自然科学界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社会科学界出现了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人口问题的大讨论。经济学家孙冶方1956年11月28日发表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对流行在经济学界的斯大林的观点，即把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提出了挑战，从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理论界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讨论得也很热烈，1957年初吴景超、费孝通、陈长荷、孙本文、全慰大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论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7月召开的首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

这些正确的探索，以及呈现出的思想解放、气氛活跃的生动局面，本应成为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由于紧接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以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些探索没有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下去。

19. 自五十年代后期，
毛泽东，党中央在指导
方针上发生“左”的失
误，邓小平说“那时候的一些错
误我也要负责的”。毛泽东
在纠正失误时。称“我当
主帅，你小平当副帅。”

前已述，在八大和八大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从而导致了党在指导方针上“左”的失误。

1957年夏天，出现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观点，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政治上的“左”扩大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忽视经济规律和生产规律搞“穷过渡”、“急过渡”、“三面红旗”，造成了更多更大的失误。

此后，党和毛泽东就陷入失误和纠正失误的反复交错的过程中。在纠正已发觉的失误时，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失误纠正得不彻底，乃至又导致新的失误。

1958年11月，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1月和12月之间，又在武昌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左”的倾向。接着，举行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批评了“急过渡”、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错误。1959年2、3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批判了“共产风”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1959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对“高指标”进行了压缩。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并且，他要亲自挂帅，让邓小平当副帅。他风趣他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无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主席又对邓小平说：

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人物》

另外，毛主席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内还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

毛泽东的这些诙谐语言，自有一番深意。他曾在 1956 年 1957 年、1958 年初和 1958 年底多次向党内外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甚至曾想只任党的“名誉主席”，退居二线。但“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和遇到的麻烦，使他改变了初衷，他要立于前沿去掌舵。同时，从他的话中，我们也可体味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赞赏和器重。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采取许多措施，继续纠正高指标的失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所有这些纠“左”的努力，都是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大框架内进行的，是对“左”倾错误的有限纠正。因而，形势没有根本好转，进而造成了纠“左”的中断。

1959 年夏，在纠“左”的过程中又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其结果越“纠”越“左”，失误愈加严重。接着就出现了由于失误、天灾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 年庐山会议纠“左”中断，开展反右，酿成党之不幸，国之不幸。邓小平没有出席庐山会议，此时他的一条腿由于意外而跌断。伤愈后，腿力仍很差，人们注意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是柱着手杖参加国事活动的。

1960 年，困难达到最为严重的程度。从政治方面看，大搞阶级斗争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反右斗争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反右倾斗争伤害了三百六十多万人，在各种名目如“拔白旗”、“整风整党”、“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全国被错整的估计有上千万人，受牵连和影响的有好几千万。阶级斗争扩大化，整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党内党外正常的政治生活，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干违心的事，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愈加厉害。从经济方面看，问题更加严重。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回落到 1951 年甚至建国时的水平。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 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 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猪肉人均消费最减少 70%，在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普遍地吃不饱、穿不暖，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妇女病普遍发生，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增。学者们根据正式公布的有关数字材料推测，1959 至 1961 年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在四千万左右，三年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亿元。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反右倾”等等，原本是想让贫苦的中国人民“提前”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是出现了如此痛心的事实。这个严酷的事实使他老人家倍感揪心。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在挨饿，并痛苦地要求他的子女在全国人民挨饿的时候要带头忍饥挨饿。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位当年指挥沙家店战役获得大胜而只要求一碗红烧肉“犒劳”的人民领袖，宣布从 1961 年 1 月 1 日起“不吃猪肉和一切荤菜了”。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创刊宣言》中曾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老人家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奋斗了大半辈子，没承想建国十多年了，问题又严重起来了。以至于这位伟大的

政治家、理论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1961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下决心把这，一年搞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从而纠正失误，渡过困难。他在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心思想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克服困难而斗争。他带头作自我批评，说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我这个人就是官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全会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各领导人便分头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毛泽东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南三区”农村调查。邓小平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北三区”负责人会议，研讨农业问题。3月，北三区和南三区调研人员到广州会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开始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规模过大以及管理方面的失误。然后中央领导同志又率工作组下去，征求对六十条的意见。毛泽东赴浙江，刘少奇赴湖南，周恩来来到河北，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的顺义、怀柔，广泛征求意见。刘、周、朱、邓、彭通过调查，都向毛泽东报告了农民对“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化时农民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意见。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六十条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作了修改，“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持续两年多的公共食堂，在农民群众的要求下终于解散了，这对于遏制农村由于饥饿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六十条》的启发和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相继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规章条例。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组织和领导了这些条例的制定，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工业六十条》和《高教六十条》。这些条例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各方面出现的“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主持了甄别平反工作。至1962年，按中央文件的规定范围，为三百六十五万党员干部和三百七十万群众作了甄别和平反。

在经过失误、纠正失误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对社会主义问题开始有了较为冷静的再思考。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农业）“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我还不大相信。

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董边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进一步纠正失误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在这里讲得很坦率，很实在，也很中肯。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总结了经验教训，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2月4日的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建设问题。在邓小平讲话过程中，毛泽东在旁边有十次插话，对邓讲的或补充、或加重、或提示，表现出邓、毛意见的一致。

林彪也在会上发了言，但其调子却与整个会议的气氛很不协调，他继续鼓吹个人崇拜，说出现失误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发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都犯错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而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已经作了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央各领导人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努力下，国内形势明显好转。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二百五十亿斤，农业总产值增长6.2%，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重工业生产速度放慢，农、轻、重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工业总产值达到九百二十亿九。

党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中，有成绩也有失误。邓小平认为，成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失误同样也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出现的，他不能同意林彪那种把失误推给大家，把成绩归一人的说法；也不同意另外一个极端看法。邓小平后来曾公正他说：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

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

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

20.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
对学习毛著提出一套实
用主义的“方针”，
邓小平支持罗荣桓对之
进行了抵制。在毛泽东思
想与马列的关系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动词”。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的第一个亮相，就是打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学什么马列主义呢？老实讲，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什么捧场，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又说，“马克思本人就没有写过哲学著作”，“恩格斯也是讲了几段子，列宁也是写了几篇小文章”，“在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导师中间还是我们毛主席”。

1960年9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

林彪还提出了“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等一套实用主义的学习“方针”。1960年2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说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道理大多了也不需要，但是一点没有也不行。”10月，他在视察部队时又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1961年1月，他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二十一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林彪就是用这一着，树起他“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跟毛主席”的形象。他对此很是得意，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情不白禁他说道，庐山会议以后他靠这一着，“一通百通，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办得正确，办得好，办得有效果。”

在林彪的错误宣传和影响下，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也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把什么事情都简单地与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来。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老革命家，对林彪这一套“花架子”的实质是早有觉察的，并进行了抵制。

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早就注意到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王任重回忆说：1959年容国团得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后，有人牵强附会他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邓小平指出，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1960年

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时，专门讲了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并说明这些意见征得了毛主席的同意。他说：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3、284页）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说：“他（毛主席）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4页）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所阐明的观点，和林彪的“顶峰论”、“走捷径”、割裂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庸俗化是鲜明对立的。他用“坚持”、“保卫”、“发展”三个动词，准确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这一表述，得到全党的公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在1971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林彪搞的“三个副词”和邓小平提出的“三个动词”。他说（大意）：“继承”、“捍卫”、“发展”三个动词，还是邓小平提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加一个“创造性地”，又加一个“全面地”。九大的时候，主席看到这三个副词，把它勾掉了。副词太多也有副作用。有三个动词就讲清楚了。譬如“继承”就讲清楚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源，不要认为副词搞得越多越好，象红卫兵一样。过去人民大会堂标语那么多，主席看了说统统拿掉。主席说，你走过了，总叫你走回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防止庸俗化。

在60年代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对林彪的实用主义“学习方针”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0年12月，即在林彪提出“背语录”不久，罗帅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采取“一条线五结合”的原则，即学习毛著要以党史为线索，要与学习马列著作相结合，与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与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实质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背诵几段语录。

1961年1月，罗帅在与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谈话中，更直接批评了所谓的“带着问题学”。他说：

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

2月，罗荣桓在同《解放军报》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指出：“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引证于某些词句。”“对毛泽东思想也不要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他和贺龙下部队视察时，针对林彪提出的“立竿见影”问战士：怎样理解“带着问题学”，怎样“立竿见影”？战士们答不上来。连队指导员也说，支委会研究来研究去，不知怎样才能立竿见影。罗帅告诉大家：“毛主席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不见影，何时见影，先不要考虑它。”

罗荣桓批评的矛头，直指林彪的“二十一字方针”。斗争终于发展到面对面的交锋。

1961年4月30日，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彪主持会议，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出席会议。在讨论《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帅对《概则》中“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提法，提出了意见。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罗荣桓直接提出了质疑。

林佯装不知，问：“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示意列席会议的梁必业读了有关条文。

林彪反问：“那你说该怎么学呢？”

罗坦率地答道：“应当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林彪阴沉着脸不吱声，然后言不由衷他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没等罗帅说完，林彪就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喊道：“好吧，散会！”随即站起身悻悻而去。

与会的老师 and 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十分惊讶。罗帅竭力克制怒气，抖着手拿起文件，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场。

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林彪既然听不进不同意见，罗荣桓只好向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得知后，感到罗帅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经过讨论，书记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曾回忆说。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外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页）

1977年5月，邓小平又提起此事，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9页）

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罗荣桓批评林彪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足够重视和有力支持。1961年，毛泽东正对过去的失误进行反思，倡导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他本应对林彪进行批评的，但却在6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却表扬了林彪，说其“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这就使得林彪反而有恃无恐了。

21 . 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
关系日趋恶化，邓小平
总书记同苏联大国大党
和霸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深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赞赏。

在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他不得以很大的精力协助毛泽东主席处理国际共运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

中苏两党的分歧，从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起就开始了。朱德和邓小平等代表中共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原则上是赞成的。由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表明了这种态度。邓小平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但是，中共又认为斯大林的功是第一位的，应“三七开”，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和全盘否定。中共的这种立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也讲明了”。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领袖们的“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35、234 页）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之流却说邓小平的报告是“大毒草”。毛泽东则说了公道话：“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在 4 月已发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了中共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国际共运的其他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为了解决中苏两党和国际共运存在的分歧，也为了显示世界共产党的团结，1957 年 11 月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了代表会议。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会议，在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当时还是党外人士的宋庆龄副委员氏外，邓小平总书记就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助手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苏两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上，都作了一定的妥协，和世界各国兄弟党一起签署了《莫斯科宣言》。但是，分歧并没有消除。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不听苏共的指挥棒，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使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不能容忍。

1958 年 4 月，苏共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7 月又提出与中国建立共同舰队，明显涉及中国主权，为毛泽东坚决拒绝。此后，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行径，愈演愈烈，他们妄图制服中国。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9 月 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中印边境冲突表态，公然偏袒印度，从此，把中苏内部分歧暴露于世。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以“老子党”的口吻训斥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他回到海参崴又讥讽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 年，分歧进一步加剧。2 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中国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攻击中国，中国代表当即进行了驳斥。以独立自主力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容忍苏共领导集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老子党”自居，无端训斥中共，公然背信弃义，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行径，更何况他们还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通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苏联领导的观点。过了两个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带头并组织对中共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给予了坚决驳斥。7月，苏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方面三百四十三个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协定。同时，还逼使中国归还经济援助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欠下的债务。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上至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百姓家，都忍饥挨饿、勒紧裤带，以极大的牺牲承担起苏共领导雪上加霜造成的困难。中国人民争气，中国共产党决不屈服。

这年9月，为筹备第二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人们注意到，身体健壮的邓小平是带着手杖飞赴莫斯科的，他是在一次运动时跌断了腿，还没有痊愈就出征了。在中苏两党会谈中，邓小平满腔义愤而又态度平和地作了长篇发言，历数了苏共领导违背马列、背信弃义、推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劣迹，邓小平指出，苏共的背信弃义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困难，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苏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邓小平有胆量、有气魄、义正词严的发言，令苏共代表震惊。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所著《邓小平传》曾这样描述说：“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地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中苏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参加了二十六国兄弟党会议，起草即将举行的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文件。11月，刘少奇也到了莫斯科，和邓小平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八十一国党会议，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

这次会议，使激化的中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非常满意，12月9日亲到机场迎接归来的代表团。在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报告了中共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得到全会的肯定。

当时郭沫若曾写诗描述和称赞中共代表1960年与苏共领导进行的谈判斗争，其中有这样两句：

五下莫斯科，
稳坐钓鱼台。

从1960年2月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到11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参加莫斯科会议，确实是“五下莫斯科”；而“钓鱼台”则是语义双关，既指中共的从容、自信，又指中共的斗争方案大都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制定的。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刚刚缓和的中苏关系又紧张起来。此后发生了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攻击兄弟党的事件，以及支持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暴乱，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袒护印方，指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攻击

中国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共于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3 月，连续发表七篇答辩文章，批判了苏共领导，此后双方在准备会谈时，苏共提出五点会谈意见，中共也提出了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双方观点对立，没有妥协余地，可是又都不愿放弃会谈。很显然，这样的会谈，实际上是一场尖锐的面对面斗争。毛泽东把这个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邓小平。

1963 年 7 月 5 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第三次赴莫斯科。从 7 月 6 日起，双方举行了九次会议。每次会议基本上都是一方谈一方听，一来一往，各说各的。西方舆论称会谈是“聋子对话”。在会议进行到第九天的时候，苏共突然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然违背双方原定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任何消息、不破坏会谈气氛的协议。中方代表强烈谴责了苏共这种违背协议的行为，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则提出“坚决抗议”。邓小平蔑视地回答：“你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声明说：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受到公开的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苏共最后发表了《公开信》，苏共和其他几个兄弟党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拥有答辩的权利。

邓小平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苏共领导集团，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也为毛泽东所满意。当 7 月 21 日下午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毛泽东又一次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五千多人到机场隆重迎接。飞机停稳后，毛泽东走到机前，同邓小平等人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并让代表团绕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接受少先队献花。接着，代表团的车队跟随着毛泽东的座车直驶中南海，立即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详细汇报会谈细节。毛泽东一直兴致勃勃，情绪高昂，他对邓小平等代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赞赏。

随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由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具体组织，对苏共《公开信》进行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自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共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九评”发表后不到三个月，即 1964 年 10 月 16 日，挑起这场论战的祸首，苏共第一把手赫鲁晓夫便下台了。

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坚决反对了苏联的大国、大党和霸权主义，坚决顶住了苏共领导对中共、中国的控制和干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这些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是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在中苏论战时期正是毛泽东和中共党内“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因此，毛泽东和党的某些“左”倾观点不可避免地也带到了论战中去，如时代的特征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党际、国际关系问题等，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最大的失误是毛泽东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进了中国国内和党内，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党内矛盾的认识产生了消极影响。

1989 年 5 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谈话，并回顾了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的争论。他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总结这场争论的教训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这主要是指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都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说：“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说，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邓小平最后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5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苏联大国、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实践，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硬汉子，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保持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百折不挠地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22 . 1962 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猫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党纠“左”再遇挫折，毛邓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

1961 年和 1962 年春，党以，很大的努力纠正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的失误，并取得了成效。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纠正失误时，并没有从指导思想解决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曲折。甚至在经济上纠正“急躁冒进”的同时，出现了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右以致越反越“左”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也开始出现意见分歧。

这种意见分歧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如何对待“包产到户”问题上。

“包产到户”是农业集体经济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它是以农户为承包单位，扩大农户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按承包合同进行分配。它不涉及土地的公有制，只是把经营权交给了农户。农民们把这种或类似这种经营的方式，有的称“责任田”，有的称“大包干”等。农民的通俗解释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经营责任制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屡遭禁止。然而这种形式比较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现状，所以自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营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时，总有农民自发地搞起这种生产责任制。1961 年初，在安徽省等地又重新自发地兴起了这种“包产到户”的作法。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允许试办。毛泽东先是不同意，后来又同意试办，继而又不大同意。但是，下边仍在实行，公开的不让于，就秘密地干。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长）下乡做实地调查后，1962 年 5 月再次提出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建议。7 月 2 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表示支持责任田的作法。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纵览》第 101 页）

7 月 7 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又讲了这个看法，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23 页）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是对“包产到户”这种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看法，还涉及到了认识路线、思想方法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人们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的“猫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通俗比喻的理论表述就是：这办法，那办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好办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猫论”与实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实用主义是用主观检验客观，“有用即真理”，而“猫论”则是用客观检验主观，“能逮住老鼠才算好猫”；实用主义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猫论”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了逮老鼠才养猫”。所以，邓小平的“猫论”不仅不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真理标准原理的一个生动发挥。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支持可以试办包产到户的，除邓小平外，还有刘少奇、陈云等。

但是，毛泽东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后来，都是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他虽然曾讲过可以试一试，但那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根本上，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它反映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至于“猫论”，他认为所谓“黄猫、黑猫”就是说“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1962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开始重提阶级斗争。他以“阶级、形势和矛盾”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就要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要“重提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联系“实际”，激烈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认为，这些都是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所谓“黑暗风”，毛泽东主要是指1960年以来尤其是“七千人大会”以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严重经济困难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采取坚决“后退”的调整措施。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讲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所谓“单干风”是指邓子恢、邓小平和陈云等支持农村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认为，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所谓“翻案风”，主要是指彭德怀的申诉信，同时也指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及到了邓小平，表明毛对邓的不满，也表明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此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国际“反修”斗争中虽然还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但在国内问题方面他们越来越难合作了。

邓小平1962年关于“黄猫、黑猫”的讲话，总共三百来字，且是在很小范围里讲的，但其影响之广泛深远是令人惊奇的。人们已普遍把这句话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标准”乃至务实、求实、求是精神相联系，成为邓小平的至理名言。学者们把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概括为“猫论”。顺便说说，“猫论”的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那时是作为批判的“靶子”使用的，而现在则是用来表述邓小平的务实思想。有的学者还从巴蜀文化角度，论证了“猫论”与邓的故乡巴蜀文化的务实性之间的联系。其实，“务实”不只是巴蜀文化的特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务实、求实的通俗说法，在中国老百姓中几乎是尽人皆知的。邓小平的“猫

论”所以深入人心，所以如此迅速广泛流传，是因为它确实说到了人们的心坎里。

也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其极尽批判之能事，相反却起了广为宣传的作用。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一般人怎会知道这是邓小平的说法呢？要不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人们怎会把邓小平的“猫论”与之比较，分出个孰是孰非呢？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本来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家常语，经邓小平一说具有了政治含义，经哲学家们阐发而上升为哲学认识，连艺术家们也对其发生了兴趣。号称“江南猫王”的八十三岁的著名画家陈莲涛，1984年精心创作了一幅《双猫图》，敬献给邓小平。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绒绒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画的上方题辞曰：“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正写道：“小平同志雅正海石老人”。邓小平非常喜欢这幅画，因为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而且具有丰富的含义。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邓小平的历程》下卷第310页）

邓小平用“猫论”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法的支持，实际上是对自苏联30年代和中国50年代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农业必须是“一大二公”、高集中管理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

当然，“黄猫、黑猫”是一种比喻，邓小平使用这种比喻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如果不加分析地滥用，那就会使之庸俗化，甚至与提出者的原意大相径庭。80年代初期，薄一波曾就“黄猫、黑猫”问题直接请教邓小平本人：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薄一波在1994年10月11日就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的业绩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问时，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

这句既深刻又形象的话，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却“惹”来了许多“横祸”。先是作为鼓吹“包产到户”、刮“单干风”来批（当然还没有指名批评谁了）；“文化大革命”中，上纲为“猫论”，把它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大加鞭答，弄得风风雨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就此事请教小平同志。他说，当时，国家很困难，谁能想办法渡过难关就是好样的。话没有错。目的是鼓励生产、恢复农业，没有别的用意，也没有什么用心。你们问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的真谛是饼，制定党的政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愿望，采取灵活的办法，目的是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些政策的威力，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小平同志六二年提出的办法的延伸和发展。（《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23.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连续发动政治运动和斗争，并愈来愈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指责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毛邓的分歧发展到了严重地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和斗争。

1963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1963年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随后，中央制定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工作组进驻农村，“四清”运动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起来。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8月4日，毛泽东同日共一位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继之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与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驱使下，毛泽东愈加关注意识形态。以“游动哨兵”自诩的江青和康生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假情况，出了许多坏主意，使老人家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和错误的决策。1963年11月，毛泽东指责说：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土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剖。（《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51页）

12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送来的一份简报上又批示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52 页）

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进一步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说：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 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53、554 页）

在毛泽东这些批示、讲话的指导下，一批文艺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受到批判，一批文学艺术家被错误地当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学艺术界空气紧张，万马齐喑。

文学艺术界这种“左”倾批判运动，很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学术领域。在康生的指使下，1964 年开展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观点的批判。毛泽东支持了康生，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1964 年下半年，康生、陈伯达又发动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把孙冶方主张提高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正确使用经济杠杆和提高利润指标等观点说成“修正主义”。1965 年 12 月，戚本禹带头发动了对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毛泽东很赞赏戚本禹的批判文章，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作法，中央领导人中多数是不理解甚至是不同意的，但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损害，党中央很难及时制止和纠正毛泽东的失误。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 1965 年 3 月 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左”倾政治批判加剧局面的发展，他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60 页）但是，他的意见已经不能产生效果。邓小平的意见既不能对毛泽东发生作用，又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毛、邓之间愈来愈明显地疏远了。毛泽东已有感觉。后来他多次指责邓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恰好说明了必须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通过人乱，达到大治。他认为，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与“三面红旗”、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 60 年代初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相联系。这是国内阶级斗争乃至国际上与帝、修、反斗争的反映。所以，他不满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斗争，他要把斗争直接引向政治，引向中央政治局。

1964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京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

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这里指李维汉）。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6、577页）

同月，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譬如，彭德怀象赫鲁晓大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毛泽东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答：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7、588页）

3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袴田里见时说：王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4月10日，他又对袴田里见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9页）

此后，毛泽东还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常常向听者发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愈来愈理性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方式是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些“左”的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很难接受，但是由于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和领袖地位，他们在一些方面不得不违心地附和。即便如此，头脑机敏的毛泽东还是愈来愈感觉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与自己的不一致。因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4年11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用反话向刘少奇将军，并把邓小平也捎带了进去。他对刘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明明感到毛泽东的话有情绪，还是小心认真地回答：“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曾好意他说过，毛主席身

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2月20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明确批评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毛泽东就把“反修防修”的视线集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身上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不再和刘、邓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支持江青、康生等极少数人暗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1965年2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诬称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此文经毛泽东看了三遍，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众所周知，此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对于1956至1966年社会主义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十年历史，邓小平和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过深刻的反思。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他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失误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带头作自我批评说，对毛泽东的“左”倾，“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承担一些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人负有责任。”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个人崇拜之风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监督制度不健全甚至失去了作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失误。再加之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失误，这就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4 . 1966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但毛泽东并没有忘掉邓小平。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问题的总根了在于“中央第一线”。要解决问题，只靠党内的斗争已不能奏效，必须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办法，大搞群众运动，通过天下大乱，揪出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达到天下大治，以使中国永葆鲜红颜色。他要搞掉“第一线”，他要从退居的“第二线”回到“第一线”上来。于是，毛泽东甩开在“第一线”工作的刘、邓等，依靠林彪、江青等另一批人实现他的愿望。1966 年 5 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此时，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并不了解，也不理解，或者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作法。他们一方面已经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不满甚至不信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努力坚守“第一线”领导岗位和努力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其处境极为艰难。

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在杭州没有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而是通过康生向全国批转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反对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当晚在全国广播，6 月 2 日《人民日报》配以评论员文章发表。毛泽东的意图是以此点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轰动全国，由大乱达大治。实际情况也确实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期的“大乱”的效果，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市委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尤其是北京各类学校“踢开党委”首先乱了起来。而“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考虑的仍是如何避免大乱，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有限制地进行。于是，6 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开会，作出了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还作出了要“内外有别”、不要串连、不要上街等“八条规定”。

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认为刘邓镇压了学生运动，指责“内外有别”是害怕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随后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让“群众自己闹革命”。但是，这“革命”怎么个“闹法”，第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还是不甚了了。7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讲了前期派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为北京新市委承担了责任。他又说“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至于运动以后怎么办，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讲话中都说“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搞不清楚。刘少奇在讲话中老实地回答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8 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决定在这次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以搞掉妨碍贯彻他的路线的“第一线”。在全会期间召开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多次严厉指责刘、邓主持的“一线”中央领

导集体。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有人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为进一步搞掉刘、邓，毛泽东在8月5日开始写《我的一张大字报》。草稿最初是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的报缝上，这大的《北京日报》转载有陈泊达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的大字报草稿就写在这篇社论的左面。8月6日，毛泽东把秘书誊清的稿子再修改润色后付印，同时连夜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8月7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全会所有到会者。毛泽东的大字报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困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非常明显，毛泽东这篇大字报从“炮打司令部”的题目到内容，都是指向刘少奇及其“司令部”的。刘少奇是这个司令部的第一号成员，邓小平当然就是第二号成员了，都在毛泽东的“炮打”之列。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由原来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并且没经过选举后来就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由原来常委的第七位排到了第六位，但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取消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主持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从此结束。毛泽东从二线到了一线，直接掌握了大权。

我们不能用个人之间的恩怨来解释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的本意是搞掉“第一线”，由他亲自领导防修反修的伟大斗争，以确保“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他并不想置刘、邓于死地。现在，既已初步达到了目的，他就想在适当的机会解脱刘、邓。10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给刘、安排了“检讨”的机会，事前，毛泽东还为刘、邓修改了“检讨”稿，从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稿的批示和修改情况看，他确实是想保邓小平“过关”的。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月22日上午4时

邓小平照毛泽东的批示办了。他在“检讨”中没有推脱责任，说：在“文

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在全党，“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关于工作组的责任问题，“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很显然，邓小平是想以自己和刘少奇一起承担起全部责任而避免使更多的同志再受伤害。毛泽东在会上也为刘、邓说了一些解脱的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对我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康生、谢富治要“公开批判刘邓”的意见，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康生又提出刘、邓搞的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毛泽东的打算，是在搞掉“第一线”后，运动就可以在他的领导之下顺利进行了。用五个月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运动就可告一段落。可是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此。他愈是要推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愈是遇到强大的阻力，于是，又愈加迁怒于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他们有很深很大的势力和基础。再加之林彪、江青一伙的搅合、破坏和诬陷，使他很难按他的想法处理刘、邓问题。1966年12月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把刘、邓的问题又升了一级，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江青、康生则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和叛徒集团的头子”，是“老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认为刘、邓还是“党内、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决定要把刘、邓打倒。

1967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8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刘邓司令部”。同时在中南海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住处，江青指挥红卫兵揪斗了刘、邓。六十三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然而，据说邓小平并不在乎，他耳朵聋，红卫兵的激烈言词并没有听进多少，因为他不愿听时关掉助听器就是了。

毛泽东在对待刘、邓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林、江是把刘、邓一起置于死地，而毛泽东则把邓“区分”出来。1967年11月5日，他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1968年10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则“保”了一下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鼓噪“开除邓小平”。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讲道：“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

就这样，邓小平被“挂”了起来。1969年10月，已经隔离了两年有余的邓小平及其家属被“疏散”到了江西。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乘飞机被押往江西。在南昌稍作停留后，这三位岁数加起来有二百多岁的老人，被送往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栋两层小楼住了下来。在邓小平“三起三落”的坎坷政治生涯中，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存江西，那时是因他拥护毛泽东，替毛泽东

挨整；没承想这第二次被“打倒”又流放到了江西，这次又是与毛泽东联在了一起，是毛泽东把他“打倒”的。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残酷。这时的邓小平，头上戴着“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工资由过去每月402元降到每月发给120元生活费，不许外出，不许与外人接触，不许向外打电话，过着实际上被软禁的生活。长子邓朴方受牵连被迫害致残，瘫躺在北京清河救济院，其他几个子女也飘落在各地“接受再教育”，他们都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可是，在毛泽东想来，把邓小平放在江西，大概是想给他上个“闭门思过、回心转意”的机会。同时也可避开北京这个风口浪尖，少招惹些麻烦。或许，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保护”措施。无论如何，对邓小平来说，在他一生风风险险、忙忙碌碌的政治生活中，在江西的这三年确实给他提供了一段充裕的时间，使之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过去、冷眼观察、筹划未来和养精蓄锐。他每天上午被押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做工，下午在庭院里种菜养鸡，晚上读书看报，生活虽清贫而有规律，虽单调而不空虚。他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几十年收集购置的一屋子书，过去由于忙于日常工作许多没来得及阅读。在赴江西时，经过毛泽东特准，他把这些藏书几乎都带了来，刚好可以细细阅读。他还坚持锻炼身体，用冷水擦身。他豁达大度，乐观充实，用他自己常说的老话形容：自信“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邓小平1984年3月在回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问“最痛苦的是什么？”时说道：“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天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55页）1986年9月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又谈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时刻思考着国家、人民的前途。后来来到江西父母身边的小女儿毛毛曾这样描述她时父亲的印象：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第98—99页，华夏出版社1937年版）

历史随后就作出了说明，正是在江西“牛棚”的这些日子里一个治党治国的新思路在邓个平的头脑中萌生了。

25 . 林彪集团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开始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复出与毛泽东再次合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其阴谋集团也随之灭亡。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江西已经注意到了林彪没有出席是年10月1日前后的各种国庆活动。11月5日，被隔离的邓小平夫妇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和工人群众一起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传达文件的“政治待遇”。当邓小平正式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但并未喜形于色。在听取传达和讨论的几个小时中，他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这位政治家在思索。回到小楼后，因监视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也没有向焦急等待的家人说什么，只是母亲卓琳把女儿毛毛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当监视人员离开后，全家吃饭时，卓琳才给家人详述了文件的内容，大家都很高兴。但邓小平还是没有说话。夫人卓琳知道丈夫是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人，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她知道丈夫高兴，就预备了一小杯酒，给儿子朴方也斟上了一杯。父子俩仰脖一饮而尽，邓小平终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此后，一连几天，邓小平还是少言寡语。他在紧张而激烈地思考。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而在这个转折中，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为党工作。饱尝“林彪苦果”的毛泽东，为邓小平诚恳的信所感动，当即把邓小平的信批转全党，开始准备起用这位难得的人才。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陈毅，是1月6日在北京逝世的。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

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无意实有意地同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说明毛泽东准备起用邓小平，先给大家“下些毛毛雨”。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五一节前，毛毛送哥哥邓朴方回北京治病期间，“胡子叔叔”王震将军会见了她。王震详细询问了她全家的情况，并让毛毛回江西转告父亲，毛主席对他是有区别的，说自己已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小平出来工作。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检讨了过去，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很快转给了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总理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前不久，周恩来检查身体已发现患了癌症，他是多么希望尽快起用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并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件，犹如接过一柄“上方宝剑”，立即具体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他先是迅速通知江西党政领导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护和劳动改造，改善生活条件；后又把邓小平的老秘书王瑞林派到邓的身边，照顾和协助他的工作与生活。年底，邓小平在江西井冈山和景德镇进行了参观、调查。

但是，毛主席8月14日的批示已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的回京工作问题还没有解决。阻力何在呢？在“四人帮”集团。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作法，批判极左，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或者改善了处境。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重要批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争得的。1972年10月，《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一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以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当即得到周恩来批示同意。可是，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和反对。张春桥说：“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则直截了当地说：“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毛泽东从他晚年“左”倾错误论点出发。在这场争论中又站在了江青集团一边。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不是极左。这样就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解放邓小平的问题也由热而凉了下來。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毛泽东也似乎淡漠了这件事。周恩来虽处于困境之中，但仍没忘邓小平复出之事。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同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12月17日毛泽东“面示”周恩来时，并没有谈及邓小平一事，可是周在信中却貌似顺便实则有心地把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不仅再次提出，并且进一步落实下来。

周恩来用心良苦，终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打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2月20日，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逐生活，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去迎接与毛泽东的再一次伟大而困难的合作。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斗争激烈，政治局最终还是在3月10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没有也不可能对邓进行平反，而只能以对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作出。但是，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它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作出邓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就向毛主席、政治局请假，请求“病休”两周。他的癌病加重了，只是在邓小平的复职一事终成事实的时候，他才稍微舒心而决定休息一下。

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请邓小平去毛主席住处开会。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再次热烈握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党史文汇》1992年第12期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邓小平作为副总理陪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的出现，立即为外国记者所关注，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说：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0月19日，邓小平在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之后，专程到韶山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那天，他是乘坐一辆灰色吉姆车从长沙驶到韶山的，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乘坐的就是这种车。当时，邓刚复职不久，接待工作是按所谓“不冷不热”的方针进行的。但是，邓小平并不理会这些。他一下车就与迎候人员一一握手，说：“这个地方我很早就想来。1965年想来，工作忙，没来成；1966年又想来，后来就来不成了。”在毛主席故居，邓小平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一生都把毛主席看成是自己的长者

和战友，他久久地凝视着每一件文物，思考着毛泽东的历程。在毛泽东诞生的那张木床前，他露出了温馨的微笑。他后来曾多次讲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步入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的卧室，他凝视墙上悬挂的烈士遗照，陷入沉思。他很熟悉这位身材魁梧、嗓门洪亮的英俊青年。在中央苏区，他们曾是共患难的战友，“邓，毛，谢、古”中的第一号是邓小平，被称为“毛派头子”；第二位便是这位英俊青年毛泽覃。他 1918 年随大哥毛泽东在长沙读书，1923 年毛泽东派他到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到井冈山跟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区委书记、特委书记、县委书记和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30 年代，他和邓小平等一起反对“左”倾路线，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4 年红军长征时，毛泽覃受“左”倾路线排挤被留下来。1935 年 4 月 25 日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九岁。邓小平久久地看着这位比他小一岁的战友，仿佛感到烈士那双眼睛里流露着悲愤与不平。邓小平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他的语气悲切之极，令人荡气回肠。

在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卧室里，邓小平透过昏暗的光线，仔细打量着毛泽民的照片，说：我认识毛泽民，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均。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毛泽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他是 1943 年在新疆牺牲的。

毛泽东，一家在革命战争中一共牺牲了六位亲人，可谓满门忠烈。邓小平怀着敬意在毛泽东故居前照像留念。

随后邓小平步行到毛泽东陈列馆参观。那时陈列馆受“左”倾影响，没有如实反映毛泽东与邓小平合作的业绩。参观后，工作人员请小平指示。邓很坦荡地回答：“你们陈列的是历史，符合历史就行。我没有指示。”在吃午饭时，邓小平起身举杯说：“来，让我们为我们党，为毛主席干杯！”韶山之行，更加深了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一家的了解，并了却了他多年的夙愿。1981 年韶山管理局请小平为毛泽东旧居和陈列馆题写匾额。邓小平几易其稿，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他对原来使用的“旧居”和“陈列馆”作了改正，使之名副其实。

邓小平从韶山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酝酿给他加重担子，让他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

此事是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毛泽东建议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知甚深。在邓小平刚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叶剑英就亲去邓的住处看望，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同时，他还向邓小平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帅当面向毛主席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帅的建议。（《炎黄春秋》1995 年第 4 期文《“文革”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生死交》）

12 月 12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小平参加。会上，他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在会上向大家推荐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毛泽东又指着叶帅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

随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京议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再次推荐邓小平，他说：

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转身又对身旁的邓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花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日，病势沉重但心情很好的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毛泽东在十天里三荐邓小平，用这么多话称赞一位领导同仁，实属罕见。揣摩毛主席这些言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确实很器重，很了解，很欣赏邓的才干。至于对邓小平的“缺点”，老人家看的并不一定准确。邓小平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表里如一，这应该是优点，而毛泽东则希望他改成“外面和气一点”、“里面是钢铁公司”，即所谓的“柔中有刚，棉花藏针”。顺便说说，许多文章、著作中都是把“柔中有刚”、“棉花藏针”作为邓小平的特点、优点来描述的，笔者认为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毛泽东是希望他这样，要邓小平改成这样，而邓小平并不是这样。他的特点和优点是表里如一，对违背原则的人和事他外面是“钢铁公司”，里面也是“钢铁公司”；外面是“针”，里面也是“针”。这个特点在他后来同江青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不到一年的时间，邓小平由被放逐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成为身兼党、政、军要职的领导人，变化何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呢？

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内乱还绵绵不止，国民经济岌岌可危，毛泽东急需治国能人，协助他果断而迅即地实现安定。

原因之二是年迈多病的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形单力薄，力不从心。由他法定的“副统帅”林彪谋害他未遂和自取灭亡深深刺激了他，江青一伙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周恩来又得了绝症。他是多么急切地需要邓小平的支持啊！

原因之三是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过去推行过“修正主义路线”，但他对邓小平一直抱有好感并寄以希望。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四十余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主流，深感邓小平这样的人才难得。“家贫想贤妻，国难思良将”，应该尽快把邓小平扶上马了。

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生分若干年之后的再合作，毛泽东是主动的，邓小平更是全力以赴的。

26 . 周恩来抱病力挫江青一伙“组阁”阴谋，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是 1972 年 5 月发现得了癌症的，但他一直带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4 年，周的病情越来越加重，工作重担也就越来越压向了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是十分真挚和深远的。比周恩来小六岁的邓小平后来讲过：“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位兄长”。

1974 年初联合国召开第六次特别会议，染病的周总理不能参加，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代表周恩来出席，并在大会上发言。这是 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参加并阐明中国外交政策纲领的大会。当然，这也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担任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使命。对邓小平复出二直心怀叵测的江青一伙，公然阻拦邓小平出国。毛泽东 3 月 27 日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4 月 4 日毛泽东审批了邓小平的讲稿，邓 6 日飞往联合国，10 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精辟地阐发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政策。邓的演说引起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反响和欢迎。邓小平载誉归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向他表示同志般的祝贺。1984 年 11 月 4 日杨尚昆曾向美国作家哈里森讲述过邓小平此次出国时的一段小插曲：

那时国家财政很困难，一位副总理出国才领到三十元(合十六美元)的零用钱。邓小平决定用这点钱来买法式羊角面包，黄华还建议他回国途经巴黎时再买，那样可以便宜些并保持新鲜。邓接受建议，回国时果然用这点钱一下买了一百个羊角面包，带回来送给周恩来和其他早年在法留学的老朋友。此事在今天说起来不免令人酸楚，而当时邓副总理想的却是，早年在法国当火车司炉工时，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充饥就很高兴了，而今一下子买了一百个.....

6 月，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样，接替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问题，更为迫在眉睫。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0 月 4 日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

10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崇洋媚外”。风庆轮是中同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轮船。1974 年 9 月底，该轮执行远航欧洲任务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该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洋奴哲学”、“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已经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

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10月4日，江青在一份关于该事件的材料上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声言“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再次发难。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逼邓表态。邓严正回答：“我要调查。”江青即大吵大闹起来。邓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四人帮”一哄而上对邓进行围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向他们投以蔑视眼光，愤然离开了会场。邓小平从心底里嘲笑江青一伙的无知，后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二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四人帮”在科学知识方面一窍不通，而在搞权术方面却是诡计多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个欢而散的当天晚上，“四人帮”便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派王洪文第二天即飞往长沙，“恶人先告状”，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汇报，争得支持，遏制邓小平。10月18日，在王洪文飞往长沙的同时，江青又找负责与毛泽东联络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也向毛主席报告，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扬长而去”等等。

往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也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他嘱咐王、唐：“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其实，毛泽东对江青的图谋也是清楚的。王洪文18日飞抵长沙后，当晚向毛主席报告了17日政治局会议“争吵”的事，鼓惑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何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的用心是想让毛泽东联想起1970年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的混乱，发话支持“四人帮”，可是王洪文的企图落空了，毛泽东不仅没有支持他，反而批评了他。毛泽东说，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做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北京，已经动过两次手术的周恩来，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等人进行了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到医院开会，按毛泽东的指示落实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医院成了周恩来领导的原有六个办公室之外的第七办公室。

但是，江青“组阁”之心不死，11月12日她致信毛泽东，再提让某某当副总理，某某当副委员长，以及某某当部长，等等。毛泽东当即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

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在毛泽东给江青作批示的同天，邓小平也飞抵长沙，面见了毛泽东。毛、邓在亲切的气氛中作了交谈。在座的还有王海容和唐闻生。

一开始毛泽东就幽默他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这是指前不久邓小平顶回江青挑衅的事。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

“好！”毛泽东很高兴，说邓顶江青顶得好。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说。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王、唐二人又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答：“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这个好。”他很高兴。

邓小平随后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他向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他很同情邓，又很支持邓承担重任。

江青11月19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是公然伸手要官了。毛泽东于20日批示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一伙“组阁”的图谋终遭破产。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王洪文也到了长沙。毛泽东在同周、王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到邓小平时说。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周恩来听得懂。不懂英文的王洪文木然。

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打断周的话，一字一句他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欣然放下了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郑重地点了点头。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

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负责为病重的周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字数不超过五千字。邓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务。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四化奋斗目标。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2月1日，周恩来主持有十二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总理郑重地宣布了各副总理的分工，首先说的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随后，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周总理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予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人物》1994年第3期铁骥文《周恩来与“全面整顿”》）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生产指数下降，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军队也在在严重问题。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历史把他推到这个位置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他已七十一岁了，但精力仍然很充沛。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时深入思考的经纶大略付诸实施。

27 . 1975 年，邓小平依据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开拨乱反正之先河，促使形势迅速好转，病危的周恩来称赞邓小平“你比我干得好。”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1974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发表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时，周恩来再一次转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接着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贯彻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精神。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作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适应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但是，几乎是在同时，他又作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批判“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把精力仍集中在阶级斗争上。

而“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的邓小平，这时却比毛泽东清醒。在江西住“牛棚”的日子里，邓小平就曾思考“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并酝酿着改革的大思路。所以，他一重回领导岗位并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后，就立即拨乱反正，立即进行改革的尝试。1986 年 9 月邓小平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回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Ⅰ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1—172 页）

邓小平 1987 年 10 月 13 日同外宾谈话时，又回顾了他在恢复工作后尝试改革的情形：

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5 页）

当然，邓小平当时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以改革为总方针”代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在当时毛泽东自己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特殊情况下，而不得不以毛泽东的某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示来纠正毛泽东的失误的特殊方式。

但是，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却是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和斗争。针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比“这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强调“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搞起的“派性”，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种种谬论和行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优良传统要恢复”、“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的任务，等等。可以想象，邓小平这一套拨乱反正的做法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毛泽东虽然把邓小平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岗位上，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并没有改变。江青“组阁”虽然失败了，但她和她的一伙仍占据着重要领导岗位，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邓小平，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邓小平一方面不得不注意斗争的策略，另一方面则突出地强调要“敢字当头”。他在许多讲话中都讲到了“不要怕”，“不要怕抓生产”，“不要怕派性”，“不要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共产党员为什么怕？”“怕字当头，不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把队伍带起来”，“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在 1975 年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 页）

为使各级干部敢字当头，素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带头不怕再一次被“打倒”。他在 5 月间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0 页）正是在这种认识和具有这种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了对各条战线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

邓小平首先是抓铁路，以整顿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推动整

个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在他的领导下，2月1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同时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实现四化的两步设想。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首先要解决铁路运输问题。这位当年在法国曾经当过火车司炉工的领导人指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1964年增加了8.5倍。“文化大革命”把铁路行车章程、纪律都给否定了。邓小平这位老火车司炉工重申了“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值班不准喝酒”等一系列老章程，狠狠批判了“派性”，号召同各种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铁路整顿立竿见影、徐州铁路局过去二十一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经过整顿在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计划。

在铁路战线整顿的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拉开了整顿的帷幕。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作《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开始整顿钢铁工业。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讲话，明确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解决领导班子存在的“软、散、懒”的问题，用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检查和端正党的作风。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军队整顿的任务》报告，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农业战线的整顿也由此开始。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领导了科学、教育、文艺战线的整顿。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这篇讲话中，还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把整顿工作引申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来。

邓小平的这一套“全面整顿”，其实质就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全国经济形势很快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和发展。工业从第二季度开始，一月比一月好。工业总产值1975年比1974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975年比1974年增长4.6%，农村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工农业总产值1975年达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派性得到遏制，党性得以加强。党和人民群众开始从整顿中觉醒，对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厌倦和不满。

1975年秋，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取得重大成效、全国形势明显好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却愈加严重了。9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恶性肿瘤把他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消耗到只有几十斤。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给他动了一次大手术，他已经无力走动了。但是，周总理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他的头脑仍是清醒的。叶剑英元帅几乎每天都到医院看望总理，他们常谈的话题是“邓小平”、“中央”

和“军队”。周总理对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邓小平也多次去探望这位他始终敬重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兄长。当医生发现总理的病情已无法挽救时，邓小平指示医疗组要想尽办法使总理“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疗组又为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总理忽然问道：“邓小平来了没有？”邓小平赶快走近手术车握住总理的手，总理望着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话是对邓小平讲的，也是对周围其他首长讲的，更是对党、对人民讲的。

周恩来与邓小平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几乎是看着这位四川少年由青年团员成长为中共党员、党的干部、党政军的重要负责人、党的总书记，看着他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崛起，一步步成熟，一步步建功立业，一步步成为一代政治家。周恩来对邓小平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清楚地知道，邓小平在重压之下，“举重若轻”，他推进整顿和改革的尝试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位伟人在生命垂危之际坦荡地对邓小平说“你比我干得好”，这与其说是周恩来的伟大谦虚，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最后一息生命对邓小平的巨大支持。

邓小平在1975年所推行的全面整顿以及对各种否定发展经济和宣扬“穷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他后来倡导改革和拨乱反正的先导，是他新思路的一次预演和尝试，有着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新思路搞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

28 .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勇捅江青这个“马蜂窝”，迫使这个以“文革旗手”自居的特殊人物不得不在1975年第一次作出书面“检查”。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还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就是他捅了江青这个“马蜂窝”。

“九一三”事件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一伙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起来。他们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看成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处心积虑地要拱倒这些老前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江青总是以她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图谋实现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目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要露出“马脚”。1973年11月，毛泽东依据不可靠的信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姚文元抓住此事，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以图“打倒”周恩来。毛泽东发觉了江青等人的企图，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的作法，说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974年初，江青等又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批林批孔”中又加上批“走后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叶帅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又一次制止了江青等人的作法，说这是“形而上学猖獗”，是搞“三箭齐发”，“冲淡了批林批孔”。但是，毛泽东屡批，江青屡犯，根本不思悔改。一般人也因她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投鼠忌器，不好与之计较。这就使得江青更加骄横跋扈，似乎谁也不敢捅她这个“马蜂窝”。但是，邓小平却敢于捅这个“马蜂窝”！

1975年2月，毛泽东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江青一伙再次趁机掀起攻击周恩来的浪潮。这次，他们打的旗号是反“经验主义”，姚文元3月：日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正确性”时，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4月1日，张春桥又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进一步宣扬了姚文元的观点。张春桥3月1日对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话时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理论”的社论，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4月4日，江青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在他们的鼓动和操纵下，全国各大报纷纷发表“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这股“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很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看透了江青一伙的图谋，决定要捅一捅这个“马蜂窝”。

4月18日,毛泽东偕邓小平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毛泽东当着金日成的面,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他对金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给你谈,此人叫邓小平。”又说:“邓小平会打仗,还会反对修正主义。他被红卫兵打倒了好几年,现在没事了,又起来,我们需要他。”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借机以向主席请教的方式,向他报告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大批“经验主义”的情况,并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此事当即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组织新华社写的学习理论问题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他批评江青等人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4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江青等人的作法。由此,大批“经验主义”的声浪,也就很快声细如蝇了。

5月3日夜,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再一次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

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他待大家坐定后,一开始讲话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说。因眼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张春桥那篇反经验主义的讲话;自己只听了一遍,没有听出问题,“放过了”。他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他说,王明搞的教条主义统治党达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又提起“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然后,他加重语气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转向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历史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随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继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又于5月27日和6月3日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江青等先是在会上“沉默,沉默,又沉默”(张春桥日记语),后又在会下攻击政治局会议搞“突然袭击”,是“围攻”,“过了头”,等等。

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三箭齐发”和“反经验主义”三件事,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严厉他说:“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邓小平义正辞严地指出:“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可是,你们连问题的“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

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邓小平拍着桌子严厉斥责江青一伙的诬蔑，并反复声明，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腐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叶剑英也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江青等人借口所谓“对付林彪”搞小宗派，搞“四人帮”。他说，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党，叶帅指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他激动他说：“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炎黄春秋》1975年第4期载杨言东、石文：《“文革”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生死交》）

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的批评压力下，先是王洪文顶不住了，被迫假惺惺地作了检讨。最后，江青也摆出“弱者”姿态，承认上次会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没忘记强调客观：“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主席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政治局会议批评的三件事作了检讨。她在书面检查中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江青在书面检查中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自“文化大革命”九年以来，江青这个以“文革旗手”、“一贯正确”自居，专“革”别人“命”的“革命家”，第一次不得不写出了虽然极不深刻但毕竟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书面检查。

邓小平捅了这个“马蜂窝”，实在令一切正直的人们感到痛快。

不久，毛泽东又找邓小平谈话，肯定了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他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毛泽东又讲：“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他是说过去人们不敢惹江青，这种状况在政治局快要转了，他为此而高兴。

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毛泽东表示赞同，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一次鼓励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小平也明确回答：“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那好！”毛泽东高兴他说。邓又讲：“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毛泽东笑了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这里引用的是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名句：“夫忠直之迁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意是喻指忠直之士、抱负不凡之人，往往遭到小人的非难和打击。毛泽东以此喻邓小平，可谓推心置腹。邓小平说：“主

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泽东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9月，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表不久，江青一伙故伎重演，在昔阳农业学大寨会上批《水浒》，影射邓小平和周思来。毛泽东得知此情非常气愤。一次会见外宾后，毛泽东对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江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你不必跟她计较。”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虽然多次严厉批评了江青，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但他又认为江青“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当然要一分为二。”对她和“四人帮”的错误认为“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江青一伙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得太紧密了，毛泽东要维护“文化大革命”还得依靠他们。江青一伙后来似乎也摸准了毛泽东的心病，所以就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攻击邓小平，从而取信于毛泽东。这一招果然发生了作用。

29 . 1975 年冬至 1976 年
春，风刀霜剑严相逼，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
分歧在“四人帮”挑唆
下日益加剧，终于导致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现在看来，毛泽东在 1975 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他认为“反刘反林有功”的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七个指头”的成果，而江青这些人也确实只会“革”别人的“命”，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则是一窍不通的；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去“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些老同志也只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急是提防着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种“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双轨制”，反映了当时毛泽东面临的局势和他的心态。他一方面感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生产下降，人民不满，再也不能乱下去了，希望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希望证明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其主流只能肯定不容否定。如果说他老人家还像当年那样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能够亲自驾驭局面，情况或许能暂时如愿。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八十二岁高龄，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了。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年年重病，大有一蹶不振之势，况且此时他眼已失明，不能行走，连言语表达都很困难。老人家头脑虽然还算清楚，但已很难直接驾驭局势了。他苦干找不到能够完成上述两方面愿望的统一的一种力量，只得既靠邓小平去促生产，去稳定局面，且不允许江青一伙过多地干扰；又要依靠江青等人去实现保住“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且不允许邓小平的“整顿”踩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线。总之，毛泽东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他体力与愿望的矛盾，他依靠力量之间的矛盾，等等。

这些复杂的矛盾，造成了 1975 年形势发展的离奇性。

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 年 9 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 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 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支战线主要矛

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 72 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使他立即警觉起来。当然，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站在江青一面反对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一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1 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加罪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几位同志，于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主席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

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学，并“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子里。他们自认是毛主席身边的“小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向毛主席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这年的秋天是那么萧条，冬天又似乎特别地寒冷。

在医院的周恩来，动了十四次手术，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要动一次手术。在9月20日进手术室前，他大声他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他对江青之流以评《水浒》中伤他所作的回击。10月下旬，周恩来再次进手术室前，把邓小平叫到跟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表示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当12月叶剑英看望周恩来时，周以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这里的“他们”是指“四人帮”。周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1976年，中国进入“本命年”龙年。春寒料峭，严冬虽过，春天却姗姗来迟。

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毛泽东重病在身，他终未和周恩来作最后的告别。当身边人员问他“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他痛苦而吃力他说：“我也走不动了。”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出面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或张春桥作，但王、张都自知不够格，于是让叶剑英出面，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回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四人帮”无奈只好同意。毛泽东最后“划圈”批准了这个安排。当全国老百姓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中得知是邓小平为周总理致悼词时，心情稍微得以舒展。因为人民怕“四人帮”这些奸臣玷污了周总理的英名，也怕邓小平“消失”。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寒冷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预感到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加严峻。他在和叶剑英的交谈中，作了如下表示：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罗迈即李维汉，“文化大革命”前就遭错误批判被“打

倒”) 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 经济没有根本好转, 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范硕: 《叶剑英在 1976》第 63 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叶剑英建议他“要不要再去找主席”, 邓小平又说:

已经找过了, 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 我估计, 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 就要“换马”了!

叶帅说: 我估计, “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 要换的话, 无非两个前途: 一个是下台, 另一个是“一批二保”, 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 因为有些事情, 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 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 他说:

我作了最坏的准备, 但我相信, 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 不要紧, 只要你老帅在, 还有其他老同志在, 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不过, 要讲究斗争方法, 这是, 总理临终前的嘱咐。(据范硕: 《叶剑英在 1976》)

正如邓小平和叶剑英所预料的, 患病中的毛泽东确实在思索着“换马”的问题。一年前, 他把“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扶上了马, 现在又认为“右倾翻案”而要“换马”了。但是, 老人家不让野心家“四人帮”之流上台代替已逝世的总理, 这一点他还是清醒的。他认为, “华国锋水平不高, 但忠厚老实, 不搞阴谋诡计, 不搞宗派主义, 让他当总理我放心。”于是, 他嘱联络员毛远新: “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 请政治局审议。如果通过了, 就发个通知。”

2月2日, 中央发出一号文件, 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 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纲, 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 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 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 一是不满意, 二是要算帐, 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 总的看法: 基本正确, 有所不足……

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意见，许多是没有和邓小平谈过的。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批判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

“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在群众中都有很大反抗力。3月26日，“四人帮”唆使华国锋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让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没发。“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江青则称赞“两校”造反派：“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

就在“两校”造反派大闹中南海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京的示威群众呼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人，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反革命”。这些决定由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4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猖狂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主席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

政治上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三次被“打倒”了。

30 . 陷入困境的邓小平，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万分悲痛。他支持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但不能同意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

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困居在家里，又过起类似在江西被软禁的生活。在北京东城宽街的邓小平居处，上边派了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不准外出的邓小平又像在江西时那样，在这个古老的宅院里一圈又一圈地散起步来，只是脚步沉重了许多。“四人帮”活动猖獗，毛泽东身心重病并被“四人帮”架空，国家和人民深陷灾难之中，事事都使这位七十二岁的政治家心情更加沉重。

龙年的 1976，不仅春天姗姗来迟，而且酷夏难以消退。

在追查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政治谣言”，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中，天灾人祸频仍。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逝世。朱老总去世之前对于“批邓”很难“转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变动。可是，这位九十岁高龄的长者，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还是被拉下了马，他最为尊敬的、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也先他离世，国家和党又处在这样不安定之中，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伤亡二十四万人，损失重大。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大力支援，奋起抗震救灾。可是“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批邓才是大事，不能“以救灾压批邓”。

被软禁的邓小平，身体虽然健壮，这时也因前列腺炎而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叶剑英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邓小平经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但是，毛泽东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

9月9日，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天灾人祸连降、国乱民怨极多的时刻，撒手与世长辞了。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他合上眼睛离开他缔造的党和国家，离开热爱他养育他的人民的时候，是既不安详也不平静的；老人家在病重和弥留之际，断断续续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文，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在病危之中还清醒地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当然也包括对待邓小平的问题，“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于心不安，忐忑的心难以解脱，他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不惜“人才难得”而再次把他打倒；但是他又一次给邓小平留下了那么一点“余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愿，是置邓小平于死地而后快的。江青、张春桥等早已多次把邓称为“汉奸”、“还乡团”、“中国的纳吉”、“国际资本家代理人”，这就不是什么“保留党籍”的问题，而是要开除、要惩处。但是，毛泽东没有让江青一伙的图谋得逞，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不能不说是幸之中的万幸。

作为邓小平，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对毛泽东始终以诚心相敬。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其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 error，“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正确的东西”，是“好心犯错误”。这是一个悲剧。邓小平后来讲过，毛泽东“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1 页）所以邓小平在 301 医院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万分悲痛。在和毛泽东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尽管他们之间有过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但合作是主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同志关系。对比邓年长十一岁的毛泽东，邓小平始终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师和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仅仅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们还亲密合作共事过。由于陷入困境，他连向毛泽东作最后告别和致哀守灵的机会也失去了，痛苦之中又令人感到悲哀。出院后，邓小平让家人采来松枝，做成了花圈，在家中设立了一个灵堂。他带领全家一起，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默哀。

但是，江青一伙却把毛泽东的逝世看作是进一步篡党夺权的好机会。在江青看来，毛泽东“升天”之日，就是她“老娘登基”之时，“女皇梦”就要实现了。“四人帮”躲进钓鱼台十七号楼，窃窃私语：

主席去世，虽然是一件坏事，但也可一分为二。

现在国内形势如同俄国 1917 年 4 月一样，处处需要自己的领袖。现在最要紧的，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形势对我们有利，他们找个头也难。

过去主席一说，有些事很不好办，也不好反对。现在好办了……（范硕：《叶剑英在 1976》第 18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四人帮”篡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批邓”，置邓小平于死地，他们知道，邓小平虽然已被“打倒”，但真正要打倒邓小平的人不多，反对者不少。邓小平仍然是他们篡权的最大威胁。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是研究治丧事宜的，可是江青突然跳起来，高叫：

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就

保不住了！

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

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范硕：《叶剑英在 1976》第 190 页）

华国锋、叶剑英和政治局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几天后，她又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继续煽动“批邓”。她说：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范硕：《叶剑英在 1976》第 191 页）

在江青一伙高喊“批邓”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了华国锋。在他们这种咄咄逼人、加紧篡党夺权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和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加紧了粉碎“四人帮”阴谋的斗争准备。

邓小平虽然已被“打倒”，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发展。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图谋已从报端隐约暴露，这就更引起他的不安。9月18日这一天，王震突然来防。从王震口中，邓小平得知叶剑英经常住在北京市后海南沿的小翔凤五号。第二天，邓小平没有电话通知，冒着极大的风险乘车悄悄来到时帅的住所。叶剑英此时正在家里仔细阅读报纸，上面载有江青一伙炮制的“毛主席嘱咐我们按照既定方针办”的谣言，他在字句下重重地划上了红杠，并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叶帅也已嗅到了江青一伙的动向，邓小平到来后，他们闭门交谈了半个小时，就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帅“收拾残局”抱以极大希望。他离开叶帅住处时，手里拿着叶帅仔细阅读过的报纸。显然，他们就叶帅划的“大问号”进行了讨论。

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同志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作恶多端的江青一伙失败了，历史终于把他们送上了正义的审判台。他们各自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应该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的，党和人民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于10月10日热情致信华国锋和党中央，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

但是，华国锋对许多老同志提出的尽快停止“批邓”、尽快起用邓小平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问题上与一些老革命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原则分歧。

1977年2月7日，华国锋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一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难以纠正，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就难以解放出来，历史冤案、假案、错案就难以昭雪。这个方针理所当然地遭到抵制和反对。直到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

国锋还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陈云、王震等再次要求让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又遭到了压制。

“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潮，其影响是相当深的。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曾正确地批判了“个人崇拜”，但是随后不久就表明，党并没有深刻认识这个问题。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主张“正确的个人崇拜”，把个人崇拜分成了两种。于是，有人就进而提出了“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继之个人崇拜之风就越来越厉害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提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三个“伟大”，林彪又加上“伟大统帅”变成了四个“伟大”。林彪煽动个人崇拜，可以说用尽了好词，如称毛泽东这样的天才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他们把毛泽东变成了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操、语录歌”，“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忠字歌”，“红太阳、红海洋”，从各个方面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如今，林彪、江青都垮台了，又冒出了“两个凡是”。

与“两个凡是”斗争最为坚决，并率先从理论上进行批判的还是邓小平。4月10日，还没有摆脱“批邓”枷锁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要准确地而不是歪曲地，要完整地而不是割裂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拨乱反正。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说：

“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邓小平还说：“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页）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尔后成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理论修养、斗争精神和工作水平，再次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支持。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们”的保荐下，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复出工作。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在闭幕词中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号召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

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工作后曾接见过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这次复出后又和这位总理进行了饶有兴趣的交谈。他说：“您记得我们1975年的谈话，此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施说：“可是您又回来了。这是您的福，也是中国的福。”施问他：“你究竟被打倒了多少次？”邓微笑着说：“那时是第三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

七十三岁的邓小平，终于在他第三次被“打倒”之后又第三次站起来了。打倒了，爬起来，再打倒，再爬起来，执著地追求使祖国人民富裕、民主、文明，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的伟大目标，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邓小平是一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祖国和人民终于又选择了邓小平。

31 . 1978 年末，在真理标准
大讨论中，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
历史转折，邓小平倡导
全党维护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和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贯所持的科学态度，同各种错误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60 年代初期，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追求形式主义。邓小平和罗荣桓等反对林彪的这套做法，邓小平首先提出用“继承、捍卫和发展”这三个动词，准确地表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联系和关系。后来，林彪提出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附加在上述三个动词之上，其结果导致了谬误。这个谬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就是利用“称天才”阴谋反对毛泽东，终于暴露了“三个副词”的政治野心。林彪集团覆灭了，但是“四人帮”继续割裂毛泽东思想，片面宣传毛泽东思想。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鲜明指出：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并批判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

“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许多基本原理都给搞乱了，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被糟踏得面目全非。一些明明违背马列、毛泽东思想原理的论点，却难以得到澄清。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许多问题都是毛泽东自己违背自己正确的东西，即毛泽东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个人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拨乱反正的。毛泽东逝世以后，作为创造毛泽东思想的集体成员之一的邓小平，作为与毛泽东曾经共事近半个世纪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名重要成员，他当然有责任承担起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经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毛泽东就是在这一命题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命题在一些时候和一些问题上，相当程度上破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搞“句句是真理”，更走向了这一命题的反面；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仍然是与这一命题相悖的。

1978 年春天，邓小平支持和倡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3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5 月 10 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长篇文章，11 日《光明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新华社于当天向全国转发。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河南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也转载了此文。5 月 13 日，又有 15 家地方报纸转载，其他报纸也都陆续转载，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一些人却认为，文章的矛头是指向

毛泽东思想的，是“砍旗”，是“丢刀子”，施加了种种压力。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一批老革命家则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强调和宣传实事求是的作风。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发表讲话，热情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9月16日，他又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越来越热烈地开展了起来。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中共党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后来曾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按原定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上，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革命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使会议开成了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邓小平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的伟大决策，调整了人事组织方面的安排，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中共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三中全会以后，党在继续克服“两个凡是”影响的时候，一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又冒了出来。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政治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两个凡是”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及其泛滥，说明人们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所以，在此后一个时期里，邓小平以很大的精力，倡导全党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解决好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政治问题。

1979年在建国三十周年之际，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提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自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同《决议》起草小组进行过十余次谈话，讲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此期间，他在其他场合的讲话、报告以及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中，也发表了许多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充分阐明了解决好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邓小平指出：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45页）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说：

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295页）

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5 页）

但是，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摆好毛泽东的错误与毛泽东历史功勋的位置，他说：

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4—345 页）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7 页）

邓小平认为，对于毛泽东发生失误的性质、原因和责任的分析，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恰如其分。他说：

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7 页）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8 页）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1 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33 页）

邓小平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毛泽东当然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干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1 页）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他“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其结果却造成了一场灾难，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6、301 页）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失误，邓小平则认为：“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

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6 页）他又说：“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9 页）1980 年 8 月，邓小平对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这样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3 页）

作为曾经受过毛泽东打击和不公正对待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责任能作出如此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不但显得特别有力、有理、有情、有义，而且令人感动，令人信服，大得人心。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9—300 页）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0 页）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7 页）

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5 页）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0 页）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的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8 页）

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7 页）

邓小平倡导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作了科学的归纳和概括，并指出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创造性论述，为继承、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科学地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证明的毛泽东思想真理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那些否认毛泽东思想或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以决议的形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标志着中共领导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

《决议》强调：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邓小平不仅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而且也是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楷模。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0 页），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以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由此开始走向他的“第二个辉煌”！

32 .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重申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毛泽东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曾经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指出，进城后，“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建国后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又进一步适时提出“向自然开战”，并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党的八大文献中，从理

论上进行了论证。但是从50年代后期始，毛泽东愈来愈强调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继之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两年，主要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徘徊，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二十多年没有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是毛泽东和党的一个重大失误。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强调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说，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他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为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毛泽东在理论上曾作过一些极其宝贵的探索。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在1956年至1957年春和以后的一些时间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不仅发表过许多精辟见解，而且总结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例如，他提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主张扩大地方的权力；提出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

本主义”的打算；提出总结和推广企业管理体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提出为适应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方面要进行改革的意见和设想，等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把改革作为总方针肯定下来坚持执行，甚至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愈来愈冲掉了已有对改革的宝贵认识和宝贵实践。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继续了毛泽东的正确探索，把改革确定为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总方针，掀起了强大的改革浪潮。这个浪潮首先在农村开始，八亿农民破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旧体制，逐步推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改革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一倍，邓小平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农村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城市的改革，农村和城市改革的成功更加深了党对改革重大意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一直强调和大力推行的。毛泽东以这四条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牢固地树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观念。正是由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才保证了我们国家虽经受种种磨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考验，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不改变颜色，们是，不可否认，党和毛泽东在过去存在着忽视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陷入了空想，妨碍了更有力有效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一方面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提出改革开放是党的总方针，必须反对僵化。这两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依存，要用发展的观点对待四项基本原则，要看到改革赋予它的新的内容。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他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同时又为以后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大趋势。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一批生产力高度发展的

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如何，他们从下主张用他们的“方案”去套未来的客观实际，而主张用实践检验理论。他们声明：“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了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在发达的俄国而是在落后的俄国，不是在一批国家而是在俄国一国，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以高集中、高集权为特点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把俄国革命道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和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也借鉴了苏联的模式，但是，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不能照搬苏联的作法，应该探索自己的路。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许多问题，更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55年底，他提出了“以苏为戒”的警告。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720—721页）但是，由于主客观和国内外的原因，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邓小平曾谈及这方面的情况，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过去我们搬用苏联模式和“左”倾僵化的认识及作法从体制上的一种否定。它的内涵十分清楚，即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有中国特色，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命题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猛向前发展。在实践中，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新论断。

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经济特区是1979年邓小平主持决策兴办起来的，他当时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几年时间，深圳经济特区已显示出对外“窗口”和开放基地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央还批准兴办了珠海、汕头、厦门等一批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进一步发挥了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在下

世纪三十到五十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是 1979 年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十二大确定了这一战略规划。到 1986 年 3 月以后，他逐步形成了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整个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完整战略设想。

同年 6 月，邓小平又作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论断，在此前后，他多次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91 页）“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5 页）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抛弃了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旧观念，邓小平指出：“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又说：“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1 页）

1984 年是邓小平思维十分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还完善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祖国的统一找到了切实的道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出现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从 1984 年起，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改革的重点逐步向城市转移，城市的改革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至 1988 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和第二代领导集体还倡导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 1978 年就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民主政治遭破坏的教训，1979 年作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1980 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必须屯服旧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等弊端。在改革的实践中，党愈加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即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要克服僵化，也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十二大精神和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指导下，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33 .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继毛泽东找到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进而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所依据的客观基础亦即国情的认识，它是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时，把其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他们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再划分成若干阶段，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不想制造乌托邦，也不想凭空猜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经历了七年过渡时期的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很长时间”，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但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也有过论述，但很不一致，斯大林在 1936 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苏共十八大提出他们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过渡”。1952 年，苏并十九大称“苏联进入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时期。赫鲁晓夫 1956 年上台后宣布“1980 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以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可以说都能够从这种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观认识上找到根源。

毛泽东和中共第一七领导集体，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56 年，毛泽东指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1957 年 2 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又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说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可见，毛泽东当时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成”明确区分开来的，这相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更缺乏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性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高度生产力的长期性缺乏估计，1958 年就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失误。认为通过“大跃进”，加快“一大二公”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可以“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生产力。于是，出现了“急过渡”、“穷过渡”，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当时，“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已走在桥梁上”的认识在全党全国相当流行。这种急于求成的“共产风”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后来，毛泽东在纠“左”中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国情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会要一百年，

或者更多的时间。”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批语中，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这个认识，可以称之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门的叩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他毕竟没有叩开这扇大门。他的社会主义“两段说”主要是用辩证法对苏联教科书中的“巩固社会主义”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进行理论上的批判，并没有用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反，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上，他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与过渡时期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认作是“过渡时期”，认为主要矛盾始终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理论上的误区，终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边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中国国情方面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164页）

同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在受中央委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页）其后在全党尤其是在理论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国情的讨论热潮。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定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这里，尽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阐述得还不全面，只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力落后和制度的不完善状况没有作出深入的说明，但已接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概括了。

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二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提到了在“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的情况，但也没有展开说明。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我

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中央这时对“初级阶段”的认识又深化了，对“初级阶段”的一些特征作出了初步的说明。

10月，中共中央酝酿将要召开的十三大的基调，提出要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进行总结，对改革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以使改革开放政策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使改革开放继续下去，并且搞得更快一些。十三大的基调只能是改革开放，十三大应开成一个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大会；开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快改革开放的大会；开成发扬民主、增强团结、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大会。

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党已进一步把基本路线、这一路线的基本点、这一路线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即国情问题、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等，联系在一起进行思索了。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愈来愈明晰起来。

1987年在春节团拜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致词时指出：“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为了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这些基本内容，我建议，一切希望中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大家都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中国十亿人民在现阶段的最基本的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395页）邓小平后来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8页）

此后，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空前热烈起来，对“初级阶段”和基本路线的认识和阐明也越来越深刻。

3月19日，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就起草十二大报告的总体设计给邓小平写信报告说，报告在第一部分写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以来的历史性变化，第二部分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由此而来”展开报告的第三至第七部分。信中还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立论，有可能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人民日报》1987年11月5日文《党的十三大报告诞生记》3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

4月26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

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5 页）8 月 29 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我们党的十二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指出。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报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报告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钟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十三大还第一次从十二个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

党的十三大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自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积极探索、开拓，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34 .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同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一样，确定邓小平的理论为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他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他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的问题，明确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谈话以明确的语言阐明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长期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总结几十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史，在这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正了名。

邓小平在谈到“左”和右的倾向问题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提醒大家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强调了“要两手抓”，“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

其严重。”“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因此，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为眼前出现的某些曲折而惊慌失措。“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的谈话和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的谈话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蓬勃向前发展。全党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契机，达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共识，大胆地闯、试，再一次推动改革大潮涌起。各地党政领导以邓小平谈话为指导，重新审视本地区、本部门，冲出姓“社”姓“资”的怪圈，重新认识市场经济，迈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台阶。

全国人民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出现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导致了冲破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禁锢的思想大解放；这一次思想大解放则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框框，进一步明确和掌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邓旋风”掀起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浪潮！

在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热潮中，中共中央加紧了召开十四大的准备工作，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明确提出起草十四大报告的指导思想：通篇要体现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认真规划今后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在系统地总结十四年来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就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阐述了九个方面的问题。他根据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草小组贯彻了这一精神。

报告的第四稿出来后，年已八十八岁的邓小平花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对之进行了仔细阅读，并于7月23日和24日向起草小组提出重要修改意见。他从总体上对报告稿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分量”，“是一大革命”，同时，他特别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报告在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四次，政治局汗会讨论了

两次，江泽民和起草小组座谈了三次，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也谈了重要意见，第六稿印发全国一百一十九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党的十四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同志等三千多人，参加了对报告草稿的讨论和修改。与此同时，还征求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报告草稿共修改了十次。

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不断为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认真听了江泽民的报告。结束时，他满意地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着就在电视机前鼓起了掌。

报告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总结了过去十四年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90年代的战略任务。报告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前已述，党的十三大曾把邓小平和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概括为十二个理论观点，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江泽民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基本要求。十四大报告则在过去概括的基础上，着重从理论的高度，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特别是着重反映了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新思想，作出了理论性强、层次性高的新概括。

报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问题等共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作了概括和论述。报告指出，这一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以来，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许多国家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了无产阶级是能够夺取政权，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但是，无产阶级能否保持政权，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则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的说来还在探索之中。近几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把这个问题更尖锐地提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被中国十四年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所证明，它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有其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思想条件和主观条件。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是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我国十四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

我国自三大改造完成以来对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这一理论的思想渊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考验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这个党中，有像邓小平这样的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

报告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党和人民把邓小平的名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联结在一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

报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进了党的章程，指出这一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全党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

两千多名代表热烈讨论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并通过了这个报告和新的党章。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要发展，需要有民族精神；时代要前进，需要有时代精神。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凝炼而成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懈斗争的力量源泉。

作为十四大特邀代表、八十八岁的邓小平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在北京寓所始终关注着这次具有承前启后，继任开来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会期内，他每天都翻阅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会议的情况。19日上午，他看了大会闭幕的有关报道后，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下午，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同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亲切见面，并合影留念。代表们的掌声此起彼伏，邓小平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并不时停下来同代表们握手，邓小平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江泽民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您今天同大家见面，使代

表们深受鼓舞，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代表新当选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把大会的精神落到实处。

党的七大在三泽东的指引下，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也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党的七大确立

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党的十四大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必将使全党达到新的统一和团结，引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泽东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35 . “ 翻身不忘毛主席，富裕
不忘邓小平 ”，老百姓这
样评价两位伟人，并把
他们紧紧联在了一起。

一些不明中国国情和中共党情的海外人士和外国朋友，他们总是习惯于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邓小平与毛泽东，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和联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不这样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这样看。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了以作风泼辣。提问题尖锐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合法拉奇的采访。这位爱出难题的女记者开头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确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大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法拉奇又问：“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如实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50页）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也代表了党和老百姓的意见。毛泽东缔造了党、缔造了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老百姓翻身得解放。邓小平代表人民的意愿，坚持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同时又倡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他深知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感情，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谆谆嘱咐写作人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但是，邓小平绝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批评，是郑重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第一，他把自己摆进去，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他坚决反对把一切失误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造成“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的假象，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二，他坚持用毛泽东正确的东西即毛泽东思想来纠正毛泽东的失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因此，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正是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第三，重在向前看，纠正毛泽东过去的失误是为了发展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是为了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探索一条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意愿和目标不是相悖的，而是一致的。

1986年9月，曾经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以及约翰逊、

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姆、贝京、巴列维国王等诸多世界风云人物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在电视采访邓小平时，提出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很显然，这位美国记者认为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是与毛泽东相背的。邓小平略加思索，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3 页）

华莱士继续问：“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其实，这个追问包含着许多不准确的说法。邓小平和党中央主张的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允许私人办企业，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私人企业作为公有制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而存在和发展；既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有言论自由，但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他们都绝不主张让人民贫穷，不主张一下子实现完全的公有制，也不主张反对言论自由。他们也主张社会主义的改革。这都是些原则的问题，混淆不得的。

所以，邓小平只用一句话作了概括明了的回答：现在和毛泽东时期是“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是的。如果翻阅一下这个《决议》，如果打开《邓小平文选》，就可知道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邓小平总是把马克思、列宁尊为自己的“老祖宗”，把毛泽东尊为当之无愧的“领袖和导师”。他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把他自己也摆进这“一代人”之中。

华莱士说：“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真是“难得糊涂”，殊不知这位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不清楚”的时候却说出了这样清楚的话。

邓小平答：“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74 页）

这场革命是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取得积极成果基础上的革命。薄一波把毛、邓之间的这种联系说得很清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继承了毛主席探索的积极成果，扬弃了他老人家探索中的失误，并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党的文献》1995 年第 1 期）

其实，亲历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核心领导的中国老百姓，对这两位伟人的伟绩，感觉得非常实在：毛泽东领导老百姓在政治上翻了身，邓小

平领导老百姓在经济上走向富裕，合在一起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解放。具有知恩必报传统美德的中国老百姓，既感恩于毛泽东，又感恩于邓小平。

毛泽东去世了，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仍旧怀念他。他的故里韶山冲，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千人去参观和瞻仰。笔者曾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二次访问毛主席的故乡，每次都有很深的感触，而以80年代的感触最深，去韶山参观的中外人士，1980年有二十一万人次，1983年四十五万人次，1985年五十五万人次，1987年六十一万人次，1991年达一百零五万人次。毛泽东走下了神坛，但人民更亲近他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建馆三十年里，共接待中外观众近三千万人次。其中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侨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国党派组织的领导人等。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到1993年已有八千多万中外人士瞻仰，老人家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他的画像、他的著作、歌颂他的歌曲和文艺作品以及回忆或介绍他生平事迹的读物等等，仍然为千家万户和亿万人民所喜爱。

人民对邓小平的热爱也是十分真挚的，因为他在毛泽东之后领导中国人民解决了温饱，正奔向小康。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国家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感谢邓小平。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群众国庆游行，在游行队伍中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群众对这位伟人发自内心的亲切问候，充满着人民与自己领导人之间的亲情。这年年初，邓小平到经济特区视察，在深圳一个小渔村看到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二千八百多元。每家都住上了四室一厅双层小洋楼，心中很是欣慰。村支部书记说，“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感谢邓伯伯！”邓小平说：“应该感谢党中央。”邓小平是很反对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1986年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问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成给我写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173页）但是他在人民心中具有很重的分量。据北京社会调查所1986年对八千份问卷的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名人”。在国内外政治家中，邓小平得票数占71.78%，在中国政治家中邓小平得票数占87.52%。《北京青年报》1994年12月28日发表的《公众调查》表明，在众多有关邓小平的称号中，几乎所有群众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称号完全准确：97.4%的人关注邓小平的新闻；90.5%的人知道邓小平有打桥牌、游泳、看足球赛等业余爱好；人们最熟悉的邓小平文章著作是他的“南巡谈话”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92%的人认为邓小平在健康时退休是对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民主进程的一大贡献。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争得大会的同意，不再进入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也不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只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平息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建立，邓小平就多次向中央诚恳提出，希望能够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最后一个职务。

1989年，邓小平在问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如果有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311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9月4日，邓小平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再次诚恳地陈述了他的退休请求。他说：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要想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这次事件（指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五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5—316页）

邓小平还专门谈到他退休的方式问题，要求“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休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强调说：

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6、317页）

以“实事求是”著称于世的邓小平，在对待自己的评价、退休乃至身后事的安排上，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本著前已多述，邓小平一贯

主张“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经常讲到“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他在临近退休时又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1页）这是一个伟人的肺腑之言。他把他个人的生命同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退休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一个伟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崇高品德。

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退休时间和方式的当日，邓小平郑重地向中央递交了请求退休的报告。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3页）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为党和国家的利益终生奋斗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并对他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决定》写道：“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90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人们尊敬他，爱戴他，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笔者在1993年4月曾访问邓小平的故居。在这里我看到、听到和收集到许多资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对邓小平的爱戴和尊敬。邓小平的故居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这是一座青瓦粉墙、砖木结构、泥土地面的极普通的农舍，掩映在一片竹林蕉树之中。正屋的墙壁上张着几十张有关邓小平生平的复制照片，左侧室内陈放着一张古旧的大木床（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诞生在这里），还有一些旧桌凳，右侧室内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正屋门顶悬一块匾额，上书“邓小平同志故居”，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师所写。如果没有这块匾额，人们恐怕难以知道这就是当今世界风云名人邓小平的故居。

邓小平1920年十六岁时离开故居，七十多年过去了，从未回来探视过。解放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重庆离广安仅一百多公里，他却抽不出时间回老家看一看。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提出修缮邓小平的故居，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他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直到近期才由县政府作出决定，把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故乡的父老很想念邓小平，邓小平也曾许下愿，如果广安县农业能够达到亩产千斤粮，他是要回去看看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广安县1983年就已达到亩产千斤粮的水平，县长立即上报请小平回乡，但是邓小平仍没有回来。直到1986年他和夫人一起向家乡发了一封贺电，算是“还

了愿”。

故居管理人员动情地告诉笔者，故乡的人民盼望小平回乡看看，盼得铁树都开了花，可是他老人家还是没有回来。我们确实看到故居的两棵铁树外了花的照片，一雌一雄，开得十分好看。笔者心想小平虽没有回乡，但在他的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他的故乡和祖国，不正像这铁树开花一样，焕发了灿烂的青春吗？！

邓小平拒绝“衣锦还乡”，却挡不住老巨姓和海内外的崇敬者自发地前来瞻仰。1984年有一万四千人到这里参观，1985年超过了两万，近几年参观人数成倍地增氏。甘肃有两位农民步行千余里来这里，就是为了向邓小平表示一番敬意。还有的是骑自行车，行程几百里到这里瞻仰的。一天，有一位身穿毛料制服的中年人米这里参观，随后他把一位工作人员拉到邓小平睡过的床边，硬塞给他一百张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拜托他代栽几棵皂角和白果树，说“为举世瞩目的伟人家乡增添一片青绿”。工作人员面有难色，他又打开提包，高声说：“请看，我还有两坨哩！吃水不忘挖井人，我靠政策好挣来的钱有权支配，你不必向上汇报。”最后又情真意切地说：“谢谢你啦，拜托你一定帮我了却这桩心愿。”不等工作人员再问，他便握手道别，说还要赶几百里路程。这位中年人是甘肃的一位农民。笔者在参观时，又听说新近有位华侨捐款数百万元，以表他对祖国这块土地生育和养育了一位世界伟人的崇敬之情。

著名老作家马识途在邓小平故居堂屋门两侧写了一副楹联，是颇能表达来此瞻仰者的心情的：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
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
颂广安。

不管史学家怎样评论毛泽东、邓小平，也不管政论家如何褒贬毛、邓之间的是非曲直，老百姓从自身利益的体会中，是把这两位伟人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并衷心地热爱他们。

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曾报道这么一件事：“1994年春，四川有一位叫刘福中的致富农民，很想在家里挂上毛主席和邓小平的画像，但跑遍子城乡书店书摊，都没有买到。新闻媒介将此事传出后，中央美术学院的著名画家李倚教授将他精心创作的《毛主席走遍全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三位伟人画像，通过四川电视台转赠给农民刘福中。此事在四川引起很大轰动。随后，省新华书店和出版部门组织画家创作了许多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像，发行后大受老百姓的欢迎。1995年新年和春节期间，四川新华书店发行伟人年画一千万张，许许多多的寻常百姓家都挂上毛主席、邓小平的画像。

中国老百姓从心底里呼喊：

泽东润泽人民心，
小平指引小康路。

翻身不忘毛主席，

富裕不忘邓小平。

泽东千古，
小平您好！

后 记

党的十四大以后，为了学习和讲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整理了过去收集的有关资料，又作了一些调查和采访，形成了关于“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若干讲座，给校内学生、教职工作过一些讲授，在校外也作过一些讲授，得到热烈反响。于是，在同志们的建议下，开始在原讲稿的基础上加工成一部较为系统的文稿《邓小平与毛泽东》。文稿初就后，于1993年2月下旬寄给学兄马德太、陈威，请他们给予指教和批评，两位学兄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陈威老同学还专门与作者对初稿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和一些新的资料。于是，我又进行了第二稿、第三稿的写作。

1993年11月第三稿完成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的关怀下，又得到有关部门有关专家的审阅和指教，1995年春完成了第四稿。

本书的总体设计，是以历史的发展线索为“经”，以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联系为“纬”，从而编织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从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革命的历史画卷。

拙著的意图，是以历史的逻辑作出说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探索，纠正毛泽东的失误，用新的观念、新的论点、新的结论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成为继承、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也绝不是偶然的。同时，作者还想对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澄清世上流传的种种迷雾。

“邓小平与毛泽东”，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题目。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和学识水平有限，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恐怕仅仅是一个大纲，为进一步的研究起个头而已。

文中选用的资料都是作者多年在从事教学中收集和积累起来的，同时也参阅了许多有关的出版物，在此谨向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和出版部门深表谢意。

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共四易其稿，历经近三个年头。许多亲朋好友、老同志同仁给予了关怀和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作者期盼着广大读者、专家学者和各方人士的批评意见。

余世诚

1995年6月17日

于北京石油大学七石斋

